

中国语用学的拓荒者和坚守者

——何自然教授访谈录

吴亚欣¹ 何自然²

(1.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本访谈主要包括语用学方向博士生培养、语用学理论引介、语用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应用性三方面的内容。何自然教授认为,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是语用学方向博士生必修的两门课,它们是弄清楚语用学的渊源和读懂语用学经典文献的基础;“语用三论”(关联论、语言顺应论、语言模因论)是众多语用学理论中对国内学者较有吸引力的三个理论,也是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以及社会语用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人际语用学研究要突出在中国的本土化,展示中国文化在人际关系构建中的体现;社会语用学研究要能够对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和指导。

关键词:何自然教授;语用学;语言模因论;人际语用学;语言政策;语言生态

Pioneer and Persistent Practitioner of Pragmatics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He Ziran

WU Yaxin HE Ziran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covers the principles of instructing doctoral candidates in pragmatics, the introduction to and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heories,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pragmatic research. Professor He Ziran holds that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Logic of Language are two compulsory subjects for the doctoral candidates in pragmatics since they are the foundations of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and the classic literature of pragmatics. The three major theories of pragmatics, namely, the Relevance Theory, the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and the Language

作者简介:吴亚欣,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语用学、会话分析研究。

何自然,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博导,主要从事语言学、语用学研究。

Meme Theory, not only interest the Chinese pragmatics most, but also have strong potentials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and the language phenomena related to societal pragmatics. The research of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should focus on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to demonstrate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ragmatic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he research of socio-pragmatics shoul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in general.

Key words: Prof. He Ziran; pragmatics; language meme theory;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ecology

【访谈者按语】何自然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和语用学家,我国中青年语言学研究者都熟知何自然教授的语用学研究成果,他们也是读着何先生的语用学著作和文章成长起来的学者。1999年笔者有幸成为何先生的博士生,跟随先生潜心研究语用学,现如今也成了一名语用学研究者。近日,作为何先生的弟子,笔者受《英语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对何先生做了一次访谈。何先生从1959年起在高校从事外语教学研究工作,现虽已年过八旬,但仍笔耕不辍,屡有新文见诸报端,在每年的语用学研讨会上也还常看到他“年轻”的身影。何自然教授已从教60年,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译著等10余部。2017年何先生迎来了他的80寿辰,为庆贺何先生的80华诞,很多媒体对何先生做了专访,内容主要涉及何先生的“语用人生”,包括语用与修辞、语用与教学、语用与语法、语用与翻译、语用与模因等。恰逢何自然教授从教60周年,本访谈将围绕语用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以及青年语用学学者的成长展开,以期能给我国年轻一代语用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吴亚欣(以下简称“吴”):何老师您好,您1959年开始从教,2019年刚好是您从教60周年,所以想问您一些关于学生培养,尤其是博士生培养的问题。您是从哪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

何自然(以下简称“何”):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开始招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语用学方向的博士生。

吴:当时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语用学相关的书籍和文章是不是特别少?您当时主要给博士生开设哪几门课程?

何: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简称SFU)进修,师从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Davis)教授,专攻语用学。语用学在20世纪70年代才作为一门学科在语言学领域兴起,当我回国教授语用学时,能供我参考和使用的相关书籍和文献自然不会很多,但在指导语用学方向博士生之前,我已经给硕士生开设过语用学的相关课程,为教学和研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参考资料,并且编写了《语言哲学文选》和《语用学讲稿》等教材。在此基础上,我为博士生开设了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逻辑和语用学文献选读四门必修的学位课程。

吴:是的,我是1999年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简称“广外”)跟您读博士的,当时除了语用学的相关课程外,您的确还给我们开设了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给博士生开设这两门课程的?

何:我在SFU学习时,戴维斯教授是哲学系的老师,他把语用学的言语行为、含意、前提、指示语等课题作为几门独立的课程来讲授。语用学的这些经典话题都来源于语言哲学,要学习语用学必须先了解语言哲学。同样,语言逻辑是深入了解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前提。语用学在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时是以语境逻辑为依据的,有些话语表面上不合逻辑,但依然能够被正确解读;也有一些话语脱离了语境可以表达多个语义,但一旦被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语义立刻清晰,这是因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有共享的语境知识和默认的语用前提,交际双方正是通过逻辑这条线索,将语境、前提和话语合理地联系起来。所以,要学好语用学,先了解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是十分必要的。

吴:的确如此,打好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基础是读懂语用学经典文献的前提。记得当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博士生们都特别敬佩您对语用学研究热点和走向的把握。因为当时有几位师兄的论文选题定下之后,接着《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就出一期与他们选题相关的专刊(Special Issue),比如1999年第六期的“误解专刊”(Special Issue on Misunderstanding)和宗世海师兄1996年的博士论文选题“汉语话语中误解的类型及其因由”、1998年第二期的“话语标记语与连贯专刊”(Special Issue on Discourse Markers and Coherence Relations)以及1999年第十期的“语言习得中的话语标记语专刊”(Special Issue on Discourse Marker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和冉永平师兄1998年的博士论文选题“话语标记语的认知语用学研究”、2000年第九期的“语码转换专刊”(Special Issue on Codeswitching)和于国栋1999年的博士论文选题“英汉语码转换的顺应性研究”、2004年的“隐喻专刊”(Special Issue on Metaphor)和徐章宏200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隐喻话语理解的语用认知研究”等。现在我们指导学生一般先让他们看文献,然后从文献中观察是否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与我们不同的是,您在指导学生时非常有预见力,指导学生选的题目随即就成了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我们很想知道当年您在指导学生选题时有哪些经验供我们现在年轻导师借鉴?

何:我认为学术上的预见性来自对本学科前沿信息的广泛接触和把握,并从中捕捉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我也同样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文献,但重要的是要开动脑筋,勤于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谈到学科前沿和资料占有的问题,你们现在处于网络时代,和国内外同行间的联系十分便捷,比我们那时候的条件和处境好多了。我在加拿大进修时,在导师戴维斯教授的引荐下认识了国际语用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简称IPrA)秘书长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教授。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国际语用学研究的信息,并定期给我寄来他们编辑的资料和文献。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学者可以免会费加入国际语用

学研究会,他还支持我在广外刚成立不久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开设一个“国际语用学研究会资料分发中心”,允许我们以油印的方式重印他给我寄来的会刊《语用学》(*Pragmatics*)(国际同名知名刊物的前身)和他们出版的其他语用学文献资料,以便分发给我国内的国际语用学研究会会员。仅从这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我们为了解本学科的前沿信息所做的努力。

吴:噢,原来是这样!在那个年代能定期读到《语用学》上面的文章,真是不容易!国内的 IPrA 成员一定非常感激您给他们带来国外文献资源。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要想在学术上有预见性和前瞻性,就一定要广泛涉猎学科的前沿信息,尤其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在资料占有上已经可以与国外同步,所以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地阅读这些最新的文献,这样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其实您对研究选题敏锐的洞察力也体现在您自己的研究中。从关联论到语言顺应论,再到语言模因论,可以说您所引介的“语用三论”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我国语用学研究的三大热点,您是如何从众多的国外语用学理论中看出哪一个理论有发展和应用前景的?

何:在众多国外语用学学说中,不是仅这三个方面有发展和应用前景,而是我个人认为这几个方面可能对我们国内的语用研究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就努力地去了解、认识并发展它们。我很早就和提出关联论的斯波伯(Dan Sperber)、威尔逊(Deirdre Wilson)以及提出顺应论的维索尔伦等学者有电邮往来。我读过斯波伯和威尔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初步完成的关联论学说,当时拿到的是他们的原始打印稿复印件,这一理论被认为是认知语用学的雏形。此外,我也读过维索尔伦最初在 IPrA 文献中发表的有关顺应论的文章,《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出版后,他第一时间就把书寄给了我,使我能够较早地接触他的思想。我认为这些理论对我们的语用学研究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于是就把它们推荐给我的学生,并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以书评的形式再推荐给国内的同行,同时他们也选择这些理论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后期的“语言模因论”是我和我的学生在了解模因论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模因这个概念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被关注,但提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讲文化进化,并设想人类文化中也存在类似基因(gene)的基本遗传单位,称之为模因(meme)。我之所以将模因的基本原理和语用结合,并把它放到语用学的研究范畴,是出于以下考虑:①模因是“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的信息单位”(Blackmore, 1999: 43);②它作为信息单位的各种表征,具有信息的某种特定内容(Distin, 2005: 20);③模因和语言有密切关系,因为语言是信息的表征,所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语言就是模因。我们注意到,语言的演变、创新、使用和理解都可以用模因理论来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对语言的运用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研究语言模因必须研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内部条件(如模因的精练、通俗、实用、时尚、形象等)和外部条件(如面对社会生态环境宿主有某种需求或心理趋向、有社会关注度、能被模仿、会发生



变异、有传播的空间和力度等)。于是,我们暂且放下模因与文化进化、模因与信息论、模因与大脑机制等覆盖范围宽广的其他领域,只具体研究模因与日常语言的密切关系,用模因论的原理观察社会语用的表现,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命名为“语言模因论”,把它放到语用学研究领域中,重点研究模因与社会环境、模因与社会心理、模因与语言教育、模因与语言翻译、模因与网络语言等一系列与语用有关的热点课题。

吴:谈到模因论,我还想多了解一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从2000年左右开始关注模因,那时我还没有博士毕业。当时听您谈到这个新鲜的概念后,我也随即在网上查阅过一些相关文章,但没有坚持跟踪。在采访您之前,我专门上网查了您发表的与模因相关的文章,从2003年您就开始发表以模因为主题的文章,为什么您那么早就“盯”上模因了?是什么让您对模因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呢?

何:关于我和模因论的缘分,我曾在早前的一个访谈录中有所提及(莫爱屏、蒋清风,2014)。2003年初,桂诗春先生在《现代外语》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给刊物开设一个评介学科前沿的专栏,并让我为该专栏组稿。碰巧在那之前,在我和桂先生的一次闲谈中他提到国外有一种被称作“meme”的现象,说它活像国内“文革”年代人云亦云的流行语和现代社会的广告炒作。我对此产生了兴趣,觉得社会和互联网上流行的某些说法正是一些“meme”现象,完全可以用“meme”的理论做出解释。于是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开始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并从国外购置有关“meme”的书籍和文章,还通过互联网订阅了国外讨论模因论的电邮。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meme”译为“模因”,并以“模因和社会语用”为题与我当时的博士生何雪林合作写了一篇综述性文章,交给《现代外语》学科前沿专栏作为首发。此后,我和我的博士生,包括随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谢朝群博士,继续研究语言中的模因现象。我在《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发表了“语言中的模因”,英文稿“On Memes and Memetics in Language”发表在日本语用学学会会刊《语用学研究》(*Studies in Pragmatics*)上(2008年第10期,开拓社),谢朝群和我合作撰写的“Language and Memes: A Preliminary Account”发表在著名语用学家雅各布·梅(Jacob Mey)80华诞庆祝文集 *Language in Life, and a Life in Language: Jacob Mey—A Festschrift* (Emerald, 2009)上。我将语言模因论归入语用学领域,解释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的方式、规律和变化。我和我的学生陈新仁(及陈新仁的学生)、马萧(及马萧的学生)、戴仲平、庄美英、陈琳霞、李捷、常新萍等在国内外语用学的学术会议上及许多高校的讲学中,不断传播我们在语言模因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为语用学著述撰写语言模因专章。后来我们还组织了语言模因研究小组,定期在一起学习和探讨模因论的有关文献,继续产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我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同,不断见到同行发表了许多有关语言模因的文章和著述。

吴: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在您的影响下,从2003年至今,在国内外语类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以模因为主题的文章已有两千多篇,您和您团队的有关论著被引数千次,足见语言模因论在我国学界的影响。那么,您对模因爱好者接下来的研究有什么建议呢?

何:必须指出,我们提出的语言模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很不够,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语用现象,它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样的机制让它得以复制和传播?什么条件或原因导致语言模因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分?语言模因对语言学习、外语翻译有什么帮助?既然要研究语言中的模因,那么也就应该探讨语言模因和语言学本体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利用语言模因的原理去认识语言的语用规律?你的师兄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和我合作写过一篇文章(陈新仁、何自然,2018),考察了一个被广泛复制、传播的语言结构模因“吃+NP₁”,探讨了汉语句法形式的模因特性和它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基础。这是我们试图从语言模因视角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总之,语言模因的研究大有可为,我们现在发表的成果还不够系统,完整、成熟的语言模因理论体系还未建成。

吴:看来,基于模因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更多相关文章。在我跟您读博士的时候,或者说在进入21世纪之前,当时的语用学还很纯粹,没有那么多分支,主要有语言语用学和社会语用学,还有以关联论研究为中心的认知语用学。但进入21世纪后,语用综观论盛行,随着界面语用学的兴起,语用学和相邻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种语用学分支层出不穷:有和语言本体各学科分支结合的语用学研究,也有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面结合的研究。面对这么多新兴的语用研究领域,您对青年语用学者有些什么建议?

何:语言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语言的本体研究,也有和语言相关的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面研究。语言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研究人员的兴趣也不一样,对研究课题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对语用学研究者来说,研究目标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因为“语用、语用,讲究语言的使用”,这门学科本身就要求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在语用综观论的引领下,如果说当前的语用研究范围宽广,那是因为语言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其他邻近的学科都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关。因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语用学本体的研究,而应具备更广阔的视野。我认为,当今的语用学研究者要努力做到以下三点:①要对语言现象有较高的敏感度,要时刻注意观察语言的表现,关注人们在不同时空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的特点;②要及时把握当前各种语言理论的前沿动态。对语用学研究者来说,特别要了解语言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前语言现代化的手段和特征;③要善于运用各种方式收集语料,对语料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及相邻学科结合起来思考,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使用和理解。

吴:谢谢您给青年语用学研究者提出了要求,也指明了道路!说起语用学与其



他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界面研究,我感觉最近发展势头强劲的人际语用学就属其一。人际语用学是一个较新的语用学分支,但从西方的研究文献来看,似乎人际语用学又与传统的语用学议题“面子”和“礼貌”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语用学研究的本土化,您认为中国语用学研究者的人际语用学领域可以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创新?

何:我赞同洛切尔和格雷厄姆(Miriam A. Locher & Sage L. Graham)(2010)的观点,人际语用学研究人们在社交场合中如何使用语言来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我认为,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和我们的语言生活紧密结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有着自身根深蒂固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语用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应该专注于与本土文化相关的人际语用话题,比如变化称谓、转换语码、顺应语言生态、语用移情、虚言应酬等处理人际关系的语用方式和策略。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可参考我发表在《外语教学》2018年第六期上那篇人际语用学的文章。同时,人际语用学还要和语言生态关联起来,把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和健康的语言生态环境以及建立与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社会价值。

吴:是的,从您身上,我们年轻一辈看到了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还要成为社会语言生态状况的指示灯,并且能够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参考。这在您有关语言模因的文章中都有所论及,比如您在对社会生态环境和语言使用之间相互影响的论述中,提到健康的社会生态不仅可以催生健康的语言强势模因,而且还能使一些消极的语言模因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何自然,2017)。从社会语用的角度,您对我国相关语言政策的制定有何建议?

何:众所周知,公共话语是活的语言,使用即存在,所以描写语言学主张客观地描述语言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在社会语用中,我们无法强制人们使用哪种说法或不使用哪种说法,话语的存亡其实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不同话语的使用人数有多有寡,使用的范围有大有小,接受的程度也有高有低,诸如此类的因素就决定了话语的不同命运。所以,从社会语用及其和社会生态间的关系来讲,我们应该建立公共话语的舆情监测机制,客观记录语用现状及发展轨迹,描述社会发展和语言运用之间的互动依存关系,记录新的强势语言模因产生和传播的途径,解释旧的弱势语言模因的淡出或消失的原因。总之,语言政策的制定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对公共话语的发展和使用应少一些社会生态环境之外的干预,需更多关注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在语用层面的反映,透过语用现象来反观社会生态环境的本质,及时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再通过调整社会机构的运行机制来引导社会语用的变化和发展。这样,我们语言学或语用学研究者的发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实践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吴:您的这些思想在您多年来有关社会语用以及语言模因的研究中都有体现,从

您的研究所选用的语料中就可以看出您对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高度敏感。您作为一名语言研究者,一直践行着对社会语言生态状况的监控,所以您的研究一直让读者感觉很接地气,同时又能反映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消极负面的问题。借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也代表全国的语用学研究者向您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代表全国的语用学研究者对您给予的指导和建议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何:我曾经说过,我从事语言研究的大半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普及了语用学,让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了解语用学、从事语用学研究,壮大了我国的语用学队伍,让我国从事汉外语言教学、研究汉外语言使用 and 理解的语用大军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整体研究素质不断提升;第二件事是 21 世纪初,我和我的学生开始一起潜心引介模因论,将模因论纳入语用学领域,研究语言中的模因,初步创建了我们自己的语言模因理论。我本人已步入耄耋之年,假我时日,自当继续扬鞭奋蹄,力求有所发现、有所进步,但我更希望我们年轻的语用学研究者能实现我的心愿,继续深入探索语言模因理论,让它成为我国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为发展我国的语言科学做出贡献。

吴:我相信中国的语用学研究者看到您对他们的这些期许后,会感到重任在肩,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语言模因论并从事与语言模因论相关的研究,同时,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发表更多有关语言模因的文章。最后,再次感谢您给中青年导师和青年学者在研究生培养及语用学研究上给出的指导和建议。

何:也谢谢你对我的采访,谢谢《英语研究》杂志。

参考文献

- [1] Blackmore, S. *The Meme Machi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Distin, K. *The Selfish Meme: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Locher, M. & S. L. Graham. Introduction to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G] // M. Locher & S. L. Graham (eds.).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0: 1-13.
- [4]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1986/1995.
- [5]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 New York: Arnold, 1999.
- [6] 陈新仁, 何自然. “吃+NP₄”的模因句法学阐释[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1): 9-16.
- [7] 何自然. 语言模因与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J]. 中国外语, 2017(3): 20-27.
- [8] 何自然. 人际语用学: 使用语言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J]. 外语教学, 2018(6): 1-6.
- [9] 莫爱屏, 蒋清凤. 语用、模因与翻译——何自然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5): 3-8.

责任编辑: 郭建辉

70 年来我国比较 诗学研究的得与失

曹顺庆 陈思宇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比较诗学经历了前学科时期、学科创立时期、巩固时期、拓展时期与深化时期五个发展阶段,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逐步完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中国比较诗学学科体系。反思 70 年得失,中国比较诗学还存在简单类比、片面求同等积弊,新时代的比较诗学应更加关注差异与变异,聚焦影响关系研究,探索西方文论中国化,以重构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比较诗学;70 年;得与失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of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in Past 70 Years

CAO Shunqing CHEN Siyu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has experienced five development stages, i. e. pre-discipline period and the following periods of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consolidation,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aradigm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 research scope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which, therefore,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Reflecting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past seven decades,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simple analogy studies and excessive emphasis on homogeneity, so comparative poetics in the new er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and

作者简介:曹顺庆,男,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陈思宇,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variations, focus on influence studie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explore the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iming at re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rebuilding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seven decade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中国比较诗学历经了70年的峥嵘岁月。70年来,我国比较诗学既有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不倦在后,创获了可喜成就,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对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溯,总结得失,厘清发展脉络,有助于在反思中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寻求切实的文论话语建设之道,为中国文论话语的进一步发展打开新思路,开辟新路径。

1. 前学科时期(1949—1978)

中国比较诗学的诞生是西风东渐、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冲突与融合后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萌芽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便已有了诗学的成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8),这些代表性著作预示着中国比较诗学的思想开端。在随后的大半个世纪,我国比较诗学研究出现了不少杰出成果,比如梁宗岱的《诗与真》(1935)和《诗与真二集》(1936)、朱光潜的《诗论》(1943)、陈铨的《文学批评的新动向》(1943)、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比较诗学经历了漫长的沉寂期。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苏联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大陆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指导。在如此氛围中,除了钱锺书等个别学者私下坚持自己的研究之外,大陆的比较诗学研究销声匿迹。直至20世纪70年代,文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景象。但该时期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比较诗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间段,对大陆的比较诗学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比如哥伦比亚大学于1959年出版了施友忠第一部英译本的《文心雕龙》,促进了《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刘若愚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1962)以中西诗学的交融和互释为基础,试图更真实地展现中国诗歌的面貌。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1974)中首次提出“模子”这一重要概念。缪文杰主编的论文集《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1978),第一卷共收录了10篇由汉学家撰写的文章,以西方评论者的眼光审视中国诗学的性质和特征,反映了世界读者对中国诗学的兴趣。

2. 学科创立时期(1979—1989)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艺思想,译介外国文论,国内的文艺思想空前活跃。在东西文化大汇集的时代语境

下,比较诗学学科建设逐渐提上日程。

1979年,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此著被奉为中西比较诗学的经典之作,通过旁征博引,钱锺书将具体的诗学问题引入中西交汇的背景中进行观照、对比、辨析、阐发,以寻找中西诗学、中西文化的共同点,是一次跨语言、跨文明、跨学科的交叉碰撞。尽管钱锺书将中国传统典籍放在中西交汇的大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但他所进行的中西诗学比较是以本民族文化传统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坚持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主体性。

同年还出版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其最大特点是采用了中西文论附录的方法。作者还提倡运用中西比较的眼光来辨析中外文论的异同,从而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通过中西比较来彰显中国文论的特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不仅全面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也展现了其诗学成就。他针对新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对新诗理论加以探讨,对当时新诗的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推动了新诗理论的发展。

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出版,第一次明确提出“中西比较诗学”概念。此书以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为基础,对中西文论中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辨异,进而探求促使两种文论中相异性形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渊源,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理论特色。书中提出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以及溯本求源寻求异之生成文化根源,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此著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开辟了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新阶段”(王向远,2003:248-251)。至此,中国大陆的比较诗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同年,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是比较诗学创立时期较早具有清醒的中西比较诗学学科意识的著作之一。此书不仅论述了中西诗学、中西美学的比较,而且还以多维的分析角度,突破了比较诗学这一比较文学分支范畴,广泛涉及文化比较、宗教比较、哲学比较、思想比较等多重领域,极具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在一种较为开阔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我国比较诗学研究逐步走向了学科建设的自觉。文艺理论批评、比较文学和对外文化交流表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季羨林、李赋宁、乐黛云、赵毅衡、温儒敏、严绍溟、谢天振、孙景尧、周发祥等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发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时期台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有极高的建树,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起到了桥梁作用。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1975)以现代西方诗学的观点,改造了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中所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运用于分析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融通比较,力图构建普遍意义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刘若愚运用阐发方法对中西诗学进行跨国别、跨文化、跨语言的比较研究,开创了比较研究的新模式,对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

叶维廉在《比较诗学》(1983)中对西方文学理论应用于中国文论研究提出了质疑。针对西方人对东方这个“模子”的忽视以及西方“模子”流行于比较文学界从而导致许多研究产生了歪曲等情况,叶维廉提出了对“文化模子”的寻根研究,并进行了不同“文化模子”之间相互激发与更新的探讨。“文化模子说”的提出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曹顺庆,2002:334)。

在台港比较诗学界,与叶维廉等人一样主张中西互释的学者还有黄维梁。从黄维梁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的实践中,可见其“中西互释”的双向阐释观的发展脉络。他致力于中西诗学交汇互释并竭力发掘中国传统诗学价值。其《中国诗学纵横论》(1977)尝试用双向阐释法研究中西诗学。黄维梁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而引发的比较诗学观点,在大陆和台湾学术界产生了共鸣。他不仅是中西诗学互释互证的积极倡导者,更是“以中释西”的大胆实践者。

综观该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①学科意识逐渐产生与发展,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研究范式以及学科发展思路基本形成。②该时期的诸多成果为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范本。如:赵毅衡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1979)、周来祥的《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1981)、张隆溪的《诗无达诂》(1983)等。③台港及海外华人学者的比较诗学研究非常活跃,成果丰硕,对大陆的研究起到助推作用。尤其是“阐发法”的提出,对日后大陆学者发展为“双向阐发”起到了启发作用。台港学者最先想到利用西方系统的文学批评来阐发中国文学与文学理论,这种移西就中的单向阐发研究,虽有所局限,但其理论与实践为当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后,陈惇和刘象愚针对台湾学者所提出的“单向阐发”,在《比较文学概论》(2000)一书中提出了“双向阐发”的观点,以修正其缺陷。

3. 巩固时期(1990—1999)

1990年之后,比较诗学学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反思中不断突破,既有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著,也有专题性更强、富有创新性的佳作,进一步巩固了学科建设。

黄药眠与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是国内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第一部比较诗学专著,其特点在于以文化背景的比较为前提,而后展开范畴比较和事实比较。这一特点受到了高度评价,饶芃子(1999:8)认为此书突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诗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对文化背景的比较予以高度重视,对中国诗学探索未来之路具有重大意义。

由乐黛云、叶朗和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1993)是中国比较诗学史上第一部辞书。作为中国诗学史,也是世界诗学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诗学大辞典,该书首次将印度、日本、朝鲜、阿拉伯、波斯、非洲、欧美等地区的诗学纳入世界诗学体系

中,构建了全世界的诗学术语与概念体系。曹顺庆(2008:230-232)将此巨著的特点概括为“开阔世界视野”,“正本清源、平等对话”,“寻求共同诗心”。

除上述两部代表性著作之外,该时期的学者们在诸多领域勇于突破创新。其一,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角上有了新尝试。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1992)是中国第一部国别诗学比较著作,采用了对中国与英国的国别诗学做比较的方式,开辟了国别诗学比较的新道路。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借用文化精神的探源来架构中西美学的会通之桥,对跨文化研究给予了新的启发。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1998)以西方哲学阐释学为理论基础,将中西方文化置于平等地位,深入考察语言和解释之间的关系。此书以文化求同为策略,超越中西文化差异,寻求中西文学和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共通之处。

其二,在比较诗学的研究模式和格局上有了新探索。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1998)和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在比较模式、本体论和语言论上探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如何达到中西平等,同时又能彰显中国诗学的身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比较。在具体的研究与实践中,二者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其三,在比较诗学的范围研究上不断扩大。我国比较诗学自兴起以来,囿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对东方文论的研究较为薄弱,造成了除中国文论以外其他东方国家文论的缺席。为数不多的专著有:拓荒之作——金克木的《印度古代文艺理论选》(1980)、我国第一部印度古代文论研究专著——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1993)以及倪培耕的《印度味论诗学》(1997)。基于此现状,季羨林与曹顺庆编撰了《东方文论选》(1996),第一次较全面地将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东方各国的文论概况译介到中国。季羨林(1996:3)亲自作序:“读此一书,东西兼通。有识之士定能‘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融会东西,以东为主,创建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把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东方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上。”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曹顺庆的《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此书在《中西比较诗学》(1988)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比较范围由“中西之比”拓展到“东西之比”,诗学范畴由部分领域的比较扩展到总体诗学的比较。余华(1999)评价其为“国内第一部熔世界各文化圈的文论于一炉,打破中西两极比较而转向总体文学式的比较,并且于东西方文论纵向的历史发展中认真探寻和总结人类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探索性专著”。

综观该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①从对话角度来探讨与深化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是该时期的新趋势。以对话取代之前所侧重于阐发式的研究,在中西诗学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诗学融于中国当代文论之中,重铸中国文论话语。其代表作有:乐黛云的《文化转型时期与中西诗学对话》(1993)、钱中文的《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1993)等。②比较诗学研究的学科化、体系

化更为明确,尤其是开始重视从方法论、学理框架上去探讨学科性、理论性特征,如黄耀华的《中西诗学比较方法论讨论会综述》(1994)、饶芃子的《自然之道——中西传统诗学比较论纲》(1995)及曹顺庆的《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1997)等。③研究视域得以拓展和完善。从《印度古典诗学》到《东方文论选》《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及《世界诗学大辞典》,打破了中西两极之间的对比而转向总体诗学的全方位比较,是我国比较诗学由中、西向东、西的拓展。④在研究视角、研究模式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从国别诗学比较、跨文化、文学阐释学、哲学和审美本体论等角度展开探索。同时,开始把微观的概念比较与宏观的文化探求结合起来,也试图系统厘清中西文论和美学体系的关系。

4. 拓展时期(2000—2009)

进入新世纪,我国比较诗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2000)共收录了作者的25篇论文,涵盖了从中西比较戏剧学到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也注重中西诗学之间更深层次的文化探源研究。作者在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以放弃、遗忘、忽略中国传统批评样式为代价的”(饶芃子,2000:181),因此,此书旨在建立以中国传统诗学样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理论。

曹顺庆的《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2004)共收录了25篇论文,按论题的相关性分为六辑,分别代表了作者研究的六个方面,既把握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指明发展新趋势。第一辑主要探讨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基本原理,指出“跨异质文化”是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潮;第二辑“跨文化比较诗学”是重心所在,选取了《道与逻各斯》《庄子与叔本华生命悲剧意识比较》等“跨异质文化”特征显著的论文,意在凸显“跨异质文化”中的“双向阐发”“异质比较”“文化寻根”等方法论体系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意义。

赵毅衡的《诗神远游》(2003)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对美国现当代诗歌产生影响的著作。作者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佐证,深入剖析了从19世纪至当代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产生影响的历史过程,并指出中国诗学、哲学与宗教在此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刘介民的《中国比较诗学》(2004)通过中西诗学比较对话,明晰我们独特的民族诗学特征,将古代诗学进行现代性转换,进而重建中国诗学话语,参与进入当下世界诗学的言说之中。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2007)第一次以中国、印度、西方与波斯-阿拉伯作为世界四大诗学体系来论述和总结世界诗学的发展规律。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史》(2008)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及拓展时期的不同研究特点,详细评述了中西比较诗学在台

港和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探讨了诗学话语的论争以及文论失语的解决途径,并针对中西比较诗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所面临的研究问题提出了新对策。

除上述论著外,该时期还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潘知常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2000)、赖干坚的《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2003)、杨乃乔的《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2002)及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2005)等,它们各具特色,极具学术价值,为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具体评介。

综观该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①21世纪的比较诗学研究走向了新的深度和广度,学科化进程日益加快,学科研究逐渐成熟。其中,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逐渐从以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研究重心中走出来,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论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在世纪交替的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乐黛云、黄鸣奋等学者率先开始着手于英语世界的中国文论研究。2000年,王晓路撰写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研究成果。②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中,比较诗学走向“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是比较诗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趋势(曹顺庆,2008:526)。在此之前,已有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梁等学者提出过比较诗学最终追寻的目标是共同诗学。因此,走向共同诗学既是比较诗学的理想,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也正是钱锺书所寻求的共同诗心和文心。然而,正如比较文学走向总体文学那样,比较诗学走向共同诗学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③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研究作为诗学比较中“异质性”问题的理论思路应运而生。相较于以往主要体现在“跨文化”上的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2005)提出的“跨文明”更“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异质性的研究”,这也是对比较诗学的异质性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一次提升。变异学研究,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所谓文论变异,是指“文论思想在由起点经媒介到终点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缺失、掉落或变形的现象”(曹顺庆,2009)。因译介或阐释所产生的变异,会导致误读或引发新质的产生,如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因此,认识到文明的异质性、互补性及变异性,是中西诗学平等对话的关键。

5. 深化时期(2010—2019)

近十年来,我国比较诗学研究固本拓新,不断提出新视角、新命题,也逐渐加强中国比较诗学在国际上发声,扩大在世界比较诗学领域的影响。

2012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由曹顺庆主编的《中外文论史》(四卷本)。此著以历时发展为序,以文论家为纲,以纵向论述与横向比较为经纬,以文化探源为基础,厘清整个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勾勒出整个批评史的历史特征及其基本走向。黄维梁(2014)评价此著“弥纶群言、宏微并观、纵横通论”,是“中外迄今唯一一本广泛涵盖中外文学理论的史书”。

刘圣鹏的《中国当代比较诗学:源流、话语和范式》(2016)以差异性作为核心概

念,梳理了比较诗学的源流、话语和范式等相关知识系统,指出了广义比较诗学的发展方向。胡亚敏在《论差异性研究》(2012)一文中也把差异性研究视为新的研究立场和研究策略,既不全盘否定西方文学批评,也不盲目固守本民族文学批评的传统,而是以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在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比较和对话过程中,不断反思自我,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学批评,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

2014年,王宁初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次年,王宁发表了《世界诗学的构想》一文,指出世界诗学的构想是在比较诗学和认知诗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理论升华”(王宁,2015)。在此基础上,王宁近些年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建构世界诗学的理论依据、具体内容以及现实意义等。王宁认为世界诗学的提出为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开辟了新路径,目前中国文学仍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中国学者应努力实现中国文学的“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因此,建构世界诗学有助于重写世界文学史,提高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和地位(王宁,2015)。

2017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俄文版(*Поэтика в Китае и на западе*)在莫斯科出版。俄文版的出版为此著进一步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继曹顺庆的英文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2013)(*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之后,在海外学界的又一次发声,有助于提高中国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国际影响力。

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中西比较诗学》(2018)是一部理论体系构建严谨且宏大的学术专著。作者以“逻各斯”“经”“道”为三个本体范畴来建构中西比较诗学理论体系,以语言论和本体论为思考路径,将中西诗学进行相互参照、考察与比较。

承接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在中西比较诗学以外的其他东方文论领域继续深入。在中印、中韩、中日以及中国与越南诗学、中国与阿拉伯诗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绩。尹锡南撰写了《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2010)、《印度诗学导论》(2017)等诸多论著,详尽论述了梵语诗学研究,开拓了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新维度,为我国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材料。王成在《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研究》(2016)中专门探讨了韩国诗学在论诗体式、诗歌创作论、批评对象、诗学观念等方面对韩国古典诗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出了对中韩古典比较诗学的意见和展望。祈晓明在其文《近年来中日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2014)中,针对近年来国内关于中日比较诗学研究论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甄别和纠正。周放的《比较视域中的阿拉伯早期诗学》(2014)探讨了阿拉伯早期诗学的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相似之处,为东方诗学的话语体系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此外,少数民族的诗学比较研究为中国比较诗学开辟了新领域。王佑夫主编的《民汉诗学比较研究》(2017)将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彝族、傣族、回族和壮族

等少数民族的诗学与汉族诗学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比较诗学,促进了民汉诗学双向交流与发展,为建立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新体系提供借鉴。正如作者在序言中(2017:7)指出:“民汉诗学既有各自的独创性,又有一致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才是有别于西方诗学或其国别、族别诗学的中国整体诗学的特性。”

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于比较诗学研究大有裨益。本文限于篇幅故不在此逐一列举。综观该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①学科化、体系化日益明确,研究视角愈加丰富,对学科方法论、研究范式做出了新的探索;②跨文明研究、差异性研究有了新尝试、取得了新进展;③少数民族的诗学比较是该时期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的诗学比较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④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研究论著的海外出版、中国学者的海外发声,促进了中国比较诗学以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海外传播与交流。⑤关于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条路上不懈求索。如今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国化”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立足于中国学术规则,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西方理论话语,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

6. 反思:当下中国比较诗学的“失”

在70年的风雨历程中,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国比较诗学在质疑中反思,在困境中求索,不断得以完善与发展。那么,总结当下我国比较诗学,还存在哪些缺失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6.1 平行类比研究多,缺乏诗学影响关系研究

西方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兴起的,中西比较诗学在萌芽期也是从平行研究开始的,因此,早期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基本上是类同比对的成果。就连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其四卷本中,中西诗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共计200多条,其中涉及中西诗学影响的条目仅六七条(赵毅衡,1981),可见钱锺书更侧重于平行研究。比较诗学与平行研究被自然地捆绑在一起,导致了影响研究与比较诗学被逐渐割裂。有学者指出当前的“比较诗学研究缺少了对影响研究的实证价值的重视,这确实是中国比较诗学的一个软肋”(张焕香,2014)。在王福和等编的《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2007)一书中,比较诗学被纳入平行研究的章节之中,所举例证也均属平行研究,而在影响研究的章节部分未曾提及。这种归类和论述直接制约了比较诗学的全面发展。

正如影响研究适用于比较文学研究一样,它同样也适用于比较诗学研究。因此,重新考量诗学影响关系研究十分必要。虽然目前的比较诗学研究成果中已有少数影响研究的成果,但均侧重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尚未深入探究中国对西方诗学的影响研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影响研究的比较诗学?首先可从世界诗学体系中所蕴含的中国元素着手。西方学者深受中国文化与文论影响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海德

格尔和德里达的理论建构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中国的朱子学说元素;笛卡尔所提出的“二元论”深受中国宋明理学的“理、气”二元论的影响;福科对物的本身秩序的看法,实际上暗合了老子“道”的思想;歌德受到中国文学的启示从而提出“世界文学”构想。

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曾合译《老子》,有研究表明,此翻译过程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影响深远。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写于1943年的文章,探讨荷尔德林诗作的思想意义,文中引用了《老子》第十一章全文。海德格尔认为,老子的这一章不仅是理解诗人独特性的关键所在,而且还与《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思想直接相关。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海德格尔直接引用老子原文的最早的明证(张祥龙,2005)。正是在与东方的对话之中同样返回到传统的开端处,海德格尔才能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论及老子的“道”(Tao),认为“道”是老子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该词中或许隐藏着某些东西,即关于思之言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只要我们让这一名称返回到它的未被言说之中,而且我们能够完成的话,一切皆道路(海德格尔,2004:191-192)。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道”的这番论述,实则近乎老子“玄之又玄”的观点。在1957年《同一律》的演讲中,海德格尔将古希腊的“逻各斯”与中国的“道”共同作为不可翻译的思想引导词而加入“本有”(ereignis)的说法中(海德格尔,2014:47)。

德里达自称曾在巴黎高师读过中国历史,他说:“我对中国的参照,至少是想象的或幻觉式的,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我所参照的不必然是今日的中国,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字语言相关。所以,在近四十年的这种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缺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对此我是意识到了的,尽管我无法弥补。”(德里达,2001:5-6)

除此之外,诸如黑格尔、瑞恰兹、莱布尼兹、胡塞尔、伏尔泰、瓦雷里等西方著名学者都深受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影响。曹顺庆在《比较诗学新路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以上例证说明了中西文学、诗学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而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一直被忽视。在当下进入跨文明研究的进程中,比较诗学研究应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结合中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在继续深化平行类比研究的同时,诗学影响关系研究极具研究价值,可作为创新点大力发展。

6.2 比较诗学片面求同,缺乏对差异和变异的关注

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影响下,其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求同模式。当代文艺理论是建立在与西方求同基础上的,几乎是对西方文论的全面承袭。就连钱锺书的比较研究,也是将共同性作为东西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钱锺书采用了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秦海鹰,1996)。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采用西方诗学构架,通过对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结构进行改造,简单机械地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入西方文论话语框架中。在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中,钱锺书是求“同”,

而刘若愚是以“同”为出发点。两位体现了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的特点,即以求同为目的,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文学理论”。这就导致了对“异质性”研究的普遍忽略。其后果之一便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命运。由于学界忽略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处处套用西方文论,导致了中国文论话语失落。

在笔者看来,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非只是简单的求同。缺乏对“异”的关注,必定会造成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被忽视,因而无法在尊重各自文明特质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因此,比较诗学应当关注差异与变异,既要探究在文论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以及类比研究相互阐发中所生成的变异,也要清楚地辨析不同文明间从根本上相异的特质。早在曹顺庆之前,叶维廉便已认识到东西方文化“模子”之间存在差异,因而提出“文化模子说”。目前,刘圣鹏(2016:3)也关注到了差异性,并以之为核心论述了当代比较诗学,他在书中指出:“比较诗学的主旨并不在于建立普适性的理论,而恰恰要以差异性形成对全球化的制衡局面,在全球化和差异性之间保持一种必需的差异性和适度的普遍性。”胡亚敏(2012)也认为:“差异性研究并不拒斥西方文学批评,也不意味要固守本民族文学批评传统,而是主张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在中外文学批评的交流和交锋中探寻既有普遍价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新径。”

笔者强调差异比较的比较诗学研究,并非完全反对求同比较,而是认为单纯求异与片面求同都会导致诸多弊病,影响研究效果。就现状而言,对辨异的关注度仍然不够,故而笔者重点倡导差异比较,以“比较既周”的意识,以期求同与辨异能成为同等重要的两大途径,使比较诗学研究更为完整、全面。如今“话语失落”的根本原因正是对异质性的忽略。因此,变异学的提出弥补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一味求同的研究思维。只有加强对不同文明“异质性”的关注,才能建立一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话语。

7. 结语

1949年以来,中国比较诗学不断反思与探索,从具体比较到学理方法思考,从零碎化尝试到学科体系化研究,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从范畴术语的比较到意义生成方式的比较,从“西方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从“跨文化”到“跨文明”,从求同到求异,中国比较诗学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基于“西方话语”的比较诗学构建,导致了文论“失语”“中国古代文论已死”的症结弊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又造成了西方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70年的“得”与“失”告诫我们,只有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吸收、接纳西方文论的传播影响,在明确双方文论话语异质性的平等对话中,形成自身的文论话语变异,最终在文学他国化的进程下,才能完成自身的文化创新。70年的“得”与“失”启示我们,只有把握传统文论话语的生命活力,寻求中国文论发展的合理定位,开辟中国文学传播的有效途径,创造出面向世界的中国学术话语成果,才能使得中国文论话语重获新生,开辟出比较诗学繁荣发展的新路径。

目前,比较诗学已进入到深入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从影响研究去探索比较诗学,有利于挖掘文学现象的深层追溯;强调对不同文明“异质性”的关注,有利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促进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通过不断地开拓创新,比较诗学定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推进中国的文艺研究现代化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 [2] 曹顺庆.跨文明研究:把握住世界学术基本动向和学术前沿[J].思想战线,2005(4):57-61.
- [3] 曹顺庆.异质性与变异性——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J].东方丛刊,2009(3):1-15.
- [4]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8.
- [5]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6]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7]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胡亚敏.论差异性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2(4):39-45.
- [9] 黄维梁.宏微并观 纵横比较 彰显中国——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评介[J].中国比较文学,2014(1):199-203.
- [10] 季羨林.东方文论选·序[G]//曹顺庆.东方文论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11] 刘圣鹏.中国当代比较诗学:源流、话语和范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 [12]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J].中国比较文学,1996(2):77-87.
- [13] 饶芃子.比较诗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4] 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5] 王宁.世界诗学的构想[J].中国社会科学,2015(4):169-176.
- [16]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 [17] 王佑夫.民汉诗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
- [18] 余华.东西融贯探本溯源——读曹顺庆新著《中外比较文论史》[J].中国比较文学,1999(1):138-141.
- [19] 张焕香.比较诗学研究可以排斥影响研究吗?[J].中国文学研究,2014(3):111-115.
- [20] 张祥龙.海德格尔论老子与荷尔德林的思想独特性——对一份新发表文献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2):69-83.
- [21] 赵毅衡.《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J].读书,1981(2):41-47.

责任编辑:朱晓云

《力量》中的狮子书写与跨文化生态对话 ——建构多元文化生态话语

胡志红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在美国土著作家琳达·霍根的著述中,动物是常客,有时还成了主角,因而成了作品关注的中心。她时常刻意借助对动物或人与动物间关系的描写来彰显土著文化的生态异质性,开展土著文化与主流文化在环境议题上的对话,以敞亮破解环境困局的土著文化之道。本文尝试通过探讨霍根小说《力量》中狮子书写的生态文化内涵,凸显两种文化在狮子保护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而揭示环境危机与土著文化生存危机之间的深层关联,并借此探寻应对危机的多元文化路径。

关键词:琳达·霍根;《力量》;狮子书写;文化差异;文化对话

Lion Writing and Cross-Cultural Eco-Dialogue in *Power*: Construction of Multicultural Ecodiscourse

HU Zhihong

Abstract: In the writings of Linda Hogan, a native American woman writer, the animals are the frequent characters, and sometimes protagonists, which become the focus of her work. She often highlights the ecological heterogeneity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by focusing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animals or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s and animals, thereby unfolding the conflict and dialogue between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mainstream one with regard to the environmental agenda. As a result, the native American solution to environmental dilemma is revealed.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briefly analyses the eco-cultural meanings of lion writing in *Power* by Linda Hogan and emphasizes their radical difference of opinion over the issue of lion protection so as to lay bare the deep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志红,男,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学文化及生态批评研究。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survival crisis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In this way,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multicultural way to cope with crises.

Key words: Linda Hogan; *Power*; lion writing; cultural difference; cultural dialogue

0. 引言

琳达·霍根(Linda Hogan, 1947—)是当今美国土著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高产多才,兼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及环境主义者于一身,其著述广涉文化身份、土著文化保护、社会公正、环境公正、环境救赎、性别及仁爱等议题。其中,对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探究也是其重要议题之一。在其著作中,动物是常客,有时还成了主角,因而成了作品关注或再现的中心,她也因此广受生态批评界的关注。霍根处理动物的方式独特,她对它与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无论是冲突对抗还是友善交往——的描写往往着墨不多,即使它是主角也是如此。她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借助对动物或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来反映美国土著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让动物成为反映人类种族间复杂纠葛的一面镜子。通过动物描写,霍根也开启了文化间在针对环境议题上的冲突与对话,彰显土著文化的生态异质性,以破解环境困局的土著文化之道,探寻应对环境问题的可行性多元文化路径。由此看来,霍根的动物书写不仅具有明确的环境公正取向,而且还具有强烈、自觉的跨文化对话意识。

比较而言,在描写动物与人之间的接触时,霍根与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或20世纪的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梅尔维尔的名篇《白鲸》(*Moby-Dick*, 1851)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中,鲸鱼、马林鱼或鲨鱼似乎都成了故事主角,梅尔维尔在其著作中通过大量描写主人公亚哈(Ahab)船长与巨鲸之间的直接冲突、对抗来表现作品复杂神秘之主题;海明威在其著作中也是通过大量描写老渔夫桑提亚哥(Santiago)与鱼,尤其与鲨鱼之间的殊死搏斗来塑造永不言败的“硬汉”形象。当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两位作者对人与动物之间冲突的描写也映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他们的生态观。然而,他们的小说只是笼统地考量脱离社会语境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小说主人公的肤色、性别或贫富问题。换句话说,他们的动物书写缺乏环境公正维度,因而在描写动物与人之间的接触时,淡化生态维度,缺乏种族视野,更未综合考量二者之间的复杂纠葛,因而从生态多元文化的视角看,他们的作品缺乏当代环境公正取向的生态文学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笔者主要就霍根小说《力量》(*Power*, 1998)中的狮子书写所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给予简要的分析,并借杀狮事件进行土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交锋与对话,深刻揭

示环境危机与土著文化生存危机之间的深层关联,谴责主流社会针对美国土著的环境种族主义行径。

1. 杀狮事件悖论之真相:文化异质性

关于“动物”在霍根作品中的重要性问题,在《力量》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说明,因为整部小说故事都围绕一头被土著人猎杀的佛罗里达狮展开,而对它的具体描写则非常少。小说通过杀狮所引起的各种纷争开展印第安文化与主流白人文化之间的对话,进而探讨土著人之生存、文化身份、土著信仰及环境保护、主流自然观及土著自然观等议题间错综复杂的纠葛。

《力量》的背景设置在佛罗里达州,故事情节也比较简单,一位名叫奥米什图(Omishto)的16岁泰戈部落(Taiga tribe)少女是故事中杀狮事件的目击者和叙述人。她目睹了她姑姑土著妇女阿玛·伊顿(Ama Eaton)在暴风雨之夜捕杀一头濒危的美洲狮“西萨”(Sisa)而招来两场官司。作为证人,奥米什图也与阿玛一道经历两场审判。一场因违反濒危动物保护法在白人法庭接受审判,因证据不足,阿玛被判无罪;另一场是接受部落法庭审判,她的罪与其说杀了一头狮子,不如说是在杀狮子之前没有经泰戈部落成员共同商议和没有将被猎杀狮子的尸体带给部落长老看,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尽管阿玛遭到本族人的驱逐,似乎了结了这桩案子,但该案实际上并未真正了结,事实上也永远不可能了结。因为在捕杀濒危动物问题上,土著文化与主流文化在立场上存在根本的分歧甚至对立,所以不可能找到明确、合理、公正的解决办法。正如霍根在《力量》中写道:“根据条约规定,土著人阿玛可捕杀狮。尽管这头狮已病入膏肓,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但杀狮又激怒了要保护它的人(主要是白人)。对此,我也表示认可。同时,我也认同条约赋予土著人的权利。那么怎么会两种真理相互抵触呢?”(Hogan, 1998: 138; 以下引用该著只标明页码)由此可见,针对杀狮事件,两种文化的立场犹如两根平行线,没有交叉,所以找不到契合点,因而杀狮也就无所谓对与错,如果真要判定当事人是否有“罪”,完全取决于裁判人站在谁的文化立场上说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玛无异于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窘境,因为不论谁在裁判杀狮事件,她都会遭到惩罚,无论这种惩罚来自白人法庭还是土著部落法庭。

白人法庭与土著部落法庭对待“杀狮”事件的不同回应揭示了两种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杀狮事件”的审判过程所涉及的“并不是关于法律、秩序或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涉及在场与不在场、看得见与看不见以及这些范畴在一起运作的机制”(McClinton-Temple, 2007: 280)。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阿玛既不认同白人文化,也不接受部落成规的约束,擅自作主,捕杀病狮。在法庭上她还撒谎,不说出全部真相。由此可见,她既不属于白人社会,也不属于部落社区,因而陷入一种可称之为“终

极疏离与孤独”的窘境。然而,在她的“疏离与孤独”背后既隐藏着狮子成为“濒危”和“病态”动物的历史、文化及现实根源,也存在着当下主流社会动物保护主义话语背后的“终极文化悖论”,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究。因此,我们就得去了解印第安生态观、其主导下的土著文化实践以及土著文化的生存困境。

2. 印第安生态观: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神圣一体构建

美国土著生态观认为,人与非人类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体同构的神圣关系,都是神圣宇宙中平等的普通成员,二者不仅相互联系,而且还生死相依,并共处于一个神圣的生命网中。作为生命网中掌握强大科技力量的成员,人应该做的不是征服“他者”,而是为生命网的命运担当更大责任。简要地说,针对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土著文化传统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世间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性和生命世界的神圣性(Hughes, 1996:10-22)。这两个特征一直回响在土著文化传统中,并在霍根的著述中,尤其在《力量》中反复浮现。关于第一个特征,印第安文化研究学者J. 唐纳德·修斯(J. Donald Hughes)就认为,它反映了土著文化生态观与科学生态学之间存在重要契合,因为二者都强调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是一种整体主义取向的生态观。为此,他这样说,一旦美国印第安人理解生态学基本观点,诸如“一切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互联系,我们不是地球的统治者而是与其他生命形态平等的公民”等观点后,他们一定会认同这些观点,因为他们的生存哲学实际上一直就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则(Hughes, 1996:22)。至于第二个特征,它却是印第安文化独有的世界观。该世界观认为,人的一切自然经验皆具有精神性,只能通过体悟或感悟方能通达天地万物,并与它们自然而然地合为“大一”(Oneness),对此,一个置身于该文化之外的人几乎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在自然面前必须保持敬畏之心,常怀感恩之情,对自然的馈赠要回报,决不能忘恩负义。如果一味向自然单向无度索取,或肆无忌惮地对待自然,必遭报应。印第安人的这种自然观构成他们文化本然的一部分,贯穿印第安孩子的教育,甚至每个人的教育的始终,并在各种仪式中不断强化,进而成为他们性格中一种自觉的意识,影响他们的行动,主导他们的生存实践(Hughes, 1996:18-22)。在笔者看来,印第安文化的生态观与当代激进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诸派别,尤其深层生态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暗合之处,因为后者试图通过强调大写的“生态自我”凸显人与自然的整体合一。然而,这至多是现代科学精神和牛顿-笛卡尔哲学对“自然神性”摧毁后重建人与自然在物质上、精神上相互联系的一种精神诉求或尝试,乌托邦色彩浓厚,难以产生现实效果(胡志红, 2015:20-25)。由此可见,印第安生态观是一种比当代生态中心主义哲学更“深”、更“激进”的生态世界观。

霍根作品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在这个世界里,植物和非人类动物之命运与我们人类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为我们没有了解每样东西如何与其余万物如何联

系,所以我们一直在糟践它”(Schweninger,2008:185)。从科学的角度看,霍根的这种观点与当代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的观点完全一致。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所指出的生态学的第一条法则就说:“每一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康芒纳,1997:25)。对此,霍根在其创作中反复表现、阐释,在《力量》中也不例外。同时,她也像其他经典自然作家一样,对当代人已失去曾经与自然世界保持的亲密关系深表惋惜。

在《力量》中,霍根的主要兴趣是找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强调人对自然的责任,而不是对狮子进行科学的或历史的描写,也不是对杀狮事件法律审判过程的详细记录。正如批评学者卡丽·鲍恩·默瑟(Carrie Bowen-Mercer)在探讨《力量》中关于“生存”的议题时指出:在讨论有关人的话题时,我们会发现土著人与白人在人生观上的对立,还可认清在对待土地、动物及传统方面,我们的哪些行为模式符合伦理规范。至于何种因素对人之生存和环境更为重要,对此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认识(Schweninger,2008:189)。借此,霍根挑战西方主流自然书写作家所确立的自我与自然之间二元分离的观点。同时,她也坚决认同阿玛与她周围世界间的“终结疏离”。也就是说,阿玛既拒绝被白人文化同化,也与传统部落文化保持距离。她杀狮事件本身既违反主流社会之法,也违反部落传统之规,这就充分表明她的“终极孤立”。小说的张力就在于阿玛性格的复杂性和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论的解构。霍根在该小说中否定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生态(eco)与自我(ego)之间的二分。当然,她也接受了自然书写是科学与抒情的融合。她对佛罗里达狮子的叙述更多是一个宏大的隐喻,而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这头狮子代表土著民族的生存状况,当它带有抒情或诗意的色彩时,它就失去了与田野考察报告中描述的现实中的佛罗里达狮之间的关联。其中,最明显的象征描写就是奥米什图清醒认识到,作为一个物种的佛罗里达狮的濒危状况与小说中虚构的泰戈部落的生存状况何其相似:“它们的数量如此少,简直跟我们一样少。只剩下30头,也许更少。”(58)她感觉到与那头被杀的狮子仿佛“同是天涯沦落人”,因而狮子的惨状,她就同亲身经历过一样。她说道:“就像这片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土地,我现在明白,我们都有同样的遭遇,我们在这儿的三个,也就是,阿玛、狮子和我。”(69)他们都遭践踏,都面临濒危。

奥米什图除了明确这头狮与泰戈部落之间的同一性外,还通过反复提及阿玛与狮子之间的相似性,以强化人与非人类之间的情缘关系。她强调指出:“这头狮子就像她,也像我。”(69)小说中对狮子的描写与奥米什图对阿玛的描写非常相似。当读者第一次见到狮子时,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它是活力四射的动物身体,肌肉健壮。”(69)奥米什图也是这样描写阿玛的:“她多么富有女人味,身体强壮,富有曲线美。”(63)在奥米什图看来,阿玛尤其像这头狮。像狮子一样,阿玛被融入了自然。阿玛浑身透露出自信,无所畏惧。然而,像狮子一样,有时她似乎也身心疲惫,茫然无措。奥

米什图还注意到：“狮子的牙齿坏了，跳蚤和蝉都在从这个毫无生气的身体逃离。”(69)像狮子和她的房屋一样，阿玛随时都可能顷刻坍塌。简言之，像她捕杀的狮子一样，她时而威猛强健，时而又软弱无力。在法庭上她精神抖擞，态度坚决，可有时她又萎靡不振，说话有气无力。在欧美人面前，阿玛“就像秋天的枯草”。所以，当阿玛要射杀狮子时，奥米什图告诉她你在杀你自己，阿玛则回答道：“我明白。”(130)杀狮子就是杀自我。显而易见，狮子的遭遇反映了泰戈部落和土地的遭遇：“狮子族也饥寒交迫，病魔缠身。”(192)在此，霍根坚信，人与狮之间，大而言之，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神圣的同一性，也充分体现了“地方与身体的生态融通”(韦清琦，2019:65)，生态—自我或曰人与自然二分的西方传统观念自然而然就坍塌了。通过叙述人奥米什图的讲述，霍根深信，人与狮子之间存在同一性，对此自然书作家往往不予认可。

当然，面对狮子和狮子族的濒危处境，也为了表达人与土地之间的神圣同一性主题，霍根必须揭露导致“濒危”的历史文化根源，以探寻狮子和土著文化救赎的共同文化路径，为此，她被迫担当拯救狮子与部落的神圣使命，大胆“违背”科学事实。

3. 狮子书写：对主流科学精神的神圣背离

霍根与西方自然书作家之间保持距离的另一举措还表现在她刻意忽视佛罗里达狮健康状况良好的科学共识，而要借这头濒危的病狮服务于她小说的主旨。小说情节的最大悬念是阿玛一直向她的族群隐瞒这个关键事实——她杀死的是一头浑身跳蚤、奄奄一息的病狮。泰戈族群的信仰和传说都要求这头被命名为“西萨”的狮子永远保持强健的体魄，因为他们是西萨的孩子，在他们的语言中西萨的意思是“像神一样，力大无穷”(73)。从“西萨”的内涵及他们与西萨间的关系可看出，他们在狮子身上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而他们绝不能接受“病狮”的残酷事实。如果告诉他们真相，或许“它会将他们的世界劈成两半，让他们身心俱毁，甚至将他们在世上拥有的一切都卷走”(166)。关于这头病狮，奥米什图也发誓对它的健康状况保持沉默。小说的核心要素，即土著法庭对阿玛的最高惩罚——阿玛的放逐，也系于此。在生态批评学者李·施文尼格尔(Lee Schweninger)看来，尽管霍根对待关于佛罗里达狮健康状况的科学事实的处置似乎显得随意，但这并不减损该小说的意义。(192)就针对这部小说而言，霍根需要读者关注的不是西方科学事实而是真理本身。正如奥米什图在法庭陈述道：“我不能说出真理，我只能说出事实。我不相信这个法庭，但我也不撒谎，当然不是出于对法院或法官们的尊重，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尊重。”(127)实际上，霍根用不准确或似乎误导人的科学事实并不能说该著作不符合自然书写一般的标准，而只是表明她关注的不是个别佛罗里达狮的身体健康问题。归根结底，正是西方的世界观和有关进步的神话才导致作为一个物种的佛罗里达狮处

于现在的危险状态。与此同时,她还传达了土著文化蕴含的巨大力量,一种面临西方气势汹汹的科技力量依然能在大地上持续生存的神秘力量。“霍根关心狮这个物种,关心、教育她的读者,与其说通过讲述关于狮的事实和科学,不如说告知读者人类对自然所犯下的罪行和人应该对自然世界承担的责任。”(Schweninger, 2008: 192-193)为了在狮与人共生的世界传播生态知识,霍根将大众,也包括读者都推上法庭,与阿玛一道站在被告席上进行审判。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都在接受审判,这是集体起诉。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霍根似乎故意“违背”了有关佛罗里达狮健康状况的科学真理,但她通过对这头病狮的书写,揭露了西方文化有关“发展、进步”神话的真相,展示了土地本位的部落民族、土著文化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在《力量》中,霍根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彰显印第安文化蕴藏的巨大“力量”,它包括自然的力量、狮的力量、神秘的力量。她也告诉人们,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佛罗里达狮和土著人能幸存下来的秘诀靠的就是神秘的力量。“神秘是力量的一种形式”,狮子就是力量的体现,因而个体的狮子就代表现实的生存力量。小说中的这头佛罗里达狮从一出场就体现着神秘。小说中的泰戈族也叫狮族,他们从动物图腾——佛罗里达狮——中获取不竭的精神力量。狮比他们先到这儿,还教会他们说“生命”(85)这个词。作为自然力象征的狮子一旦与人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在阿玛身上得到体现。为此,霍根坚持以神秘的力量抵御西方科学真理,对抗冰冷的事实,挑战依靠所谓客观事实的主流美国科学。为此,她告诫人们,“我们必须记住,神灵和神秘之地就其实质来看并不希望让人了解”(Hogan, 1995: 20)。

另外,霍根还进一步深刻指出了狮子濒危状态的深层原因——栖息地的丧失。由于人的入侵,狮子的一切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失去了神秘,失去了天然保护。奥米什图说:“我想到狮子,它们出没在柏树、红树丛林和沼泽地中,那里人是不应该闯入的。可是,自从高速公路开通后,十多头狮子被车撞死。”(123)根据生态学家的研究,“佛罗里达狮是风景动物,它的健康和繁育取决于栖息地的质量”(Schweninger, 2008: 200)。从这个角度看,霍根借奥米什图之口对狮的生存困境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安全栖息地的丧失是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狮子或一群狮的健康问题。当然,土地自身的健康是关键。尽管法官、律师、地产开发商及果农等都完全知道,破坏狮的栖息地无异于猎杀保护动物。然而,毁坏栖息地却不违法,不受法律制裁,这就是奥米什图要告知大家的真理。

由此可见,泰戈族及其生存方式蕴藏着一种不可解释的神秘力量,总能呈现给他们的生活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期许,并能确保他们与自然间保持一种可持续的、合乎伦理的、生机勃勃的关系。直到今天,神秘对整个美国土著民族及其他信奉世界神秘力量的边缘化族群的生存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祛除世界之神秘或曰“世界的祛

魅”无论对人类自身还是非人类世界来说都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4. 狮子救赎的根本路径:世界的返魅

实际上,为了服务于效率和产出的最大化,现代西方科学试图运用严格的科学分析,再结合精确的计算,以操纵自然和人的做法,伤害了我们的身体,麻木了我们的精神,破坏了我们的星球,并引发了严峻的生态和人文危机,进而导致了巨大的世界灾难。当然,这种世界性大悲剧发生的前提就是让曾经神奇、魔幻的有机世界失去神秘,变得透明,并沦为无生命的客体,任凭客观中立的科学手术刀的肆意切割和无情宰制。鉴于此,霍根在《力量》中通过对一头神秘的病狮、神秘的狮族人及其与狮子间神秘关系的书写,充分揭示了在气势汹汹的工业技术文明进攻下狮子与狮族的强大与坚韧,以彰显神秘之力。关于神秘的文化价值,社会学家和生态批评家也都给予了诸多论述。

现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深刻检视西方文明时就从相反的角度揭示了神秘对于世界的意义。关于这一点,韦伯与霍根之间实际上存在诸多暗合。韦伯指出,不像世界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实际上从自然和社会的概念中剔除了神话、神秘和巫术,从而导致“世界的祛魅”。其集中表现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技术文化对自然世界和人之精神的操纵,现代工业文明为达到统治自然之目的,将一切不能量化、不能客体化的非物质存在赶出世界或进行压制,让鲜活灵动的自然世界和精神饱满的人都变成无生命的物质资源,任凭技术理性的盘剥。当然,韦伯并不主张通过让世界复魅而走出现代性困境,而倡导借助理性与道德责任迎接现代生活的各种挑战(Perry, 1993: 330-332)。

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2001: 196-223)在其《为濒危的世界而写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一书中依据韦伯关于世界祛魅的逻辑指出,要解决现代性问题,至少要解决最大、最复杂的现代性问题之一——环境问题。为此,我们就应该扭转现代世界的运行方向,让世界复魅。在他看来,海洋生态危机是现代性一个最大的危机之一,因此让海洋复魅也是解决危机的重要文化策略。由此看来,以布伊尔为代表的生态批评家将生态危机界定为文化危机是合情合理的。“海洋是最大的公有地,如果有公有地的悲剧发生,那么,这个将是最大的悲剧。”(Buell, 2001: 199)

海洋的复魅,就是要将海洋及生活在其中的最大的动物鲸神秘化,将鲸作为海洋环境的偶像,恢复其昔日的神秘地位,让其成为保护海洋生态的守护神。因此,自然书写想象必须转变,不仅要让鲸等动物成为叙事的主角,而且还必须呈现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

布伊尔还通过分析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梅尔维尔及洛佩斯(Barry

Lopez)著述再现自然的方式,多角度探讨了实现跨物种间沟通的可能路径,旨在探寻让大熊猫、大象、狮子、老虎及鲸鱼等大型动物成为环境偶像的文化策略,从而让祛魅的自然重新罩上神秘的光环,借此重拾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卑,并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在布伊尔看来,让地球上最大的动物鲸成为海洋的象征,是因为自古以来鲸似乎分享了海洋的神秘、难以言说的“他者性”(otherness),象征神圣的力量,不论这种力量是善还是恶,它都起着保护海洋的巨大作用。海洋被祛魅之后,人的行为失去了文化的约束,再加上有了强大杀伤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人类就开始大肆向海洋进军,去征服,去掠夺,甚至还将海洋变成垃圾场,进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尤其威胁以海洋为生的边缘化族群的生存。庆幸的是,人类的无知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扭转的程度。为此,布伊尔疾呼“想象海洋”,重构海洋文化的神秘力量。布伊尔(2001:222)甚至还认为,如果梅尔维尔能预见现代的捕鲸者几乎灭绝了全球的鲸,他一定会“重新构思他的结尾以及小说的其他方面”,也许他会撰写一本完全不同的关于鲸的寓言。

令人高兴的是,部分有见识的生态文学家和当代生态学者早已有所认识,他们自觉放下人类的傲慢与偏见,弃绝主流白人文化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土著族群和被贬低的大自然,向他们“讨教”人天沟通、交流的生态智慧。比如,著名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2016:64-71)早在《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中就记录了他徒步穿越千里荒野,用肉身去接触自然,用心灵去感悟万物,以探寻人与自然间沟通、理解与交流的可行路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Tu Weiming)(1994:19-28)在《超越启蒙心态》(*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一文中极力倡导超越主流社会的傲慢心态,去发掘长期被边缘化的土著文化传统的生态智慧,开展平等的跨文化生态对话,以构建开放多元的生态型人类文化,全力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

5. 结语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在《力量》中霍根通过“偏离”主流自然书写传统,“违背”主流科学事实与精神,书写病狮,实则是为了与西方主流文化开展深度“环境”对话,彰显土著文化万物一体的生态异质性,敬畏自然的神秘力量,守护美国土著认知方式。当然,霍根也借狮子书写发起了对主张人/天二分的西方主流文化的深刻批判。她对狮的描写真可谓深入自然通达精神。当然,“病狮”的病因不在于狮自身,而在于主流文化压力下栖息地的急剧收缩。霍根对“病狮”的关注,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或真理不是佛罗里达狮是否健康的问题,而是要揭露“濒危物种”和“濒危族群”面临“濒危窘境”的根本原因——人类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合谋的西方殖民文化。归根结底,“病狮”之病根在于病态的西方文化。由此可见,霍根的狮子书写所关注的不限于濒危的狮子,还包括天地万物,甚至人,因而她的狮子书写就自然而然地升华为真正的“自然书写”。

简言之,霍根借助狮子书写以揭示美国土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在生态观、价值观及文化观等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差异,旨在解构主流文化对生态议题的话语垄断,力荐透过多元文化视野综合考量社会、文化、生态及社会公正议题,开展生态议题的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以建构涵括少数族裔生存和文化议题的多元文化生态话语。

参考文献

- [1] Buell, Lawrence.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M].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of University, 2001.
- [2] Hemingway, Ernes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M]. New York: Scribner's, 1952.
- [3] Hogan, Linda. *Dwellings: A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Living World*[M]. New York: Norton, 1995.
- [4] Hogan, Linda. *Power*[M]. New York: Norton, 1998.
- [5] Hughes, Donald. *North American Indian Ecology*[M]. 2nd edition. El Pass: Texas Western Press, 1996.
- [6] McClinton-Temple, Jennifer & Alan Veli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7.
- [7] Melville, Herman. *Moby-Dick*[M]. Indianapolis: Bobbs, 1964.
- [8] Perry, Marvi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 [9] Schwenger, Lee. *Listening to the Land: 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Landscape*[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 [10] Tu, Weiming.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G] // Mary Evelyn Tucker & John A. Worldviews and Ecology: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the Environment. Grim.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4.
- [11]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12] 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3] 韦清琦, 张晓雯. 回归地方与身体——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的整体性生态书写[J]. 英语研究, 2019(10):59-68.
- [14] 约翰·缪尔.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M]. 王知一,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朱晓云

“双重认知轨道”： 认知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申 丹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认知转向以来,文学中的认知成为热门话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关注这样一种认知文化现象:在某种文化环境中,信息发出者有意提供两条认知轨道:第一条能达到正确理解,第二条则通向错误理解。信息发出者迫于文化力量的压力,诱导受众沿着第二条轨道走,在错误理解的掩护下,使不被文化语境所容的理论概念或文学作品能够面世和生存。就理论概念而言,布思提出的“隐含作者”为研究这种认知现象提供了典型例证。在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中,布思通过“首因效应”、隐喻与字面意义的并置、重解码轻编码等手段对“隐含作者”进行认知伪装。学者们普遍沿着布思铺设的错误认知轨道前行,在推理和关联过程中,屏蔽了通向正确理解的相关信息。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一些作者迫于文化语境的压力,有意提供两种认知可能性,在情节发展层面进行认知伪装,对读者加以认知误导。这种复杂的认知现象既对现有认知研究模式构成了挑战,又为认知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双重认知轨道;文化环境;隐含作者;认知误导;挑战和机遇

“Double Cognitive Trajectories”： Challenge to and Opportunity for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SHEN Dan

Abstract: Since the cognitive turn in the 1990s, cognition in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and in recent years,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has formed an emerging area of inquiry. But no matter moving in what direction, cognitive investigations have so far neglected such a phenomenon: in

作者简介:申 丹,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雅讲席教授,博士,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论研究。

proposing a theoretical concept or creating a literary work, the theorist or author, under cultural pressure, purposefully set up “double cognitive trajectories” for the addressee, with one trajectory leading to correct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ther to misinterpretation. The latter functions to camouflage the concept or the literary work, enabling it to be accepted in that cultural context. The putting forward and subsequent reception of Booth’s “implied author” well exemplify this cognitive phenomenon, which present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existing cognitive models, models that need to be extended and transformed to cover the double cognitive trajectories in question. In terms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the double cognitive tracks laid by some authors under cultural pressure complicate readers’ cognitive processes, which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extending cognitive cultural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double cognitive trajectories; cultural context; implied author; cognitive traps;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都出现了认知转向。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认知结构或认知机制与文化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认知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否考虑文化,认知研究者往往关注日常生活、口头叙事或虚构作品(包括文学、电影等),尚未有人考虑理论概念这一范畴。此外,在以往的文学认知研究中,无论是否深入挖掘作品的意义,学者们往往仅沿着一条认知轨道,探讨作者的一种信息安排,以及读者的规约性思维建构(Herman, 2002; Stockwell, 2002; Giovanelli, 2015),即便考虑文化的作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种文化或不同文化中单一轨道的认知(Zunshine, 2010; Dobrescu, 2012)。诚然,也有学者探讨个体差异或不同理论框架如何影响对作品的理解(Yacobi, 2005; Nünning, 1999),这与学界广泛开展的对个体认知风格如何影响学习的研究形成呼应,但依然关注的是个体单一轨道的认知。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关注这样一种认知现象: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信息发出者有意铺设两条认知轨道:第一条能达到正确理解,第二条则通向错误理解。为了应对文化语境的压力,信息发出者刻意对信息进行认知伪装,引导受众对信息形成普遍误解。若要解释这种认知现象,我们必须超越现有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化研究的思路,重点关注信息发出者的认知误导和受众的认知选择、认知冲突和认知屏蔽。

就文学理论而言,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提出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和这一概念的接受为这种认知现象提供了典型例证;就文学作品而言,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黛西蕾的婴孩》(*Désirée's Baby*)、《美丽的佐拉依德》(*La belle Zoraïde*)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启示》(*Revelations*)、《唱歌课》(*The Singing Lesson*)等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也体现了这种认知现象。这种以往被忽略的认知现象对现有认知文化研究构成了挑战,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本

文重点分析“隐含作者”,探讨布思如何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同时提供两种认知可能性,并通过设置阐释陷阱,导致中外学界对信息产生普遍误解。我们需要沿着两条不同的认知轨道来考察信息发出者的语言选择和信息安排,需要认识到有的语言标识同时在两条轨道上起作用,但意在表达不同的意义。

1. “隐含作者”的第一种认知可能性

20世纪中叶,形式主义思潮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仅谈文本和叙述者而不谈作者成为学术时尚。布思是芝加哥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他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的形式主义立场,聚焦于文本,不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但他将注意力从文本诗学转向了修辞学,注重小说家与读者的交流。当时,新批评大批“意图谬误”,关注作者的创作目的成为一种学术禁忌。然而布思从事的小说修辞学必须谈论作者如何通过各种文本选择来引导和劝服读者,以求达到自己的修辞目的。当时的学术氛围迫使不得不谈作者的布思在1961年面世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他通过种种伪装手法,同时提供了两种认知可能性:第一种通向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第二种则有意引导读者进行错误理解。我们首先考察第一种可能性。

(1)作者在写作时,不仅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和非个性化的“一般的人”,而且创造出“他自身”的一个隐含的版本,这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隐含作者。

(Booth,1961:70-71)

这是布思提出和界定“隐含作者”时写下的至关重要的第一句话。在这里获得认知凸显效果的是重复结构“创造出……创造出”。在我们的认知图式中,只有母亲可以通过怀孕,创造出另一个人(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是如此),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仅仅通过写作,就可以生产出另一个有生命的“一般的人”。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一般的人”只能是隐喻。布思采用了“不仅……而且”,将这一隐喻和后面的小句并置,“而且创造出‘他自身’的一个隐含的版本”,这种并置暗示后者也是隐喻。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一隐喻旨在表达的意义。在接下来的第二句中,布思将“创造”与“发现”并置,并在后面几句中明确了“发现”的意义。

(2)的确,对有的小说家来说,他们写作时似乎在**发现或创造他们自己**。

(3)正如杰萨明·韦斯特所言,有时“只有通过写作,小说家才能**发现**——不是他的故事——而是**故事的作者**,或可以说是这一叙事作品的**正式作者**(official scribe)”⁷。

(4)无论我们是将这位**隐含作者**称为“正式作者”,还是采用凯瑟琳·蒂洛森新

近复活(revived)的术语,即作者的“**第二自我**”⁸,毋庸置疑的是,读者得到的关于这一存在的形象是作者最重要的效果之一。

(5)无论他如何努力做到非个性化,读者**都会建构出一个这样写作的正式作者的形象**。(Booth,1961:71;黑体为引者所标)

在我们的认知框架中,一个人“发现”自己,指的是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状况——涉及的仅仅是“自己”本身。布思通过“或”这一连词使“发现自己”和“创造自己”成为同义表达,暗示所谓“创造出自己的一个版本”就是“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创作状态”。在第三句(“只有通过写作,小说家才能发现……故事的作者”)中,布思又往前走了一步,仅提“发现”,不再提“创造”,进一步明确“创造”的意思就是“发现”。这句话初看令人费解,因为“故事的作者”就是小说家,但跟上文相关联,可以悟出布思意在表达的是小说家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创作状态。

小说家通过写作发现故事的作者 = 发现自己在以特定的立场和状态来进行创作 = “隐含作者” = “正式作者”或“作者的**第二自我**” = “这样写作的正式作者”(the official scribe who writes in this manner)

因为布思用“或”这一连接词使“正式作者”与“作者的**第二自我**”成为同义表达,因此可以得出下面这一等式。

这样写作的正式作者 = 这样写作的作者的**第二自我** = 这样写作的隐含作者

布思还通过“写信”这一行为,将隐含作者就是作品的写作者加以明确表述。

正如某人的不同私人信件会**隐含**该人的不同形象(这取决于跟通信对象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不同目的),**作者会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而以不同的面貌在创作中出现**。(Booth,1961:71;黑体为引者所标)

在我们的知识储备中,信件只能隐含写信人的形象。通过跟写信的类比,布思明确表达出所谓隐含作者就是以**特定面貌进行创作的作者**,其做出的文本选择会**隐含其形象**。通过这一系列推理和关联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布思“隐含作者”的本意。

编码过程:

隐含作者是以特定面貌出现的作品的写作者。而“真实作者”是日常生活中的同一个人。

解码过程:

读者从隐含作者自己所做的文本选择中推导出这位写作者的形象(文本“隐含”这一形象)。

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理论概念。然而,面对当时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布思需要把隐含作者伪装成一个文本化的概念,与此同时,还要保留隐含作者的主体性,使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成为可能。

2. 中外学术界对“隐含作者”的错误认知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在西方和中国都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使之成为叙事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所有西方学者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落入了布思设置的认知陷阱(见下文),误解了这一概念。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Mieke Bal)下了这样的定义。

“隐含作者”指称能够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所有意思的总和。因此,隐含作者是研究文本意思的结果,而不是那一意思的来源。(Bal, 1997:18)

这完全剥夺了隐含作者的主体性,将隐含作者彻底文本化。布思最信任的学生、叙事理论界的权威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对隐含作者的阐释在西方学者中最接近布思的本意。

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精简了的版本(a streamlined version),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实际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版本”一词提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建构物。

(Phelan, 2005:45;黑体为引者所加)

费伦批评了以往的批评家将隐含作者文本化的做法,恢复了隐含作者的主体性,并将隐含作者的位置从文本之内挪到了文本之外(Phelan, 2005:40-47),但他依然将隐含作者称为“文本中的作者”(author in the text)或者“文本作者”(textual author)(Phelan, 2005:39),因为在他眼里“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建构物”。而作为“建构物”的隐含作者又怎么能在“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呢?这样就形成了无法避免的逻辑混乱。

除了个别例外,中国学者的阐释跟西方学者的大同小异,都认为“隐含作者”不是作品的写作者,而是写作过程中的创造物或建构物。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如果要赋予隐含作者主体性,就会形成无可避免的矛盾:隐含作者不是作品的写作者,却做出

了所有的文本选择,负责文本的设计和结构安排;真实作者是文本的写作者,但作品隐含的作者形象却不是真实作者的,而是没有写作作品的隐含作者的。这种近乎荒唐的逻辑混乱普遍存在于西方和中国学界对隐含作者的阐发之中,而中外学界将这种逻辑混乱归于布思本人,认为他提出的概念含有内在矛盾(详见申丹,2008:136-145;申丹,2019:18-29)。有趣的是,尽管布思对隐含作者的界定本身合乎逻辑,但在这一概念的接受过程中却出现了逻辑混乱,事实上,这恰恰是布思通过各种伪装手法,有意误导学界造成的。

3. 学术环境压力下对“隐含作者”的认知伪装

我们不妨仔细考察在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的压力下,布思如何通过语言选择和信息安排来诱导读者,让读者跟着他刻意铺设的另一条(错误的)认知轨道走,以便让“隐含作者”能够得到认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布思界定“隐含作者”的第一句话。

作者在写作时,不仅创造一个理想化的和非个性化的“一般的人”,而且创造出“他自身”的一个隐含的版本,这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隐含作者。

(Booth, 1961:70-71)

布思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作者在写作时,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创作状态,他不仅会带有文学创作中作者的共性,而且会带有他自己在创作这一作品时的特性(这一作品的隐含作者),这不同于其他作者在创作其他作品时的状态(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因此,我们从这一作品中推导出来的隐含作者形象,不同于在其他人的作品中推导出来的隐含作者形象。

中外学界的普遍误解:作者在写作时,在作品中创造出隐含作者,这不同于其他人作品中的隐含作者。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在布思的论述中,“创造”是一个隐喻,所谓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隐含作者,指的是作者本人以特定面貌进行创作,这不同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面貌。然而,所有西方学者以及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对“创造”加以字面理解,误认为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了另一个“隐含作者”,这与布思的伪装手法直接相关。请比较:

作者在写作时,不仅创造一个理想化的和非个性化的“一般的人”,而且创造出一个具有其自身特点的“特殊的人”。

在我们的认知框架中,一个人不可能创造出另一个人,因此不会字面理解“创造”一词。但布思很巧妙地采用了“创造出‘他自身’的一个隐含的版本”这一表达。

这符合现实世界中作者通过写作, 创造出一个**版本**这样的认知图式, 以此引导受众对“创造”加以字面理解。紧接着的小句“这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隐含作者”则巧妙地利用了“**作品**”和“**版本**”之间的相通性和兼容性, 引导受众将隐含作者字面理解为作品中的存在。这种手法误导了所有的西方学者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值得注意的是, 中外学界在阐释布思对“隐含作者”的界定时, 完全忽略了“作者在写作时, 不仅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和非个性化的‘一般的人’”这一令人费解的隐喻表达。可以说, 布思通过让读者觉得费解, 而诱导读者对之加以忽略。我们从读者的忽略也可以看到读者的认知选择性——选择性地忽略某些费解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对作者进行伪装, 布思(1961:74-75)不仅采用了“创造”这一隐喻, 而且将日常生活中的作者称为“**真实作者**”(real author)、“**真人**”(real man)。

(6)“隐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会读到的东西。

(7)我们把他作为那个真人理想化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形象推导出来。

(8)他是自己选择的总和。 (Booth, 1961:74-75)

作者在写作时, 会进入某种“理想化的、文学的”创作状态, 这不同于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布思一方面有意将“理想化的、文学的”这一**字面**表达与“创造出来的”这一**隐喻**并置, 诱导读者字面理解“创造”一词; 另一方面, 布思采用了“真人”或“真实作者”来指代日常生活中的作者, 有意让读者误认为与之形成对照的“隐含作者”不是“真人”或者不是“真实的”, 而是文本中的存在。此外, 布思还在第(7)小句以及书中其他地方转而聚焦于读者的解码过程(读者只能从文本中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形象)。这些手法协同作用, 将“隐含作者”伪装成作者(真人)在写作时创造出来的另一个文本化的实体。然而, 在上引第(6)小句中, 布思又用“‘隐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会读到的东西”来保留隐含作者的主体性, 并且在第(8)小句中强调“他是自己选择的总和”——隐含作者在写作时, 做出了所有的文本选择, 我们从其文本选择中推导出其形象。

在20世纪中叶, 西方批评界十分熟悉精神分析理论对人格结构的三分法(本我、自我、超我), 也完全接受对“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区分。布思也利用了大家广为接受的这一区分, 将隐含作者称为“第二自我”, 以此助力于将隐含作者文本化的认知策略。如果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作者是“第一自我”, 而以特定面貌进行创作的作者是“第二自我”, 这完全符合逻辑, 但无法被当时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所容。迫于学术环境的压力, 布思用隐喻将日常生活中的作者称为“真人”“真实的”第一自我, 而受众则字面理解布思的隐喻, 将与之相对照的“隐含作者”视为“真人”写作时在文本中创造出来的第二自我(“一个版本”)。

如前所析, 就布思提供的第一种认知可能性而言, 他从“创造”隐喻开始, 经过一

系列推理,最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写信,越来越明确地表达出所谓“隐含作者”就是以特定面貌出现的某一作品的写作者。然而,读者却没有跟着这一推理过程走,而是将思维定位于开头的这一隐喻表达:“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他自身’的一个隐含的版本……”

在这关键的第一句中,布思很好地利用了心理学家提出的“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Ebbinghaus)(1913/1964)提出,后被广泛用于记忆的心理实验。所谓“首因效应”,即最初出现的信息(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不易改变,甚至会左右对后面出现的新信息的认知(Perry,1979)。这是因为最初印象构成大脑中的核心知识或记忆图式,后面输入的信息会被整合到这一图式中去。“隐含作者”的接受体现出这样的认知特征:当后面出现与最初印象相冲突的信息,难以整合到最初形成的核心图示中时,读者会进行“认知屏蔽”,排斥这些相冲突的信息。也就是说,当我们解读对某个理论概念的界定时,定基调的第一句论述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头脑中这一概念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在读者的知识结构中,理论家界定某个概念,不会对这一概念进行伪装,不会开始的时候说“隐含作者”是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来的一个版本,后面又说隐含作者就是写作时的作者本人(其进入了特定的创作状态),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会先入为主地排斥后面出现的不一致的信息,认为“隐含作者”就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版本。

从概念合成的角度来看布思的论述,读者初步理解的“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写作时创造出来的一个版本”跟后面出现的“隐含作者是以特定面貌写作作品的人”发生了空间冲突,无法进行空间对接。在这种输入空间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中外学者都固守最初的理解,排斥新的无法兼容的空间信息。也就是说,受众不是根据文字结构和意义本身对心理空间进行组合、完善、拓展,而是沿着作者有意设置的错误认知轨道走,选择性接受和固化某些错误的心理空间信息,排斥与之相冲突的正确的心理空间信息。

4. 文学作品中的双重认知轨道

如果说在文学理论领域,理论家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有意误导受众认知的情况并不常见的話,在文学创作领域,这种现象则屡见不鲜。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在奴隶制废除之后,创作了《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迫于当时文化环境的压力,她铺设了双重认知轨道:在情节发展层面,她诱导读者把作品理解成一个反奴隶制的作品,而在文本深层,她创造了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含蓄表达出歌颂奴隶制、赞赏白人血统和抨击黑人血统的真实立场(Shen,2014/2016:70-92)。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发表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外学界都沿着其表层的认知轨道走,忽略了另一条通向隐含作者真实立场的深层认知轨道,误认为这是反奴隶制的进步作品。这种误解也跟肖邦某些作品的隐含作者在种族立场上表现出

的进步性相关,如《一件精美瓷器》(*A Dresden Lady in Dixie*)和《超越牛轭湖》(*Beyond the Bayou*)。在这些作品中,隐含作者不需要伪装创作立场,仅为读者铺设了一条认知轨道(诚然,个体读者在阐释时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偏离)。

新西兰出生的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和《唱歌课》中也含有双重认知轨道。为应对20世纪初英国保守的文化氛围,这两个作品的隐含作者在作品表层的情节发展和深层的“隐性进程”中分别铺设两条认知轨道,表层轨道引导读者将反讽的矛头对准有性格缺陷的女主人公,深层轨道则通向完全不同的理解:女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源于父权制社会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她是社会压迫的受害者,邀请读者对其加以深切同情。在作品发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学界跟着曼斯菲尔德在作品表层的认知导向走,却忽略了作品深层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Shen, 2014/2016: 111-124)。

在探讨读者对这种作品的认知时,我们需要超越以往认知研究的思路,关注隐含作者在作品中同时提供的两种相互对照的认知可能性,揭示作者如何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有意地对信息进行认知伪装,分析读者在认知过程中的认知选择、认知冲突,尤其是对与作品真实目的相关的信息的有意和无意的认知屏蔽。

5. 结语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认知文化研究关注认知架构和文化力量之间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尚未关注在文化环境压力下出现的双重认知轨道:一是对信息的正确认知(信息发出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二是学界普遍存在的对信息的错误认知,而这种误解又是信息发出者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有意误导受众造成的。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隐含作者”这一理论概念及《黛西蕾的婴孩》和《启示》等作品产生了错误认知。这种误解不是因为受众理解能力低下或有任何生理/心理上的认知障碍,而是源于信息发出者迫于文化环境的压力,不得不对相关信息加以伪装,铺设相互对照甚或相互对立的双重认知轨道。值得注意的是,当读者逐渐发现通向作品真实目的的另一条处于作品深层的认知轨道时,会改变对语言结构和信息安排的理解和判断,不断修正自己对隐含作者的修辞目的、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审美效果的看法,从而产生更为复杂的认知现象。

文学领域的认知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我们不能仅仅考察语言结构、信息安排和文学规约,也不能只考虑生产意义和处理意义的认知能力。文学理论概念的提出、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读者的认知过程都可能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以往的认知研究沿着单一轨道探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在概念合成研究中,学者们沿着一条认知轨道探讨受众如何通过心理空间的组合、完善和拓展来获得新显结构。在面对“隐含作者”和《黛西蕾的婴孩》这样的理论概念和文学作品时,无论是采用概念合成还是采用其他认知模式,这种单轨认知研究都会严重脱离实际,无法解释信息

发出者铺设的双重认知轨道,也难以解释读者对另一条认知轨道上的信息的拒绝接纳,遑论说明读者在发现作品深层的正确认知轨道后,如何重新进行推理和关联,调整认知走向,修正认知结果。这种复杂认知现象的存在,呼唤我们更新研究思路,修正和拓展研究模式。可以说,“双重认知轨道”不仅对认知研究尤其是认知文化研究构成了严峻挑战,而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 [1] Bal, Mieke.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2nd ed.) [M].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 [2]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3] Dobrescu, Caius. *Literary Criticism, Cognitive Culture, and the Wor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 *Interlitteraria*, 2012(1-2):108-120.
- [4] Ebbinghaus, Hermann. *Memory: A Contribution to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4.
- [5] Giovanelli, Marcello. *Text World Theory and Keats' Poetry: The Cognitive Poetics of Desire, Dreams and Nightmares* [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 [6] Herman, David. *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 [7] Nünning, Ansgar. *Unreliable, Compared to What? Towar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Prolegomena and Hypotheses* [G]//W. Grünzweig & A. Solbach (eds.).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Narratology in Context*. Tübingen: Gunther Narr Verlag, 1999.
- [8] Perry, Menakhem. *Literary Dynamics: How the Order of a Text Creates its Meanings* [J]. *Poetics Today*, 1979, 1(1-2):35-64, 311-361.
- [9]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Shen, Da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2016.
- [11]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12] Yacobi, Tamar. *Authorial Rhetoric, Narratorial (Un)Reliability, Divergent Readings: Tolstoy's "Kreutzer Sonata"* [G]//J. Phelan & P.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 [13] Zunshine, Lisa.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4] 申丹. 何为“隐含作者”?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136-145.
- [15] 申丹. “隐含作者”:中国的研究及对西方的影响 [J]. *国外文学*, 2019(3):18-29, 156.

责任编辑:郭建辉

《时间机器》：文类杂糅的叙事艺术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小说名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 作家杂糅了三个不同的文类, 既是科学小说, 也是政治寓言和乌托邦小说。三种文类各赋予了小说特殊的意义, 共同强化了小说文本社会批判的力度。本文首先阐述包含于小说之中的不同文类的成分与特性, 以及不同文类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在此基础上, 讨论作家在同一文本中聚合三种文类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 威尔斯; 《时间机器》; 文类; 叙事艺术

Time Machine and Its Trans-Genre Narrative Art

YU Jianhua

Abstract: H. G. Wells' *Time Machin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arliest science fiction in its true definition. Yet this novel can also be read as a political fable or a dystopia. The hybridity of different genres renders the text more powerful in its social criticism, with each giving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fic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genre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re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tries to outline the author's narrative strategy that makes such combination possible and uniquely effective.

Key words: H. G. Wells; *Time Machine*; genre; narrative art

0. 引言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 出版作品超过百部, 但是奠定作家文学声誉的却是其最早期的长篇小说《时间机

作者简介: 虞建华,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文学博士, 博导,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器》(*The Time Machine*, 1895)。《时间机器》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小说,威尔斯也因此常被奉为科学小说新纪元的开拓者。其实《时间机器》不仅是科学小说的开山之作,而且也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和一部歹托邦小说。三种文类的杂糅,给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带来了复杂性和巨大的阐释空间。借助“时间旅行”的科学想象,威尔斯表达了对技术进步、阶级关系、人类演化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问题的思考。他用非凡的想象力钩织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既在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物理学、生物学知识,又将犀利的社会批判编码于其中;既有科幻的狂放,又有悲剧的力量;既能提供赏读的愉悦,又为读者鸣响了人类命运的警钟。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这部作品成为名垂后世的经典。

1. 作为科学小说的《时间机器》

人们通常将《时间机器》称作“科幻小说”。严格地说,“科幻小说”是两个不同文类的合成概念,包括“科学小说”和“幻想小说”。黄禄善在《美国通俗小说》中,将“科学小说”和“幻想小说”一清二楚地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黄禄善,2003:304-340)“科学小说”是基于某种科学假想,如《时间机器》;而“幻想小说”则完全不受“可能性”的局限,如《指环王》。“两个概念并非总是清楚地一分为二的,但一般而言,科学小说与纯粹的幻想小说不同,它的叙事有明显的意图,试图通过已知或想象的某些科学原理,或某种预想中的技术进步,或社会结构的巨变,使虚构世界显得合乎情理。”(Abrams et al., 2014:712)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具备科学小说的所有要素,在世界科学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前,物理学对时空的新认识已初见端倪。小说一开始由身为科学家的“时间旅行者”给他的朋友们讲述关于四维空间的概念,为19世纪末的读者、也为小说叙事合理性的需要做好铺垫,引出时间旅行的故事。不管多么离奇,《时间机器》的故事都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有速度够快的运载器,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走进未来。新的物理学时空观使威尔斯的这部小说超越了“纯粹的幻想”,至少在逻辑层面,故事“显得合乎情理”。

如果说新的物理学时空观为整个故事的科学想象建立了框架,那么小说中心议题的科学逻辑,则建立在达尔文的生物演化理论的关键概念“evolution”之上。这个词一般被汉译成“进化论”,它误导了达尔文的概念,被芝加哥大学著名演化生物学家龙漫远(2009:iii)教授视为“长期被误译的一个重要单词”。他认为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演化论”,因为“自然界没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和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的必然规律,特定物种在特定时期所表现的进化不能作为生物演化的普遍规律或常例。从形态到分子的大量证据表明,在许多情形下,生物的某些特征还会从复杂演化到简单,或者长期保持不变。而‘演化’一词涵盖了更加广泛的变化模式和过程”。(龙漫远,2009:iii)也就是说,“演化”不等于“进化”或“进步”,也可能是“退化”或停滞。这一

点对理解《时间机器》至关重要,因为这部科学小说的想象性构思正是建立在物种退化的假设之上。

威尔斯在帝国理工学院就读期间,他的生物学老师是赫赫有名的演化论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此人对大力推进达尔文的理论贡献卓著。赫胥黎深刻地影响了年轻的威尔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威尔斯(Wells, 1891: 233)对演化生物学颇有涉猎,曾发表过题为《论物种的退化》(“Zoological Regression”)的文章,认为不能期待人类一直朝更高级阶段进化。发展达到峰值后,人的激情、创造力、意志力甚至体力都有可能发生适应环境而退化的现象。威尔斯将他人类终极命运的担忧,化为小说故事中未来人类的生存图景:80多万年以后未来世界的人类慵懒无能,得过且过,思维能力减弱,社会结构瘫痪。这种对退化的恐惧在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是存在的,也是作家想象中生物演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作为科学小说的《时间机器》演绎了这种“退化思想”,否定了演化等同于进步的观点。

这种警示,也与一种“熵”(entropy)增的理论相关。“熵”的理论首先是个物理学概念,指不能做功的能量总和,在威尔斯创作《时间机器》30年前,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Rudolph Clausius)提出。在封闭的系统中,“熵”只会不断增长。这个概念后来也被用于社会学领域,“阐释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无法逆转的堕落趋势和没落现象”(庞好农,2014:76)。威尔斯笔下的未来人类和社会形态,很显然已经退化到了“熵”增的最后阶段,其衰败之势已不可挽回。小说中的人类已失去发展动力,在无欲望、无计划、无组织、无理想的散漫状态中沉沦,等待着迟早到来的物种灭绝的最终结果。作家对人类无序发展的未来,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理科出身的威尔斯具有创作这部“科学小说”必需的知识储备,广泛涉猎了当时的前沿科学。《时间机器》涉及了三方面的科学新认知:演化论生物学、时空物理学和被移用至社会学的“熵”增理论,这些新的科学认知释放了作家无限的想象力。威尔斯的小说能得到该时代和当代读者的追捧,正是因为他将当时几方面的科学新观念巧妙地融合为一体,表达了对未来——不是一时的退步,而是终极的退化——的忧思。这种警示被作家以一种科学想象故事生动地呈现出来。

2. 作为政治寓言的《时间机器》

《时间机器》的主体结构模式是科学小说,作家借此想象了一个退化后的人类社会。但威尔斯对遥远未来的文学呈现,显然是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为基础进行构想的,小说因此可以被当作政治寓言进行解读。威尔斯向来热衷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改良活动,也常常发表政见,评说时事。虽然早期的《时间机器》等科学小说令他名声大振,但没几年后,他转而写社会讽刺小说,创作了大量以社会批判为主调的现实主义作品。这说明社会现实和政治议题一直是威尔斯作为作家的关注重点。他在

《时间机器》的故事中融入社会批评,针砭时弊,借未来影射当代社会,背后的书写意图十分明显。

寓言性小说“有一个潜藏于文字或表层意义之下的清晰的第二层意义”,“呈现两个(或以上)层面平行连续的类比,以至于其中的人物与事件、与故事之外的意识系统或事件系列形成呼应”(Baldick, 2000:5)。《时间机器》中的未来悲剧与当今人类的作为,这两个层面之间“平行连续的类比”清晰可见。这种虚构世界与真实现状的呼应和对照,把读者引向两者间的关联性思考,迫使他们在反思中获得对当今社会的新认识。毫无疑问,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这种由虚构表层之下生成的类比性的现实观照,使《时间机器》超越科学小说的范畴,赋予其政治寓言的特质。

当“时间旅行者”驾驶飞行器来到公元802701年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象与盛极一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反差强烈。这种相反相成的关联性,正是《时间机器》作为政治寓言的力量所在。威尔斯关注的是繁荣盛世掩盖的问题:严重的阶级对立、财产的两极分化、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他的想象中,如果任由这些负面因素发展,矛盾激化,必将导致恶果。他以小说虚构呈现未来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以“验证”英国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时间机器》的政治寓言特性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景象的衰败,二是具象化的阶级冲突,表现为“吃”与“被吃”的动物性争斗。

小说中埃罗伊人的居住地看似富丽堂皇,其实那只是前人遗留的辉煌。“时间旅行者”很快发现,建筑外表雄伟,其实老旧锈蚀,到处污渍斑斑。器物的残损强烈地暗示了这个未来世界处在一个衰败的过程中。小说主人公后来见到一座巨大建筑的遗址,断定“我们的脚下是南肯辛顿的废墟”(Wells, 2017:86;该小说引述后文直接标注页码)。伦敦肯辛顿综合博物馆是英国最引以为傲的工业和科技成果陈列所,是大英帝国辉煌历史的象征,但却已是“四处尘封,死气沉沉,一幅破败景象”(86)。故事讲述人也从地理特征上认出了泰晤士河、温布尔登和巴特西等地方,作家由此在未来故事与英国现实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不厌其烦地对细节进行描述,“到处断壁残垣,宫殿的窗户尚见残留的玻璃碎片,大片的青白色瓷砖已经从锈蚀的金属架上脱落下来”(85),而厚厚的灰尘中依稀可见生锈机器的残留标本。这一片萧瑟颓败的未来景象,是对沉醉于现时辉煌的同代人的一种警示。

“时间旅行者”很快得出结论:“我好像遇到了处于衰颓之中的人类。”(38)在小说描述的未来世界中,人的退化比景物的衰败更加触目惊心。作家按演化理论推想,长期坐享其成的统治阶级和长期遭到非人待遇的工业奴隶们,各自因“适应环境”而分叉退化,人的生物特征发生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种群。一类在长期的寄生生活中演变为身体纤弱、智力低下、情感冷漠的埃罗伊人;另一类是退化更甚的莫洛克人,为生存所迫而变得凶残野蛮,更接近动物。小说中的埃罗伊人和莫洛克人,显然是维多利亚中、后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退化的后代,前者的剥削与压迫,换来后者“捕而食之”的复仇,曾经养尊处优的上层阶级,几乎成了莫洛克人放养的“牛羊”,以供食用。

约翰·亨廷顿(Huntington, 1982:45)指出:“‘时间旅行者’对(人类)分化(演变)的解释,直接来自当代英国的社会分裂现象。”这种故事内外关联性的对社会结构的思考,是政治寓言小说最明显的特征。

小说中的“时间旅行者”解释道:“在我看来,从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出发,一切就变得明白无误:现时的劳、资之间的社会差异逐渐扩大,是事情的关键所在。”(63)作家对加速的工业化、恶化的阶级对立、国家的殖民政策等进行反思,警告人们不能任由私利横行而无视社会平等,不然将导致文明衰颓,人类走上不归之路。威尔斯站在自己时代的立场,思考着大英帝国全盛时期过后的未来走向,把忧心融进了小说故事,对世界未来进行了悲观的、颠覆性的呈现。马克·希勒加斯(Mark Hillegas)(1976:31)强调《时间机器》的生成语境:“小说故事成为社会批判,非常具有社会抗议此起彼伏的19世纪90年代的特征。埃罗伊人和莫洛克人分头演化,对应了19世纪前期开始并愈演愈烈的劳、资阶层分化的趋势。”与当时另一位科学小说巨头凡尔纳不同的是,威尔斯更凸显小说的现实意义,他的作品也更具有政治寓言的深刻性。

借用想象的人类生存状态折射真实社会中的政治体系、阶级关系和道德状态,这方面威尔斯很可能受到前辈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影响。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也常被称为政治寓言小说。“《时间机器》中描述的事件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彼时,人类物种的现今形态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发生在威尔斯‘编织’的故事中的每个事件都有意识地被精心历史化,与创作《时间机器》的特殊历史年代在时间上紧密相连。”(Ruddick, 2001:337)威尔斯面对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结合了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在文学层面构想了一个可与现时代进行互文解读的平行故事,狂想背后可见多方面的当代指涉。

3. 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时间机器》

很多科学小说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表现未来社会的某种理想形态,但《时间机器》表现的是乌托邦美好想象的反面,英语中用“dystopia”称之,由乌托邦的英文utopia衍生而成,表示相反,同样按音译为“反乌托邦”,但也常被译为“反乌托邦”,专指想象中社会发展的灾难性后果导致的悲惨社会。“如果说前者(乌托邦)揭示的是作家对人类理想社会正向价值的崇尚的话,那么后者(反乌托邦)则是作家以负向价值的表述来揭示其作品内涵的正向价值。”(胡铁生, 2018:89-90)反乌托邦通过将当前一些倾向推演至灾难性的极端而发出警示,提出对现代科技、社会模式、生态危机的反思与批判,或对权力控制人性的揭露与否定。“反面乌托邦区别于乌托邦小说的基本点,是其强烈的讽刺性。”(刘象愚, 1993:86)以此衡量,《时间机器》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是实至名归的。

小说发表于20世纪来临之际,英国的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让一部分人乐观地期待某种形态的未来乌托邦——科学技术带来的丰饶且和谐的社

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同样的乐观期待。包括威尔斯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忧心忡忡:科技发展、工业化、殖民地开拓到底是祸是福?富足生活的代价是什么?现代文明凸显的人间关系是否会持续恶化?彼得·弗尔乔(Firchow)(2007: 190-191)在《现代乌托邦小说:从威尔斯到默多克》中说,20 世纪的历史使这种转向变得不可避免,因为对很多作家而言,“人类本身或人类社会机构可以达到完善的想法,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置信”。威尔斯是先行者,在他之后,即从 20 世纪初开始,乌托邦式的对理想社会的文学呈现已不再风行,取而代之的是意在反映权力、社会结构等问题的乌托邦小说。《时间机器》可以被看作乌托邦文学最早的实践之一。威尔斯从当时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进行悲观的推演,也运用科学想象,比如生物演化论和社会的“熵”增,对退化现象进行阐释。

但是,乌托邦社会却是“时间旅行者”在未来世界获得的第一印象。公元 802701 年的埃罗伊人形体美丽,衣着雅致,相处和睦,群居在壮观的宫殿般的建筑里,以水果为生,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此地没有生产劳动,也没有不同群体的争斗,俨然一个人间天堂,这是全盛时期的英国人遥望未来时希望看到的图景。但威尔斯很快拉开序幕,展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社会。数万代后,这些人类的子孙个个身材纤弱,男人亦如“瓷器般精致”,全无阳刚勇武之气。面对一个远古来客,他们“甚至没有表现出期待中应有的兴趣”(30)。“时间旅行者”渐渐发现,他们几乎没有文字的概念,智力“只相当于我们 5 岁的儿童”(31)。当女性埃罗伊人维娜被水冲走,生命垂危时,在场的其他人不加施救(54),这种事不关己的冷漠,又说明了道德上的退化。威尔斯描述的乌托邦,是一个陷于瘫痪状态的社会,人们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身处沉沦之中而浑然不觉。

故事讲述者推断,丰足安逸致使诸如计划、奋斗、学习、提高、交流、合作等很多原先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失去其必要性,弱化了严酷环境塑成的生存能力,人类就像室内植物一样品种退化。人们不为今天担忧,没有明天的目标,家庭解体,关爱、友情、亲情、爱情随之消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被扼杀。至于莫洛克人,时间旅行者发现“这些东西身上感觉不到一点人性”(75)。作为劳工或非白人后裔的后代,莫洛克人退化更甚。非人的劳动和生活环境迫使他们逐渐蜕变,重新获得动物的特性:体型像猿猴,敏捷且凶残。曾经的压迫阶级成了弱者,遭受威胁但缺乏合作意识,不能组织有效防御;曾经的工业奴隶露出了“复仇”的凶相,但“捕猎”也仅靠驱赶、追袭和围攻等群狼策略。但不管是埃罗伊人还是莫洛克人,作为生物种群的灭绝,似乎都已在所难免。在威尔斯提供的乌托邦图景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人类进入全面衰退快速道的末日凄凉。

4. 叙事逻辑与叙事艺术

三种不同的小说文类——科学小说、政治寓言和乌托邦小说——在威尔斯的笔

下融成一个故事,天衣无缝。这种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的复杂性,可以让不同读者在不同层面和视角对故事做出不同的解读。威尔斯研究学者彼得·弗尔乔(2004:123)指出:“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的真正价值在于求新,这种创新性既体现在科学方面也体现在文学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出版一个多世纪之后面对新生代的读者仍能施展魅力的原因。如果说小说依靠科学因素吸引了早期读者的注意力——这在科学先于文学的该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原来的科学效应被淡化或科学想象成为现实之后,是经久不衰的文学力量维持着小说的生命力。”那么,小说家采取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能将三种文类杂糅,并使之浑然一体?作家借用科学小说的途径,传递政治寓言的暗示,提出歹托邦的警示。为此,威尔斯采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叙事策略。

4.1 嵌套叙事策略

在结构方面,威尔斯先设计一个框架故事,又在其内“镶嵌”一个故事。小说拉开序幕时,由叙述者“我”讲述朋友们在“时间旅行者”书房里的一次聚会,其间身为科学家的主人在聊天中描述了关于四维空间的概念,离开前约定下周四再聚。周四朋友们先到达,等待中突见主人脚步踉跄走进房间,面色惨白。他刚从时间旅行归来。他叙述的历险经过,是小说真正的主体。这样,两个叙述者交替出现,分别讲述了现实层面和虚构层面的故事,既增强了读者的“在场”感,也增加了故事的立体感。

外层叙述介绍了“四维空间”的时空观和时间旅行理论上的可能性,为《时间机器》作为科学小说做了必要的理性铺垫;英国知识分子们对“时间旅行”故事做出的反响与评论,又提高了虚构故事与当时社会的关联度。这样,两个叙事视角和立场形成呼应或反差,在内叙事的虚构故事与框架叙事的听众群体之间,建立起了既平行又交叉的关系,为《时间机器》作为政治寓言提供了阐释语境。同时,框架叙事又能将“内叙事”中未来歹托邦的恶果“反弹”回它的起源,让当代听众/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这样的叙事手段一举多得,同时服务于小说文本内含的三种文类。

4.2 留白叙事策略

《时间机器》是一种可被称为“软科幻”的作品,作家以科学想象的世界为依托,但把主要篇幅留给穿越时空后所看到的那个未来世界,让那个遥远的未来世界映射当今世界。作家采用了艺术表现中的“留白”手法,跳过漫长演变的中间过程,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小说始于维多利亚后期,具体地点是“时间旅行者”的居室,一跃到达80多万年已严重衰颓的歹托邦世界。然后“时间旅行者”急急离开那个令他不开心的地方,小说叙事又是一跃,来到千万年后临近末日的世界:人类已经灭绝,地球一片死寂,世界只剩下如巨型螃蟹之类的低等生物。返回现在后,他将经历告诉朋友们,不久后再次登上旅程,从此音讯全无。

留白是一种通过省略获得意义的途径。威尔斯对几十万年甚至更长的“中间过程”只字不提,直接呈现后果,引导读者进行填空式的想象。读者借助“时间旅行者”

的眼睛,看到被巨大空白包围的未来历史的一个瞬间,必须从一瞥所见的结果中,想象悲剧发展的过程。小说提供了多条想象的线索:可以是科学小说的推想,如物种演化如何重塑未来的人类;可以是政治寓言的联想,如今日社会负面现状的发展将如何摧毁人类自身;也可以是歹托邦式的人类悲剧的呈现,提供一种回指当今的终极衰亡的警告。省略的与书页中出现的内容同样重要,作家充分利用空白和缺省,使作品充满张力。因为不管是作为科学小说的推演,还是政治寓言的讽刺,还是歹托邦小说的警示,故事的真正焦点是同一个未被言及的大问题:人类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

4.3 模糊叙事策略

为了服务于文本包含的三种不同文学类,威尔斯常常将叙事模糊化,绕开逻辑陷阱,避免卷入科学小说需要的技术细节,以便更多地聚焦于社会问题。迈进了科学时代之后,受过教育的读者已经不能满足像《瑞普·凡·温克尔》那样的故事: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不同的时代。威尔斯时代的读者更期待故事的合理性基础。他在框架叙事中通过朋友交谈,解释了时间旅行物理学的可能性,又通过身为科学家的“时间旅行者”看到未来人类后的内心独白,解释生物演化论的原理,但始终停留在宏观理论层面。纯粹的科学小说或多或少需要技术细节的支撑,但威尔斯显然不愿被细节绑架,让技术的精确性冲淡《时间机器》作为政治寓言和歹托邦小说所涵容的社会主题。

虽然书名是《时间机器》,但威尔斯对机器本身兴趣不大,对其外形、结构和功能模糊地一笔带过,对其工作原理更是只字未提。该机器似乎是个类似摩托车的物件:两根控制杆可以让机器驶向过去或未来,启动后便会瞬间消失,开始漫长的时空之旅。时空旅行的运载器如此简单,让人难以置信。还有,埃罗伊人不劳动,是莫洛克人“放养”的肉类食物,他们何以能穿着体面?如果莫洛克人退化为猿猴,他们如何、为何进行机器生产?作家对这些常被诟病的逻辑细节进行模糊化处理,因为科学小说只是威尔斯建构故事主题的框架,而进入故事主体后,科学故事的合理性被淡化,政治主题的寓言性和警示性被凸显。

4.4 象征叙事策略

19世纪被称为“象征时代”(Age of Symbolism),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也充分运用了象征性的表达。未来人类退化、文明衰亡的悲观想象,是通过无处不在的象征进行表达的。“时间旅行者”目击的一切:破落坍塌的昔日文明的标记、弱小愚钝或者兽性复原的未来人类,都是寓意明显的衰败和退化的象征符号。前面提到的小说中的逻辑问题,如不劳动的埃罗伊人如何获得精美的衣饰、智力已退化为动物的莫洛克人如何维持机器生产等,与其说是威尔斯的“败笔”,不如说是作家为了寓言性政治言说的需要,将科幻故事带入了一个象征层面。小说中两类未来人分别居住的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不同的生存地域,而是光明与黑暗的象征。

在小说的结尾,“时间旅行者”带回了维娜送的两朵白花。小白花的象征向读者

传递了温情,读者依稀看到灰暗故事里透出的一丝希望的光亮:埃罗伊人依然保存着某些人情和人性,而莫洛克人则已经跌入了暗无天日的退化的深渊。当然,小说的最后,“时间旅行者”继续前往更遥远的未来,发现人类还是未能避免最终的灭亡。最明确无误的象征是反复出现的代表衰落的“日落”的意象,与“日不落”帝国遥相对应。“据粗略统计,小说有七处写到了日落。更重要的是,当时间旅行者到达未来时,他遇到的是‘永恒的夕阳’。”(陈才,2015:90)这一象征,将悲剧故事定格在无止境延绵的噩梦中。不论是作为科学小说,还是政治寓言小说、歹托邦小说,象征性叙事都被赋予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5. 结语

《时间机器》杂糅了三种文体,让故事具有深度,也具有更加宽广的阐释空间。从小说内容来分析,作家在整体布局上采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叙事手段:在叙事框架层面遵循科学性的逻辑原则;在主题层面遵循政治性的批判原则;在美学层面遵循修辞性的象征原则。这样,在同一个文本中科学小说、政治寓言和歹托邦小说各司其职,三位一体,互为补充,共同表达了作家对人类命运的近忧远虑。《时间机器》巧妙融合了多文类的元素,结合了科学认识与文学想象,确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成为实至名归的文学经典。

历史没有如果,但小说家则手握“虚构特权”。不管是写历史,还是写未来,作家的立足点必定是他/她生活的当下。《时间机器》是威尔斯通过想象虚构对现代化做出的文学回应。作家立足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假想了一个“实验”情境,把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作家认为势必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趋势,推演为恐怖的悲剧以提出警示。今天我们面临又一波高科技发展的浪潮,试管婴儿、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正在迅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甚至可能创造“超级人”——我们的未来压迫者。科幻小说、政治寓言和歹托邦小说又有了丰富的素材源和得以兴盛的理想气候。

注释

- ①也有学者将“反乌托邦”和“歹托邦”/“恶托邦”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关于未来的负面故事[参看王一平. 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55-63.]本文使用概念比较宽泛的“歹托邦”一词。

参考文献

- [1] Abrams, Meyer Howard & Geoffrey Galt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 Baldick, Chris.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3] Egerly Firchow, Peter. *Modern Utopian Fictions: From H. G. Wells to Iris Murdoch*[M]. Washington, D. C.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 [4] Firchow, Peter. H. G. Wells' *Time Machine: In Search of Time Future and Time Past*[J]. *The Midwest Quarterly*, 2004(2):123-136.
- [5] Hillegas, Mark R. *The Future as Nightmare: H. G. Wells and Science Fi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6] Huntington, John. *The Logic of Fantasy: H. G. Wells and Science Fic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7] Ruddick, Nichola. "Tell Us All About Little Rosebery": Topicality and Temporality in H. G. Wells' *The Time Machine* [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01(3):337-354.
- [8] Wells, H. G. *Zoological Regression*[J]. *Gentleman's Magazine*, 1891(9): 232-233.
- [9] Wells, H. G. *The Time Machine*[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7.
- [10] 陈才. 威尔斯《时间机器》的双重叙事[J]. *外国文学*, 2015(2):87-94.
- [11] 胡铁生. 理想社会建构的文学思维模式——以西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说的正向与逆向思维模式为例[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2):84-93.
- [12] 黄祿善. *美国通俗小说史*[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13] 刘象愚. 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J]. *外国文学研究*, 1993(4):85-92.
- [14] 龙漫远. 译序. 杰里·A. 科因. 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M]. 叶盛, 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 [15] 庞好农. 时间机器、社会“熵”增与多维时空——评威尔斯《时间机器》之科幻遐想[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6):74-79.
- [16] 王一平. 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55-63.

责任编辑:陈 宁

从《随意敲门》探析心象 叙事之跨时空建构

庞好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随意敲门》从已逝时空、幻觉时空和未来时空等方面描写了小说人物心象演绎的多维景观,揭示了美国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莫特利从亲情回忆、友情回忆和事件回忆三个方面来展示过去事件或物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心象再现,从伪幻觉、思维化声和思维显影方面来表现幻觉心象的现实性呈现,从自由心象、求生心象和自尊心象等方面揭晓未来时空的心象展现。作者笔下的心象描写体现了文学作品空间智能的架构取向,也可视为作者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维拉德·莫特利;《随意敲门》;心象;跨时空;叙事策略

Trans-Spacetime Structure in Mental Imagery Narrative in Willard Motley's *Knock on Any Door*

PANG Haonong

Abstract: In *Knock on Any Door*, Willard Motley presents a wide diversity of mental images through past time and space, fantasy time and space, and future time and space, disclosing the crises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Motley unveils the mental images in real life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bygone events or stuffs, the fantasy images in reality coming from pseudo-hallucination, thought incarnation and visible thoughts, and the evolvement of future imagery by forming images of freedom, seeking to live on, and maintaining self-dignity. His depiction of mental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裔美国小说艺术探微”(19FWWB023)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2018年度标志性成果培植课题“理查德·赖特叙事作品研究”(18BZCG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庞好农,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images embodies the spatial wisdom reflected in the framework structuring of his work, thought of as his functional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gnition.

Key words: Willard Motley; *Knock on Any Door*; mental image; trans-spacetime; narrative way

0. 引言

美国非裔作家维拉德·莫特利(Willard Motley, 1912—1965)是“赖特部落”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他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但关注美国各阶层的社会问题,尤其同情下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其作品揭示了移民后裔在追求美国梦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成长危机和身份危机,抨击了社会系统力量的非理性和荒谬性。他出版了四部小说:《随意敲门》(*Knock on Any Door*, 1947)、《彻夜垂钓》(*We Fished All Night*, 1951)、《别让人写我的墓志铭》(*Let No Man Write My Epitaph*, 1958)和《正午之希冀》(*Let Noon Be Fair*, 1966)。他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没有把黑人问题作为主题,而是着眼于意大利裔、犹太裔和波兰裔等第二代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危机(Bone, 1965:78)。

莫特利的代表作是《随意敲门》。该小说着力描写白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开辟了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新的主题空间。卡尔·休斯(Carl Hughes)把这部小说和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的《美国悲剧》(*American Tragedy*, 1925)做了比较,认为“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理想和抱负的,但环境的畸形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Hughes, 1953:178)。黑人作家创作的白人主题类小说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黑人小说的成熟(Fleming, 1947:iv),但福特(Ford)等学者认为,莫特利的小说偏离了黑人小说的传统,缺乏种族意识(Ford, 1965:31)。2013年芝加哥文学名人奖提名辞中写道:“莫特利一生中遭到不少非议:身为黑人,却撰写白人的故事;身为中产阶级,却撰写下层阶级的故事;作为隐匿了身份的同性恋者,却热衷于描写异性恋的激情。”(Fitzgerald, 2013:24)尽管学界对莫特利的小说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莫特利的“跨种族类小说”超越了传统的黑人小说主题,揭示了一些具有社会共性的问题,把社会抗议的范围从黑人社区扩展到美国的整个下层社会,披露了警察暴力、阶层偏见和亲情异化等社会问题。在描写这些问题时,莫特利没有采用传统的说教方式,而是采用心象叙事策略,展露人物心理问题形成和恶化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小说人物产生文化共鸣和心理移情,从而深化了作家在小说中的预设主题。

1. 已逝时空与心象再现

心象(imagery)研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 BC—322 BC)在古希腊时期就把心象视为思维的元素,认为“心灵没有心象就永远不能思考”(转引自章士嵘, 1992:147)。之后,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托马斯·霍

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哲学家把心象纳入心理构成的主要成分,认为思维是从知觉经验中衍生而出的心象系列,提出了哲学史上的心象主义理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心象是思维的基础、感觉的副本和构成思想的基本符号,而其他符号只是由此导出或衍生的,语词符号只有当它能转化为相关的心象时才有意义。哲学家对心象问题的关注说明心象对于理解人的认识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景钊, 1999:60)。一般来讲,文学作品的心象描写与人物回忆中的形象密切相关。回忆是恢复过去经验的过程;识记材料、保持材料都是为了在必要时能在头脑中把它重新呈现出来,回忆中产生的各类意象就是心象的外延。因此,笔者拟从亲情回忆、友情回忆和事件回忆等方面来探讨《随意敲门》里过去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心象再现。

莫特利采用意识流描写的手法来再现亲情心象。从社会伦理学来看,亲情特指亲人之间的特殊感情。这种情感的存在或维系不受下列因素的影响: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年轻或衰老。亲情是互相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如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妹之情等。在这部小说里,尼克(Nick)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父亲经常采用暴力手段来规训儿子的行为举止,这激起了尼克强烈的叛逆心。在现实生活中,尼克从来不服从父母的管教或劝告,曾骂父亲为“杂种”,也曾愤恨过母亲。然而,当尼克被送进少年犯教管所后,他对父亲产生了情不自禁的思念之情。一天,尼克在厨房时,饭香味和锅碗瓢盆声交织在一起,这唤起了他对曾经家庭生活情景的回忆,父母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在这个心象中,他看到了父亲的严肃表情,耳边响起了父亲语调严肃而慈爱的话语:“我们的尼克是个好孩子。我们的尼克将去当牧师。我们打算把尼克交给教堂。”(Motley, 1947:39)一会儿,他又回忆起父亲为他漱口,为他擦鞋的场景。对亲情往事的回忆表明:尼克还没有堕落到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地步。莫特利还描写了一个关于小说主人公艾玛(Emma)的亲情心象。当艾玛向尼克介绍自己的身世时,她陷入了对父亲的往事回忆。她的父亲在其八岁时就去世了,但与父亲临终告别的往事不时浮现在眼前。当摄影师给父亲的遗体拍完照后,苏尔茨太太(Mrs. Sultze)叫来三个女儿——艾玛、凯特(Kate)和玛吉(Maggie),让她们和父亲道别。父亲葬礼场景以心象的形式再现在艾玛的脑海里,表现了艾玛对亡父的深深思念。用意识流手法描写的心象更为逼真,更具有心理震撼力和亲情感染力。

友情回忆也是心象叙事的一种表现手法。友情是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是一种很美妙的东西,可以让你在失落的时候变得高兴起来,可以让你走出苦海,去迎接新的人生”(Jarrett, 2010:315)。友情回忆也是心象再现的表现形式之一。莫特利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尼克的友情回顾所引起的心象。尼克离开丹佛少年犯教管所后来到芝加哥,时常回忆起那里的朋友们。莫特利描写道:“在街上,尼克展望前方,那个没有亮光之处。”(Motley, 1947:89)似乎尼克在潜意识层里还在留恋以前的生活,思念以前在少管所时曾关心和帮助过他的好朋友——汤米(Tommy)、杰西(Jesse)和洛基

(Rocky)。另外,莫特利还描写了尼克与同性恋者的友情回忆。尼克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专门抽时间陪同性恋人欧文(Owen)去逛街,看演出。欧文是当地有声望的富翁,对尼克关怀备至。当尼克和欧文走在大街上时,尼克回忆起自己被街头恶棍斯坤特(Squint)打伤后欧文为他包扎伤口的场景。欧文对尼克的同性恋之爱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尼克长期缺失的父爱。后来,尼克在牢房里时常回忆起与芝加哥的街头朋友桑希恩(Sunshine)、布奇(Butch)、胡安(Juan)等一起玩耍的场景。各种友情的回忆在尼克的脑海里形成难以磨灭的心象,充实了尼克在寂寞和孤独中的精神生活,激发了他对自由的向往。

莫特利还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了以回忆过去事件为基础的心象。一般来讲,不幸事件给人留下的心象要远远深刻于普通事件或快乐事件。在这部小说里,有两个事件给尼克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面壁事件;另一个是杀警事件。尼克被押进牢房后,警察粗暴地对尼克说“面向墙壁!”(Motley, 1947:345)顿时,尼克的脑海里出现了曾经在丹佛少年犯管教所被教官强迫面壁思过的情形:“双手拿着重物,鼻尖和前额都贴在墙上……洛基被派来监督他们……面壁完后他和洛基一起坐在台球桌上,吸着烟,晃着腿……他们还分吃了一块巧克力。”(Motley, 1947:345)两个事件的相似性诱发了尼克的回忆,形成两个可以互为映衬的心象。此外,当尼克被捕后,警察审问尼克:“你在哪里?”(Motley, 1947:347)尼克的脑海乱成一锅粥,形成的唯一心象是:他站在莱利(Riley)警官身边,把枪膛里所有的子弹都射入其胸膛。律师莫顿(Morton)在法庭上询问尼克:“莱利被杀那天晚上,你在哪里?”(Motley, 1947:354)这时,尼克脑海里呈现出的心象是:在那条巷子里,他疯狂地把所有的子弹都射入莱利的身体,并把射完子弹的手枪砸向莱利,然后对着他的尸体猛踢一通,发泄自己的愤怒。后来,当检察官叫枪械商店老板哈里·曼(Harry Mann)出庭作证时,尼克脑海里浮现出五年前找哈里买枪的心象。这些往事心象的再现在读者和小说人物之间搭建了一座心理认知的桥梁,有助于心理共鸣和心理移情的生成。

莫特利在这部小说叙事策略的建构上特意把过去事件通过回忆的方式在人物脑海中呈现出来,生成心象,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动态。其实,已逝事件的心象生成过程也就是心象在认知结构中的表征形成过程,以这种表征方式编码的人物性格与事件演绎在认知结构中可以表现为多种具体形态的信息结构模式。这类回忆性心象既反映了认识对象的个别属性与单一特征,也反映了认识对象多个属性和特征的复合性。所以,过去人物或事件的心象再现有助于小说人物和心理叙事在跨时空领域里的重新建构。

2. 幻觉心象与现时性呈现

幻觉是指人在没有受到相应客观事件的刺激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换言之,幻觉是一种主观体验,其主体感受与知觉相似,通常被视为一种比较严重的知觉障碍

(庞好农, 2014: 78)。由于幻觉的感受逼真生动,时常会引起当事人的愤怒、忧伤、惊恐、逃避或产生攻击他人的言行。正常人在一定环境的作用下也会产生幻觉,对外界事物产生不真实的认知(Rayson, 1974: 247)。幻觉中产生的心象在人脑中的感知通常栩栩如生,如同身临其境。在巨大压力和高度紧张的现实生活中,幻觉所形成的心象与人的过去经历或现实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莫特利在《随意敲门》里描写了人物心象的形成与人物处境的内在关联,从伪幻觉、思维化声和思维显影来展现幻觉心象的现实性呈现。

首先,伪幻觉指的是一种存在于主观空间,但缺乏客观实体感的幻觉。实际上,这是一种病理表象,也是一种取得知觉形象的思维,与形象生动的“梦”有着极强的可比拟性。它“具有知觉的轮廓清晰、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特点,但缺乏知觉的实体性;它可以直接由脑‘看到’或‘听到’,不必借助于五官的帮助。当伪幻觉出现时,人们就是紧闭双眼,在脑海里仍能呈现出清晰的图像”(Gelfant, 2012: 23)。在这部小说里,当同性恋者巴尼(Barney)带尼克去他家时,尼克很不情愿,心里带有巨大的犯罪感。就在巴尼用钥匙开房门的那一瞬间,尼克的脑海里出现了伪幻觉。莫特利描写道:“尼克就在那很短,或一瞬间的工夫,觉得面前出现了一个跪在奥尼尔神父面前的祭台助手,穿着红色的法衣和镶边的白法袍……我将走上主祭台……感谢赐予我们青春以快乐的上帝……”(Motley, 1947: 146)伪幻觉心象中的祭台助手就是童年时代的尼克。“我将走上主祭台……感谢赐予我们青春以快乐的上帝”的这些话语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其实是尼克幻听到的内容。尼克在进入巴尼的房间后,在走过客厅时,耳际又响起了教堂里才可能听到的话语“上帝与你同在……阿门”(Motley, 1947: 146)。这些幻听话语的反复出现,其实是尼克心理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些幻觉心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在一定的外部条件或因素的刺激下才得以显现,成为一种伪幻觉。此外,莫特利在这部小说里还设置了另外一个伪幻觉场景。尼克和朋友布奇在街上打台球,布奇输球后,很快就走了。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和尼克打球,他也不是尼克的手,输了十美分后就不愿再打了,接着他纠缠尼克,向尼克讨教抢劫的方法。尼克虽然已经涉足了街头抢劫,但是他并不甘心沉沦于这样的生活,觉得非常苦闷。那人的纠缠使尼克陷入了伪幻觉:“一会儿,奥尼尔神父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他能听到神父的布道,也能听到洛基的口哨声。”(Motley, 1947: 153)奥尼尔神父在尼克童年时总是规劝尼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而现在的街头生活使尼克陷入精神危机。奥尼尔神父的形象以心象的形式出现在脑海里,似乎是伪幻觉,但这个幻觉的出现表明尼克依然怀念过去的单纯生活,产生了脱离街头堕落生活的念头。这种伪幻觉可以视为潜意识层里一种心灵顿悟的瞬间骤现,有助于人物行为的自我修复。

其次,莫特利还采用了思维化声的幻觉心象。这种心象指的是当事人体验到一种把他的思想大声地讲出来的幻听。幻听与思维内容完全一致。如果思维同时伴随声音出现,病人觉得声音是自己的,被称为思维鸣响;如果觉得自己的思维内容由别

人大声讲出来,则称为读心症。在这部小说里,尼克和艾玛一见钟情,但尼克又担心自己混迹于街头的劣迹被她知晓,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在尼克送艾玛去公交车站的路上,尼克的脑海里出现了思维化声的幻觉心象:“我不好我喜欢你和我家里的人不一样我抢劫我酗酒我做坏事……她那美丽的长发随风飘逸……天上有好多星星……我不好我喜欢你。”(Motley, 1947:215)这段幻觉心象的描写没有标点,犹如一段没有停顿的意识流,显露了劣迹青年渴望追求美好爱情的自卑情结和心理窘境。这段幻听内容与尼克的思维完全吻合,似乎是他自己在潜意识里把这个复杂心结表述出来。此外,尼克杀死警察莱利后,遭到全城通缉,于是他去找黑社会组织头目艾斯(Ace),请求艾斯送他出城或送他一只手枪,但艾斯拒绝了。尼克待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陷入了举目无亲、求助无望的绝境,其脑海里出现了思维化声的幻觉心象:“我孤单一人,这里空无一人……我没有一个朋友。”(Motley, 1947:341)他此时的思维内容以意识流的形式出现,形成了陷入绝境之人的惶恐心象。他的思维成了自己在潜意识状态中表述而形成的一种幻听心象。当尼克被押送到法庭的时候,众多的新闻记者对着他拍照。此时,尼克的脑海里出现思维化声的幻觉心象:“我不知道我还是如此的大人物!”(Motley, 1947:393)这个句子以幻听的形式出现在其脑海,由其的潜意识层里表述而出。

然后,莫特利笔下的思维显影指的则是与思维内容一致的幻视。在《随意敲门》里,莫特利描写了尼克被警察追捕的场景。尼克杀死莱利警官后,拼命地逃离现场。他先是顺着华盛顿大道往北跑,然后转入门罗大街往南跑,那里灯火辉煌;转向西,跑入霍尔斯特德街;再往东,不停地跑。他跑上架在一个旅馆屋顶和一堵高墙上的跳板。“死胡同!死胡同!”(Motley, 1947:329)他的内心提醒他。他边跑脑海边闪现出警察在后面狂追他的心象:“他们要抓住我!他们要抓住我!”(Motley, 1947:329)当他跑到西麦迪逊街时,老觉得莱利警官在追他,并在高喊“站住!”(Motley, 1947:250)其实,莱利警官已经被尼克打死。他所感觉到的有关莱尼警官的追赶不过是其思维显影的表现形式而已。这个思维显影所形成的心象在尼克的心理感受中具有巨大的逼真性,因此,尼克被这个思维显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另外,莫特利还描写了一个思维显影的片段。一天,尼克在街上打完台球后,突然产生了欲火,于是就在酒吧门口找了一个妓女。在那个妓女带他去出租屋的路上,尼克想起了艾玛:“她到台球室来找我,一定是喜欢上我了吧。”(Motley, 1947:251)那个妓女边走边挑逗尼克。尼克对艾玛的爱和思念化成了她的幻象:尼克突然觉得艾玛就站在身边,似乎她对他说:“我觉得你好,尼克!”(Motley, 1947:491)这时,尼克爱艾玛的内心感受以艾玛现身的心象表述出来,使尼克难以继续嫖妓了。于是,尼克给了那个妓女五美元,独自离去了。尼克在嫖妓道路上的猛醒就是其思维显影的心象作用所致。莫特利描写得最好的思维显影心象出现在该小说的最后一章。临刑的那天上午十点,尼克坐在牢房里,对艾玛的思念化成了她坐在牢房另一个角落里的幻象,仿佛她在对他说:“我爱你,尼克!”

我不在乎,尼克!我会在你离开我的地方等你。我爱你!尼克,我爱你!”(Motley, 1947:368)艾玛在牢房的幻影浮现是尼克思念女友的心象产物,显示了思维和心象的统一性。

最后,心象的幻化是心灵的自由,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是人物内心的感知。莫特利笔下的心象与意象的综合是心灵的造境过程,是情感和生命意蕴的表述,是对现实的颠覆和异化。幻觉心象是人物思维的多变性和触碰性冲破空间与物象的局限而达到的一种潜意识思维的表现方式,也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双重作用。莫特利的幻觉心象描写揭示了小说人物的细腻心理,具有心灵冲撞般的艺术震撼。

3. 未来时空与心象展现

未来时空的心象展现指的是立象而尽意的一种形象思维生成过程。形象思维是指人们利用头脑中的表象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Shaw, 2013:305)。心象展现与一般的形象思维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具体运用又与一般的形象思维有很大区别。在一般的形象思维中,人们主要是借助表象来完成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认识,而艺术语言的运思是一种心象思维,主要目的是表现发话主体的情感世界,最终不是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而是导向美的心灵境界。文学语言的运用所借助的感性材料是“心象”,也就是“心灵化的表象”。这是涉及主体认知、情感、心绪、审美体验等的一种表象。“这种主观映象当然不限于视觉的,它也可以是听觉的、味觉的、嗅觉的等,或者是综合性的。”(翟应增, 2004:74)未来时空的心象展现是一种无意识心理物象的体现。莫特利在《随意敲门》里描写了未来心象在现实社会的多维性,并从自由心象、求生心象和自尊心象等方面揭示未来时空的心象展现。

一般来讲,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奴役、伤害并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丧失自由的人更知道自由的含义和重要性。尼克因犯有盗窃罪,被关押在丹佛少年犯管教所,失去了自由。一天,尼克和好朋友汤米站在管教所的一块高地上瞭望学校外的景色,高墙外的车水马龙和热闹景象使尼克和汤米憧憬着未来的快乐生活,脑海里出现了将来出狱后一起散步、一起玩耍、一起逛酒吧的场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所形成的心象使他们跨越了牢狱生活的时空,仿佛摆脱了监视和管教,获得片刻自由,但是这种心象带给尼克和汤米的是短暂的兴奋和长时间的郁闷与惆怅。

此外,莫特利还把求生心理与未来时空的心象叙事做了有机的结合。求生指的是想方设法避开引起生命危险的威胁,维持自己生命的心理状态。在这部小说里,莫特利描写了尼克的求生心象。尼克的辩护律师莫顿和检察官科尔曼(Kerman)在法庭上就陪审员的资格审查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第一轮交战。坐在被告席上的尼克知道,陪审员的选择对他的审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律师和检察官唇枪舌剑的时候,尼克的脑海里也显现出强烈的求生心象:“我是尼克·罗马诺,我想活命!”(Motley,

1947: 489) 陪审员确定后,法庭进入了正式庭审。莫顿律师和科尔曼检察官就证人的证词进行了激烈的询问和驳斥,尼克感受到了自己命悬一线的危险,同时其脑海里也出现了更强烈的求生心象,以意识流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是尼克,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是尼克,我想活!”“我想活!”等句子在该小说第 83 章的 429 页至 431 页里反复出现,表现了尼克强烈的求生欲望。尼克的求生心象跨越了庭审时空,使其担心庭审后能否有生存机会。

同时,莫特利把自尊心理视为心象叙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从社会伦理学来看,自尊是做人所必须拥有的一种心理,也是社交所需要把握的底线之一。自尊始于知耻,有了羞耻心,人才能节制自己的行为,不做庸俗卑贱的事情,有尊严地生活。莫特利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青年有尊严地走上刑场的故事。在小说的第 92 章,尼克将于当天晚上被送上电椅伏法。典狱长为了宽慰尼克的灵魂,建议说:“尼克,我觉得你最好是见见牧师吧。”(Motley, 1947:490)尼克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警察要杀他的目的就是复仇,而自己绝不能在仇人面前表现成被人瞧不起的懦夫(Weissgarber, 1961:308)。自尊心象以意识流的形式出现在尼克的脑海里:“我要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样走上电椅。”(Motley, 1947:490)他在脑海里把自己虚拟成一个大无畏的英雄,并在自己的心中呐喊:“我将被烧死了!我,尼克·罗马诺!”(Motley, 1947:90)尼克的自尊心象激发出无畏的英雄气概。当典狱长带着理发师到死囚牢为尼克做电刑前的理发时,尼克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尼克的自尊心象顿时闪现在脑海里:“别垮了!别让他们把你打垮!”(Motley, 1947:892)自尊心象的最后闪现表明了尼克的坚强意志,他把勇敢和无畏视为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旨在使自己的人格尊严跨越自己存在的生命时空,在自己离世后的未来世界里仍然赢得家人和友人的尊敬。

莫特利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尼克的自由心象、求生心象和自尊心象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了人物心理与未来时空的内在关联,阐释了人身自由、生命意义和人格尊严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义。跨时空心象的描写突破了传统心象的回忆类局限性,使人物心象的描写空间拓展到了未来的时空,有助于建构起读者与作者之间或者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心理移情的桥梁。

4. 结语

莫特利在《随意敲门》里从已逝时空、幻觉时空和未来时空等方面呈现了小说人物心象叙事的各种情景,特别是通过对意大利裔美国青年尼克的精神危机和身份窘境的披露,揭示出美国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其笔下的心象描写体现了文学作品空间智能的架构意向,也可看作是作家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心理再现。莫特利通过类比联想与综合想象的方式建构心象叙事跨时空的体系,运用联想把新感知的形象与大脑内已有的心象进行类比,构造出跨越时空的新心象,蕴涵着认知主体

对事件的超前反应能力和对新情境的预知能力。他所采用的心象描写和叙事策略拓展了美国非裔城市自然主义小说的叙事空间,促进了非裔美国小说叙事美学的发展,对“赖特部落”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Bone, R. The Negro Novel in America[M].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2] Fitzgerald, B. F. The Chicago Literary Hall of Fame: 2013 Nominees[M]. Chicago: Chicago Writers Association, 2013.
- [3] Fleming, R. E. Introduction[G]//Willard Motley(ed.). Knock on Any Door. New York: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7.
- [4] Ford, N. A. Four Popular Negro Novelists[J]. Phylon: The Atlantic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 1965,35(1):31-37.
- [5] Hughes, C. M. The Negro Novelist: A Discussion of the Writings of American Negro Novelists 1940—1950[M]. New York: Citadel, 1953.
- [6] Gelfant, B. H. The American City Novel[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2012.
- [7] Jarrett, T. D. Toward Unfettered Creativity: A Note on the Negro Novelist's Coming of Age[J]. Phylon, 2010,65(1):315-317.
- [8] Motley, W. Knock on Any Door[M]. New York: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7.
- [9] Rayson, A. L. Prototypes for Nick Romano of Knock on Any Door[J]. Negro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974,33(83):243-250.
- [10] Shaw, C. The Jack-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11] Weissgarber, A. Willard Motley and the Sociological Novel[J]. Studi Americani, 1961,56(7):305-312.
- [12] 刘景钊. 心象的认知分析[J]. 晋阳学刊, 1999(2):60-64.
- [13] 庞好农. 时间机器、社会‘熵’增与多维时空:评威尔斯《时间机器》之科幻遐想[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6):74-79.
- [14] 翟应增. 艺术语言产生时思维的心象性和意象性[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74-77.
- [15] 章士嵘. 认知科学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陈 宁

“作为妇女的阅读”： 《法国中尉的女人》之再审视

林 萍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的“神秘”成为学界一个复杂的阐释公案。本文认为,如果读者自觉运用“作为妇女的阅读”策略并充分考虑到后现代文本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就能够捕捉并填补意义的空白,重新审视莎拉的神秘与抗争,从而抵制和颠覆对莎拉和文本的男权式阐释,洞悉小说深层次的女性主义主旨与艺术内涵。

关键词:“作为妇女的阅读”;《法国中尉的女人》; 莎拉; 后现代; 女性主义

“Reading as a Woman”: A Restudy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LIN Ping

Abstract: Sarah's mystery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has been an intricate controversy in academia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if the reader consciously employs the strategy of “reading as a woman”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openness, plura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is postmodern text, he is capable of regaining an insight into Sarah's mystery and struggle by filling up the gaps of meaning so as to resist and undermine the masculinist reading of Sarah and the text.

Key words: “reading as a woma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Sarah; postmodernism; feminism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约翰·福尔斯女性主义思想研究”(15SKG118)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研究”(SISU2014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萍,女,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和美国狄金森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0. 引言

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以下简称《法》)(*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是英国当代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2005)的名作。不少读者将该文本定位为男性文本,认为该文本的主题是男性主题(Waugh, 1989:68),而女主人公莎拉(Sarah)“难以接近,神秘而不可知,但正是这种神秘使其他人物充满了生机,推动他们行动起来”(Foster, 1994:69)。部分女性批评者甚至也认为,作品中女性的存在是为了促使男性的发展(Tarbox, 1988: 59-85)。当然,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雅德(Deborah Byrd)(1984:306)认为,《法》强调了女主人公莎拉的进化和解放,是一部近乎标准的女性主义小说。比氏的观点遭到了伍德考克(Bruce Woodcock)、迈克尔(Magali Michael)等诸多评论家的强烈反对。伍德考克认为,莎拉只是一个男人的幻想(male fantasy)和男人获得救赎的催化剂(Woodcock, 1984:92)。迈克尔(1987:225)认为莎拉的视角在小说中是缺失的,因此《法》是一部“失败的女性主义小说”。国内一些学者如陈榕也认为莎拉并没有摆脱父权话语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陈榕,2006:77)。可以说,强调女主人公莎拉发展的女性主义解读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读者对于莎拉之虚幻神秘有不同阐释,莎拉之“神秘”也成为学界一个复杂的阐释公案。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已被学界诸多文学评论家所重视。在颇有影响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米勒特(Kate Millett)首先引入了“女性阅读”视角。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朱迪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1978:7-8)在《抗拒的读者》中也指出,女性读者一直屈从于一种无性别化过程,即“必须把自己看作男性”来阅读,并经历着“由自己反对自己的不断分裂所产生的无能为力”。为此,她倡导一种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抗拒式阅读(resisting reading)”,即阅读时采取对抗的方式,从女性特有的角度抵制和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来阐释作品。卡勒(Jonathan Culler)(1998:108)进一步在《论解构》中明确提出了“作为妇女的阅读”(reading as a woman)概念,认为“中性的阅读主体是不存在的,任何主体都具有性别特征”。卡勒从差异的角度给“作为妇女的阅读”下了一个定义:“作为妇女的阅读”就是避免作为男人来阅读,辨别各种男性阅读的具体幕障及变体,并予以矫正”;“作为妇女的阅读”就是“将女性的生活体验及对文学‘程式’包括代码和惯例的理解融入阅读过程中,抵制各种隐秘的男权式阅读。”(Culler, 1982:54)

基于以上两个背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作品,我们有必要采用“作为妇女的阅读”策略,重新审视这一小说,辨别男权式阅读的幕障及变体,将女性生活体验及对该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的理解融入小说的分析之中,以此洞悉小说深层次的女性主义主旨与艺术内涵。

1. 抗拒男权式阅读:女性身份构建的难题

福尔斯在小说中构建了莎拉的神秘,而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莎拉的神秘却是对查尔斯(Charles)、格罗根医生(Dr. Grogan)和蒲尔特尼太太(Mrs. Poulteney)等人物进行男权式解读的结果。有趣的是,小说又以后现代文本的开放性、自省性和批判性抵制对莎拉的男权式解读,揭示在维多利亚父权制社会里,要构建女性身份,形成对女性的真正了解和认可,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作为一个身处父权文化中心、深受男权文化影响的维多利亚男性,查尔斯对莎拉阐释的男权中心主义色彩随处可见。在他的眼中,叛逆的莎拉不可避免地成为神秘的他者、审美的对象和欲望的客体。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小说首先要消解的就是查尔斯式的“莎拉影像”。

在小说中,查尔斯不断地追寻、“阅读”神秘的莎拉。他为她野性的气质着迷。在给莎拉的信中,查尔斯称呼她为“我既甜蜜又使我迷惑的莎拉”(福尔斯,陈安全译,2007:415;以下引用该小说只在之后标注页码)。莎拉“一方面是夏娃的化身,代表一切神秘、痴情和玄奥;另一方面,(她是)一个来自不知名的海边小镇的女家庭教师,带着几分诡谲、几分野性”(454)。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身份的莎拉,她对维多利亚文化的抵制却吸引了查尔斯,让他禁不住要分析她、“治疗”她,希望将她纳入主流社会中,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她去欧洲旅行,让她成为合法的查尔斯夫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查尔斯沿袭了父权文化对女性他者的男性幻想:女人是弱者,男人的存在是为了拯救她们。他以弱者的施恩者和保护者自居,将莎拉看作一个恳求怜悯和帮助的女人。当莎拉失踪以后,他曾想象她濒临绝境的场景:身无分文、流浪街头或者悲伤欲绝、跳下悬崖。他辗转于欧洲、美洲,千里迢迢苦苦追寻莎拉,随时准备“斩杀食人巨龙,救出落难女子”(502)。不幸的是,这一男性幻想的“莎拉影像”却遭到了文本的消解:“当查尔斯最终见到莎拉时,他看到的不是眼泪、锁链和乞怜的目光,莎拉在前拉斐尔派画家罗塞蒂家族如鱼得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似乎获得了新生。”(319)

查尔斯笃信的父权神话将女性界定为“充满混乱、无理性、黑暗和消极”的“他者”(Moi,1995:167)。莎拉的“他者”形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查尔斯,但同时又排斥他,让他感觉她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心生恐惧。查尔斯对“他者”莎拉的恐惧典型地体现在小说的第二个结尾中。当他们做爱以后,查尔斯衬衫前尾上的“血”揭示了莎拉的谎言:莎拉仍是一个处女,她并没有把自己给那个法国中尉瓦盖纳。小说的这一精心设置正是文本对查尔斯式“莎拉影像”的进一步消解。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查尔斯此时此刻的反应不是愧疚和关爱,而是震惊、怀疑和愤怒。他觉得莎拉在莱姆镇的一切行为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自己完全被她控制,成为她“想象力的愚弄对象”(255)。顿时,查尔斯的脑海里充满了“那些令人讨厌的女淫妖的概念”和“世界末日

的恐惧”(254)。他疯狂地试图解开莎拉之谜：歇斯底里的女人、渴望权力的女人、憎恶男人的女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他者”、一个维多利亚秩序的反叛者。

作者福尔斯虽然给了男主人公查尔斯一个优越的视角，但同时却精心实践了他的后现代叙事策略，以此赋予读者一个独特的结构、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氛围，从而促使读者摆脱对查尔斯观点的影响和依赖。在小说的第十二章结尾处，叙述者进行了“侵入式提问”：“莎拉是谁？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里冒出来的？”(67)叙述者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莎拉是谁”。这一问题叙事者在问，查尔斯在问，同时读者也在追问。我们从查尔斯的视角去评价莎拉，但是我们又从叙述者的角度去评价查尔斯。如在第一章中，“持望远镜”者以充满嘲讽的意味评价了查尔斯的有限视角：查尔斯自觉才智非凡，觉得自己的智力远远超过别人，但是叙述者对他的评价是“充满了趾高气扬的优越感”(117)。读者跟叙述者站在相同的位置，观察查尔斯怎样解读莎拉，同时叙述者也在观察读者怎样解读文本。为了促使读者进一步建构对莎拉的理解和认识，叙述者继续其“侵入式叙述”，他说自己生活在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小说家不是权威，“虚构无处不在……你甚至认为自己的过去都不是十分真实的”(69)。在故事的叙述、叙述者对叙述行为和小说人物评价的多层结构中，文本呈现出后现代的开放性、自省性和自由性。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程式”中，叙述者全知全能，文本意义具有读者很难抗拒的终极性和权威性。然而，该小说的这些后现代特点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程式”，引导读者成为“抗拒式读者”：抗拒查尔斯阐释莎拉的“父权神话”和“男性幻想”，拒绝与父权意识形态结成同谋。这种对传统阅读模式的颠覆性阅读帮助我们警惕男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建构读者自己的女性观和性别差异观。

男权式的“莎拉影像”不仅体现在查尔斯对莎拉的阐释中，还可以从小说中的另外两个角色——格罗根医生及莎拉的雇主蒲尔特尼太太对莎拉的解读中找到踪迹。格罗根医生是查尔斯的好朋友，在莱姆镇很有声望，可以说是维多利亚理性、科学和法律的象征。当我们“作为妇女去阅读”时，读者就会发现格罗根医生表面上关心同情女性，实际上对女性尤其是对莎拉的阐释充满了典型的父权特征。在他的男权意识形态的建构下，莎拉是一个对男性秩序构成威胁的危险女人。

在查尔斯带着对莎拉的困惑第一次向格罗根医生求助时，格罗根医生将莎拉诊断为“抑郁症”，认为莎拉不想离开莱姆镇的原因乃是“抑郁成瘾”。他认为莎拉不像“我们正常人，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检查她的动机，能搞清楚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112)。查尔斯与格罗根第二次讨论莎拉的时候，以男人为中心的“他者阅读”变得更为明显：“我是一个年轻女子，受过教育，智力过人。……这个世界待我不好。我虽然被赶出了，但是我要报复。”(160)

格罗根运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知识对莎拉进行了心理学、病理学上的分析。

他认为莎拉是“活一天算一天”,因为“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不可能有她那样的行为”(160)。如果说受父权思想影响的读者还有可能认为格罗根医生对莎拉的“阅读”是正确而有逻辑的,那么当得知格罗根医生的最后结论是莎拉患了神经官能症或精神病,应该被送进埃克塞特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时,具有 21 世纪医学和心理学常识的读者一定会大吃一惊。

为了说服查尔斯,格罗根紧接着给了查尔斯一卷关于拉隆西埃中尉审判的卷宗,里面引用了德国著名内科医生对多位女性的触目惊心的“变态”案例。根据卷宗的描述,这些女性的共同特点是:年轻、美丽,“用可怜的方式努力追求爱情和安全”(168)。而且,她们跟莎拉一样,被诊断患上了歇斯底里的精神病。这些都是由“男性书写”的“不正常”女性的历史。但是卷宗关于女性的叙述不会使冷静而睿智的当代读者盲信盲从。拥有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精神的读者会重新审视和警惕“男性书写”“不正常”“女性历史”等概念。这些女性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她们偏离了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性行为规范,所以受到了父权律法的惩罚。在维多利亚社会,一旦女性的举动有悖于权威和理性,就会被诊断为精神异常或抑郁症,并接受心理治疗。但是,女性主义读者知道,男权意识形态中用来诊断、压抑和排斥“他者”的理性主义话语大有问题,因为“话语可以穿着理性、科学、真理的外衣,但是话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可以压迫、可以毒害,可以围困,可以束缚”(刘岩,2010:9)。理性主义与男权利益形成共谋,对女性造成了强大的心理束缚和文化压迫。

这种心理与文化压迫还典型地体现在莎拉的雇主蒲尔特尼太太对莎拉的规训与惩戒方面。蒲尔特尼太太虽然身为女性,却完全内化了男权意识形态,成为男权意识形态坚定的同谋者。她将莎拉视为一个道德堕落的女人,将莎拉纳入道德“赎罪”的话语。为了规训惩戒莎拉,她让莎拉每日朗读《圣经》,向上帝虔诚忏悔。她和女管家费莉太太以及小镇的居民对莎拉的户外活动进行“全景式监视”。小说中的莱姆镇虽然不是福柯所说的“全景敞式建筑”,但却充满了福氏的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莎拉被禁止到海边散步,“尤其不要那样呆立凝视”(46),因为隔海远眺表明“对勾引她的人仍有感情依恋的迹象”(44)。在蒲尔特尼太太看来,之所以让莎拉散发宗教小册子,其目的是要把莎拉的身体变成一个贴着权力标签的被动体,一个被动的、驯服的身体。当莎拉散发宗教小册子的时候,莱姆镇的人会看见“法国中尉的女人”当众悔过,人们就会认为对她的权力规训效果是多么的成功。这种对女性行为标准的虚伪而僵硬的道德观一方面被小说的其他角色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也被当代读者了然于胸,蒲尔特尼太太对莎拉的解读和规训自然不会得到认同。小说的叙述者对蒲尔特尼太太进行了“侵入式点评”,蒲氏“盖世太保”似的世界观是她压抑的心理造成的,其根源在于父权文化造成的文化和心理压迫。

查尔斯、格罗根和蒲尔特尼太太等人物都对莎拉进行了男权式误读,但是文本以不同的形式颠覆了这些误读。那么,“莎拉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只在增加

了小说的叙述张力。在“作为妇女的阅读”视角下,这一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女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有“西方女性主义圣经”之美誉的《第二性》一开始就追问的问题。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回答是相对于男性主体,“女人是第二性,是他者”。这一回答暗含了在男权社会里关于性别的特殊视角:女性的界定始终以男性为参照。《法》中查尔斯、格罗根和蒲尔特尼太太对莎拉的解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这些建构表明,在维多利亚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身份的认可和构建是一个难题。

2. 解构男权式阅读:后现代叙述策略的尝试

如果说莎拉对男权式阅读的抗拒凸显了女性身份构建的难题,那么文本本身的后现代特点也抵制了读者的男权式阅读。这些特点体现在文本的立体结构、互文手法、非线性叙述等后现代的叙述策略中。这些策略对读者形成暗示:莎拉不是伍德考克所说的“查尔斯的幻想和查尔斯获得救赎的催化剂”(Woodcock, 1984:92),莎拉的解放跟查尔斯的解放同等重要。

立体结构是福尔斯试验的一个后现代叙述策略,它有效地提供了一种抵制传统性别歧视的文本结构,以此瓦解文学作品的绝对真理和权威解读。《法》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元小说,但并非所有的评论者都对福尔斯的立体叙述层了然于胸。概括而言,《法》的叙述呈现出三个层次:“全知全能叙述”“元叙述”和“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的叙述”。第一个叙述层叙述的是莎拉与查尔斯的浪漫爱情故事。在小说前12章,叙述者模拟了维多利亚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成规和策略,营造出故事曾经发生过的“幻觉”,以此表明小说是在探索普遍的真理和永恒的意义。第二层是元叙述层。在第二层里,叙述者对小说创作过程、叙述成规以及小说的虚构性一一暴露,以此瓦解叙述者自己的叙述权威,消解文本意义的终极性和权威性。例如,叙述者说“我假装回到1867年”(87)。“这两个人物只存在于我想象之中”(348)。在第三个叙述层里,叙述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对小说人物的观点与行为进行评价。通过这种立体结构的使用,充满男权意识形态的文本意义阐释得到瓦解。

在小说第55章,当叙述者思考怎样结束这个故事时,他把莎拉当作主人公,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问题:“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叙述者是一位当代叙述者,他并没有轻易给出答案。“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想要什么清楚吗?很清楚。但是,主人公需要什么不是那么清楚,而且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292)这一叙述视角的转换虽然微妙,但从“作为妇女的阅读”角度来看,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转换,读者会问“小说的主人公是谁?这会对阅读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应该让查尔斯找到莎拉?”此时的叙述者面临两难的局面。结果,叙述者暴露了传统作家的叙述惯例:“让自己喜欢的那个获胜。”(292)但是,具有高度反省意识的后现代元叙述者最后却把故事的两种结局都写了出来,并通过朝空中抛硬币的方式决定结

局的先后顺序。两个结局既互为补充又相互瓦解,暗示了人类生活的复杂多元,调动了读者参与意义构建的积极性,否定了以查尔斯为主人公的单一阅读视角。

互文手法(intertextuality)是后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福尔斯使用的另一个后现代叙述策略。在后现代文本里,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Kristeva, 1986:56)。福尔斯在小说《法》中充分利用了互文手法,创造性地使用了各种文本。这些文本与小说正文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对小说主题形成暗示:莎拉的解放和查尔斯的解放同等重要。具体而言,《法》中的互文性手法主要体现在四方面:①前言;②卷首题字;③每一章节前的引文;④史料的援引。

在《法》的中译本前言中,福尔斯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描写“在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福尔斯,刘宪之译,1986),表明莎拉不只是查尔斯成长和发展的催化剂,还是一个跟查尔斯同等重要的角色。在小说的卷首语里,福尔斯征引了马克思的名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福尔斯,刘宪之译,1986)。如果读者具有女性主义意识,在阅读卷首语的过程中,自然会明白这其中的解放应该也包括女性的解放。同时,福尔斯还在各章节前频繁使用各种引文。在小说第一章中叙述者揭示,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867年,此后叙述者曾多次提及这个时间,因为那一年被视为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轫。此外,福尔斯还征引了“1869年格顿女子学院成立”“米尔的《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一书的出版”等史实,调用了“拉斐尔派画家罗塞蒂兄妹”等历史人物素材,以还原历史上被压制的女权主义意识。在小说快结束时,福尔斯再次征引了马克思关于生活的定义:生活即“人(包括女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所采取的行动”(336)。查尔斯和莎拉都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采取了行动,最后都取得了存在主义层面上的进化与解放。此外,小说中还有很多有关女性被压迫的历史文本,如:“19世纪是那样一个年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13岁的女孩子。……那时候兴建起来的教堂比在那之前历史上所造的总和还多,然而,伦敦每60幢房屋就有一幢是妓院。”(191)各种维多利亚历史文本的创造性使用表明,福尔斯想通过小说这一载体,努力对妇女问题做出回应和关注。如果我们缺乏带有女性自觉意识的阅读,我们将无法挖掘和串联这些被男权式阅读压抑的文本细节,领会互文的精奥,进而忽视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

最后,福尔斯对莎拉的塑造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陈规。有学者指出,莎拉是一个感情信念和行为动机缺失的符号,是男人幻想的产物(Michael, 1987:229),但是从“作为妇女的阅读”视角来看,这种评论是有失公允的。如果说关于查尔斯的叙述是一条清晰完整的明线,那么关于莎拉的叙述则是一条隐性而分散的暗线。“作为妇女的阅读”以对抗的姿态拒绝将作为女性的莎拉客体化、边缘化。这种阅读立场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强调了阅

读的建构作用。莎拉虽然神秘,但通过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建构,她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一定的连贯性。大致说来,莎拉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Byrd,1984:308)。第一阶段是莎拉与法国中尉相遇,法国中尉在感情上欺骗了莎拉,导致莎拉开始了女性主义的觉醒。第二阶段是莎拉在莱姆镇蒲尔特尼太太家任职,这一阶段加深了她对命运不公的认识,向查尔斯寻求理解和帮助并与之发生关系。这段时间里,莎拉的女性主义意识得到发展。第三阶段是莎拉在罗赛蒂兄妹家担任助手,成长为一名独立自信的新女性。

由此可见,文本的后现代叙述策略——立体结构、互文手法和非线性叙述,有效地提供了一种抵制传统性别歧视的阅读模式。但是它的实现既非全在于文本,也非全在于读者,而在于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需要读者同时使用后现代和“作为妇女的阅读”视角,以此消解对文本的男权式解读,凸显女性主义主旨。

3. 颠覆男权式阅读:女性言说与父权意识的反叛

对女性而言,要颠覆男权式阅读,最重要的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莎拉是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言说来实现对维多利亚父权意识的反叛呢?

莎拉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一个谎言。莎拉宣称自己是别人的情妇,即“法国中尉的女人”,但读者后来知道,这个称呼并不属实,是个谎言。然而,这个谎言却是莎拉发出的最独特的声音。在这个独特的声音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真实。这个称呼表明,在维多利亚男性文化中,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身份,任何一位年轻女性的社会定位,其身份只能取决于她的父亲或者丈夫,而不是她自己。这是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身份,建立在处于主要地位的男性基础之上。母亲、处女、妓女是传统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三种基本社会角色。这些社会角色无一不带有父权社会的权力关系模式。这些社会角色的意义在于:女性身体承载了男性需要的价值(刘岩,2010:47)。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委婉语,实际指的是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一从属、边缘和耻辱的身份给莎拉带来了痛苦,但同时也促使了她的觉醒,给了她卧薪尝胆的反抗力量,促使她由一个“堕落的女人”演变成一个自由思考者。当查尔斯劝莎拉离开莱姆镇开始一种新生活时,她拒绝了:“正是这种耻辱使她活了下来”,使她“不同于其他女人”(202)。同时,莎拉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另一个缺席男性的基础上,意在向读者昭示,在男女两极的对立中,男性的在场意味着女性的缺失。福尔斯以“法国中尉的女人”为小说的标题,让读者似乎听到了莎拉作为“他者”的别样声音,感受到了莎拉独特的反抗力量。

莎拉的声音还通过她与查尔斯见面时的对话向读者呈现:她暂时获得了讲话的权利,甚至间或哭泣和愤怒的权利。通过这些声音,读者感受到了莎拉对虚伪的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憎恶和反抗,对平等、独立和自由的渴望。莎拉曾直言她内心的痛苦和

孤寂:“甚至桌子、椅子、镜子等物体都串通起来加剧我的孤独。”(139)“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我不该忍受那么多痛苦。”(163)“我生活在据说是善良、虔诚的基督徒中间。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比最残酷的异教徒还要残酷,比最愚蠢的动物更愚蠢。”“无论我犯了什么罪,都不应该让我受这么多的苦。”(101)莎拉自我的言说虽然不多,却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她对维多利亚父权意识的反叛。

莎拉言说自己、反叛父权的第三种方式是她的身体叙事。维多利亚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妇女的言行有极为严格的规范。“妇女不得越雷池半步”(81),但莎拉不一样,她忠实自我,敢于承认她有一个身体,并能够感受爱与激情。莎拉被蒲尔特尼太太解雇后,给查尔斯写了一封只有三个词的信:Endicott Family Hotel(恩迪科特旅馆),这封信给了查尔斯选择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焦虑和痛恨。信里的三个词让查尔斯“备受折磨、六神无主、心乱如麻”(244)。叙述者说:这个行为正如莎拉的其他行为,“既勾引又退缩,既微妙又简单,既骄傲又祈求,既辩护又指控”(244)。为了跟查尔斯在一起,莎拉再一次用谎言包裹了真相。她那没有受伤的脚踝绷带掩盖了她的愿望,并将查尔斯引到了她的身边。查尔斯以为他勾引了莎拉,但实际上是莎拉勾引了查尔斯。在维多利亚男权社会里,女性以客体和他者的身份出现,女性的身体成为男性欲望和审美的对象。莎拉的行为是对维多利亚社会关于女人、性和身体观念的颠覆。这正好呼应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的身体成为打破沉默、抵抗男权以及主体形成的基础(李银河,2005:70)。对不少读者来说,莎拉很有操纵性,而且擅长自我表演。有学者甚至认为小说将莎拉描写成了一个将男人引向毁灭的女人(Hagopian,1982:199;Laughlin,1972:85)。但莎拉并不是无情的操纵者,更不是父权神话里将男人引向毁灭的妖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伪装是源于爱的驱动。她对查尔斯说:“在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里,我可能成为你的妻子。”(279)“我爱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从未受骗过。欺骗过你的是我的孤寂,是一种怨恨,一种妒忌。”(255)

莎拉的身体叙事还表现在小说对莎拉的性感进行了描写,这种描写是在查尔斯的视角下进行的。有批评家囿于传统的阅读程式,认为这种叙事呈现了男性对女性肉身的窥视,莎拉仅仅成为男性眼中被看的客体(Michael,1987:232)。其实,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视野下,福尔斯关于莎拉的身体叙事成就而不是瓦解了莎拉的主体建构。首先,该小说的体裁是浪漫爱情故事,正如格伦尼尔(Grenier)(1981:79)所说,小说具有浪漫主义风格,莎拉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物。要建立莎拉和查尔斯之间炽热而浪漫的感情,关于恋人的激情描写非常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莎拉的性感的同时,作者福尔斯凸显了莎拉的抗争精神。例如,她说:“我把自己给了他。”莎拉的目光里有“一种激情、一种愤怒、一种反抗。她好像赤身裸体站在他面前,并为此感到骄傲”(125)。当他们撞见玛丽和山姆拥抱亲吻时,莎拉“做了一件令人感到奇怪而又震惊的事,那效果无异于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她竟然笑了”(125)。在后现代的文化

语境中,身体的含义受话语理论的影响,呈现出多元而富有弹性的特点。身体叙事既可呈现权力的控制,同时也是自我认同的方式。莎拉也可能在“观看他人”与“知道自己被他人观看”的互动中感受到了自我的认同。具备女性主义意识的现代女性读者关于身体叙事的体验,已不同于传统的读者。女性读者从凝视性感女性莎拉中也可获取愉悦和认同。当代女性麦当娜(Madonna Ciccone)就是典型的例证。作为一个支配欲望很强的女人,麦当娜在她出演的视频中刻意戏仿被男性偷窥的形象,以此赋予女性观众以力量,让她们感觉自己身体的强大(Young,1989:184)。

莎拉似乎遵循了尼采式的持续转变模式,不断创造出新的自我(Rokotnitz,2014:351)。在小说最后一个结尾中,莎拉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狭隘僵化的性别话语的束缚,以一种崭新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她给前拉斐尔派艺术家但丁·罗塞蒂(Dante Rossetti)担任助手。前拉斐尔派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先锋派,它挑战当时的艺术成规,是英国现代艺术运动的构建者。但丁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与该学派有密切联系,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位充满了女性主义情怀的女诗人。在这样的艺术圈工作生活,符合莎拉的精神气质,使她觉得“工作丰富多彩,令人愉快。全然没有一般工作的辛苦和乏味”(325)。女性的解放始于其完全融入创新工作的领域(梅尔森,2013:58)。莎拉的新工作是一个象征,一个比喻。福尔斯对其新工作、新形象的描绘意在向读者说明,作为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社会的女性,莎拉的蛹已破茧,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实现了对女性身份的完美建构。

4. 结语

综上所述,《法》已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其后现代特性使其文本内部充满了意义空白和非连贯性,但是其文本的召唤性结构调动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妇女的阅读”策略凸显了文学接受中女性作为阅读主体的建构性和创造性,有效地“抗拒”了各种隐秘的男权式阅读或所谓的“中性”阅读,有助于重新审视莎拉的神秘与抗争,并洞悉小说深层次的女性主义主旨与艺术内涵。

注释

- ①本文作者就小说的人物塑造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详见拙文《超越现实主义:析〈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人物塑造》(《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 Byrd, Deborah. The Evolu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Sarah Woodruf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s a Feminist Nov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984(4):306-321.
[2] Cixous, Helene.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G]//Elaine Marks &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Brighton: Harvester, 1980.

- [3]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 Fetterley, Judith. *The Resisting Reader: 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5] Foster, Thomas C. *Understanding John Fowles*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
- [6] Grenier, Richard. *The French Lieutenant's Person* [J]. *Commentary*, 1981(72): 78-87.
- [7] Hagopian, John V. *Bad Faith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82(23): 199-200.
- [8]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G]//(ed.) Toril Moi.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34-61.
- [9] Laughlin, Rosemary M. *Faces of Power in the Novels of John Fowles* [J]. *Critique*, 1972(13): 84-88.
- [10] Michael, Magali Cornier. "Who is Sarah?": A Critique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s* Feminism [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1987(28):225-236.
- [11] Moi, Toril. *Sexual/Textual Politics*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2] Rokotnitz, Naomi. "Passionate Reciprocity": Love, Existentialism, and Bodily Knowledge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Partial Answers*, 2014(12):331-354
- [13] Tarbox, Katherine. *The Art of John Fowles* [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8.
- [14] Waugh, Patricia. *Feminine Fictions: Revisiting the Postmodern* [M]. London: Routledge, 1989.
- [15] Woodcock, Bruce. *Male Mythologies: John Fowles and Masculinity* [M]. Totowa: Barnes & Noble, 1984.
- [16] Young, Shelagh.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Whose Gaze is It Anyway?* [G]// Lorraine Gamman & Margaret Marshment (eds.). *The Female Gaze: Woman as Viewers of Popular Culture*. Seattle: Real Comet, 1989.
- [17] 陈榕. 莎拉是自由的吗? ——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最后一个结尾[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3):77-85.
- [18] 黄华. 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9]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0] 刘岩. 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1] 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M]. 李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22] 乔治·梅尔森. 波伏娃与第二性[M]. 丁琳,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 [23] 约翰·福尔斯. 法国中尉的女人[M]. 陈安全,译.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
- [24] 约翰·福尔斯. 法国中尉的女人[M]. 刘宪之,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冯 革

论语用主体文化意识 缺位与语用失误

——文化失常话语的语境化解释

何 刚

(华东师范大学 英语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 本文关注同一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建构性语用失误。从语用主体的文化意识视角出发, 我们发现: 语用主体文化意识缺位可通过语境中的话语与非言语行为观察到, 是说话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意识缺位。它可看成是互动者的“文化失常”, 可导致语用失误。本文从以下方面探讨这一现象: ①语用者的多主体性与文化意识缺位; ②话语建构者文化主体意识缺位的语境化表现形态; ③语境相关的文化失常分析; ④本研究揭示的合理性及文化语用学理论意义、言语实践意义。

关键词: 主体文化意识缺位; 语用失误; 语境相关的文化失常

On Cultural Absence from Speaking Subject and Pragmatic Failures: A Contextu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Malfunctioning in Utterance Construction

HE Gang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pragmatic failures in utterance construction in a homogeneous cultural context. From a cultural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the speaker, we find that: the so-called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美国英语的文化语境指示方式研究”(10BY090)和福布赖特高级学者子项目(2009—2010)“美国话语的文化语用学解释模型”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 刚, 男,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 博士, 博导, 博士后合作导师, 主要从事理论语用学、文化语用学、语言哲学研究。

“absence of the speaker’s cultural self” is detected in utterances and non-verbal actions, and can be construed as an interactant “cultural malfunctioning”, leading to pragmatic failures. This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①the selves of a speaker in contextualized positioning and situated absence of the cultural self; ②contextualized manifestations of such an absence; ③a situated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malfunctioning in the speaker; and ④rationality of the study and its impact upon cultural pragmatic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cultural absence from speaking subject; pragmatic failures; situated cultural malfunctioning

0. 引言

语用失误是一种涉及发生在人际交往语境中的不合适言语行为或不合适话语理解的语用现象。不合适性表现在说话者的意向、话语的语力、预期、实际效果(听话者理解)之间的不和谐、不一致关系上。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学者珍妮·托马斯(Jenny Thomas)(1983),其研究现状呈现出两种一边倒的趋势:①对听话者理解能力缺失;②对跨文化场景中语用失误(国际文化交流、跨国公司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翻译、二语习得、外语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等)的过度侧重,例如 Thomas(1983)、Harder & Kock(1976)、Blum-Kulka & Olshtain(1986)、Cruz(2014)、Guo Zirui(2017)、Ishihara(2018)、Xu Yangye(2015)、Sheng Dongmei(2016)、Aimoldinaa(2016/2015)等人的研究。客观地说,虽然当初托马斯定义“语用失误”时表现出一定的中立性,但她故意不提建构性失误,显然有失公允。从言语交际和语用失误的实际发生看,由于语境误判和说话者自身心理信息、认知状态等偏差造成的话语建构性语用失误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同一文化语境内部成员之间,比如美国文化的成员之间,造成十分严重的直接后果和社会文化后果的语用失误也并不少见,但学界却对之鲜有关注。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提到“语用失误”,必然是理解性失误,也必定是跨文化语用失误。鉴于这种关注度的严重失衡,本文拟从美国语境出发,讨论同文化语境内部的建构性文化语用失误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寻求公平和平衡的解释。

1. 语用失误、语用者的多主体性与文化意识缺位

语用失误,既可以是理解互动中对方话语的失误或误解(misunderstanding)(Thomas, 1983:91-112),也可以是因为语境识别错位而造成的解释失误(misinterpretation),更可以是建构话语、执行言语行为或语用策略、达成互动目标的失误。从建构话语的角度来看,语用失误就是说话者未能建构一个符合语境需要、合适执行其特定言语行为或语用策略意向(用意)的话语。实际建构的话语要么和语境不协调,要么和说话者正常的、需要的、满足意向的话语正好相反。这就像射击一样,要么射偏了,要么反弹到

不该去的方向,总之,没能击中目标。本文重点研究建构性语用失误,例如:

(1) King — who's considered the most anti-immigrant member of the House and has been widely accused of racism before — stunned even members of his own party when 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ursday that he couldn't figure out why people were offended by white supremacy.

"White nationalist, white supremacist, western civilization — how did that language become offensive?" King told the newspaper. *"Why did I sit in classes teaching me about the merits of our history and our civilization?"*

(Sommerfeldt, 2019)

表面上看,斯蒂芬·金(Steve King)的提问反映了他的困惑:为什么“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西方文明”这样的语言变成得罪人的语言?可实际上,该提问还有另一层含意:质疑特定命题内容(that language became offensive),翻译过来:那种语言怎么就成了冒犯性言辞了呢?(隐含:不相信X)。我为何要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我们的历史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史就是白人文明史)?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西方文明”完全是正当的。可他忽视了话语将要激活的文化语境——基于多元化的当代美国主流文化的平等(性别、族裔、群体之间、个体之间)意识。在广大的听者——美国观众、读者、接收者看来,这肯定是一个语用失误,不管他本人承不承认。他的话语与美国主流文化意识之一的族裔平等格格不入。究其原因,恐怕是说话者一贯的、唯我独尊的“白人至上”观念所导致“文化排他”的习惯性表现,可概括为“阵发性文化意识缺位”。说话者斯蒂芬·金是位共和党参议员,属于保守派的代表,按照保守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最应该说的和做的是极力维护主流的美国文化意识: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然而,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分裂和个别事件引起种族主义思想回潮的影响,他忘掉了美国人的文化理想(追求人人平等)的根本所在,以致口不择言、连连犯忌,使自己成了最激进的反移民议员,而他的话语也将自己所在的共和党置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语用失误、语境、使用者文化意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一次语用失误都一定会涉及文化,但是,在高度敏感的文化共同体中,语用者的文化意识缺位一定是导致语用失误的十分关键的原因。首先,语用失误意味着建构的话语没能在听话者那里获得预期的理解或响应,要么是话语的用意不适合听话者、要么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话语效果所需要的程度、要么是说话者预期的目标不适合听话者,总之,话语不适合听话者。那么,话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的合适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合适性呢?很显然,从现场直接语境是很难看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某一话语或言语行为是否合适,取决于听说双方的身份在社会交往中被赋予的文化联想和设定、互动中听者状态引起的社交联想、话题对听说双方的影响(人际、社会、文化)。可以这样说,合适性是一种文化界定的社交

互动特性。比如,礼貌话语被认为是合适话语,但是从礼貌的观念到礼貌的尺度、适合的对象、表达的方式和社会人际功用等都是由文化设定的。反过来说,文化设定了社会交往和言语交际的核心规范及核心观念,并通过交际形成了优选行为和模式,个体无时不受到这些设定和优选方式的影响,并以此为参照。比如,初次见面,中国人倾向于尊称对方(先生贵姓/小姐尊姓?)而谦称自己(鄙姓 XX/免贵姓 XX),反之,就会被认为是失礼。所以,也有一种观点:言语行为也是文化界定的。直接语境中的言语行为、语用策略等,表面上和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为什么人们要选择特定的话语和语用策略?追根溯源,只能在文化系统中找到权威且能让人接受的解释。由此,理解语用失误,必须深入到文化层面,寻找话语所依赖的文化语境(设定),看看话语建构者的文化主体意识是否缺席(缺位),即文化作用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寻求该语用现象的合情合理且合适的解释。

1.1 主体意识的语境化定位

表面上看,语用失误是语句或词句的失当。进一步看,它其实是语言使用者行为失当的话语体现。究其原因,我们可看到话语映射的说话者的主客观信息。语用学[如 Levinson(2004)在解释“指示语”的主体性时所示]具体地揭示了话语中所激活或指向的说话者的语境化自我意识(contextualized self-awareness)。简单地说,从话语的语境敏感成分(指示语)可看出说话者在具体语用情境中清醒地、清楚地、合适地、有效地把握言语交际过程、环境及相互关联中的自我,并在话语中以某种方式体现这样的“自我”。这样的自我不是单纯的情感或情绪化的自我,而是一个和交际对象、听话者的现场特征、社会特征、文化特征、虚拟特征等密切关联的概念。它是受他人影响而浮现的或建构的自我,也是有互动价值的语用自我(pragmatic self)。和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冥思苦想的自我不一样,语用的自我是一个话语现实(pragmatic reality),是经过话语处理的自我。它包含着不同类型(知识、修养、身份、姿态、立场、视角、情感、欲望、意愿、取向等)、不同语境层次(直接/现场语境、关联社交/社会语境、文化心理语境、网络虚拟语境等)以及不同效果期待(情感期待、关系期待、立场期待、行为期待等)。比如:

(2) “Hang on!” I said, stepping away from his gesture, “What do you mean, *terminal*? I don’t get it...”

“David,” Steve said in a deliberate, slow voice, gripping me by the shoulders, “your father...*he’s not going to make it.*”

“You mean...you are saying he’s going to die? *My dad is going to die? No way!*” I shook my head in complete denial. “*Can you give him a shot of something ...or I thought there’s some kind of chemo treatment...*”

(Pelzer, 2000:68)

在这段对话中,大卫知道自己的父亲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对父亲的不舍之情(情感自我)凸显了出来,他不愿看到父亲离去,希望医生给他注射一种神药或者化疗,期盼父亲起死回生。一个长期被生母嫌弃,只得到过父亲弱弱怜悯的弃儿,父亲是他唯一的牵挂。因此,此时此刻,情感自我完全战胜了理智,令他不敢相信父亲即将撒手人寰。

会话过程中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自我意向状态(intentional state)。它表现为受到语境影响而产生的自我认识和处置,可以从说话人的身份、立场、情感、姿态等推导性信息中得到印证。一般而言,根据语境的形态,我们可以得到:现场自我、社交/社会自我、文化自我以及虚拟自我意识等。

1.2 现场自我意识

现场自我意识指的是受到直接语境(immediate context)——物理的、时空环境、正在进行的事件、听说双方可以观察到的直接特征等——影响产生的自我意识。比如:

(3)“My brain couldn’t process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embarrassed*,” wrote Flores. “I couldn’t move and I couldn’t say anything. I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to get Biden away from me.*” (Goodkind, 2019)

在直接语境下,前副总统拜登的过于亲密的举动(吻嘴唇)让这位女性猝不及防,只想推开他。也就是说,当受到直接语境中不当行为作用后,接收者可能产生某种与自我的身体、脸面、安全感等相关的感受以及进一步的动机、意愿、想法、信念、情绪等自我意识特征。

1.3 社会自我意识

社会自我意识指在特定社交或社会语境中,说话者对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及相关的态度与立场的选取。社会语境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共同所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关联信息(权势结构、层级以及互动的权势关系;利益关系——利益分配方式、利弊、成本与收益;话语权关系——权威与普通人;机构与个人关系),社交语境则是临时性、有组织、社会互动的关联信息。无论是社会语境还是社交语境,个人都会在互动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和作用以及彼此的区分,从而选择特定的方式去建构话语。比如:

(4)“I’m *not suggesting that Biden broke any laws*,” wrote Flores. “But the transgressions that society deems minor (or doesn’t even see as transgressions) often *feel considerable to the person on the receiving end.*” (Goodkind, 2019)

很显然,说话者把拜登的过失和法律联系起来,说明她具有较强的语境-法制意识。虽然说他行为并不犯法,但是,毕竟对接收端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句话隐含着:我并未指控他性骚扰(因为时下有许多女性站出来指控与男性社交中被骚扰,所以这是非常敏感的社会现实)。在她看来,亲近而不过界,显然是“竞选总统”所需要

的行为操守。比如,接近异性需考虑对方感受,因为对方的社会自我是有界限的。因此,语境中的社会自我,是把自己和对方提升到社会关系层面上的自我定位和意识,也是对直接语境的社会化处理,在这种自我意识的作用下,说话者会把自己的立场社会化,同时也会把对方的行为举止的解释社会化。

1.4 文化自我意识

直接语境中的自我也是一种文化意识作用下的自我,说话者对语境中听话者或谈论对象的立场和看法,往往是通过他的大脑内部文化信息被现场事件状态特征——听话人的行为、言语、谈论对象的状态、事态变化、预期——联想激活而产生的自我语用意识。比如:

(5) Then the book tour fell apart.

Moby, who claimed in his memoir, “Then It Fell Apart,” that he dated actress Natalie Portman — who later disputed the claim — has seemingly decided it’s time to lay low for a while.

Moby initially pushed back on Portman’s claims that they didn’t date, posting a picture of himself shirtless with Portman and writing on Instagram that, “*I recently read a gossip piece wherein Natalie Portman said that we’d never dated. This confused me, as we did, in fact, date.*” (Balk, 2019)

在例(5)中,音乐家莫比(Moby)之所以取消了他的签名售书之旅,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受辱”,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前女友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没有说实话,他们明明约会过,可她却否认,这显然有悖美国人强调的“诚实、说真话”的处事伦理(文化价值)。因此,“诚以待人”意识令莫比从直接语境的“现场我”一跃成为心理语境中的“文化我”。

1.5 “文化我”的缺位

文化主体意识的缺位就是在特定情境需要说话者唤醒自己的文化自我的时候,文化自我反而没有被唤醒,没有引导说话者进行合适的言语行为选择,也没有对说话者/互动者进行有效的监控,以致话语和言语行为出现文化失控,甚至出现反文化的情况。文化主体意识缺位不但影响预期目的的实现,而且会导致超出正常预期的、事与愿违的严重文化后果。比如:

(6) In early December an African-American student told his science teacher, Gil Voigt of Fairfield Freshman School, that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president. Voigt, who is white, is accused of telling him, “*We do not need another black president.*”

(Clark, 2013)

本来在一个鼓励孩子敢想敢说、追逐理想的文化中,老师对于学生“想当总统”这一宏愿的合适文化态度应该为:很好呀,那就努力吧。然而,也许是出于白人至上或自尊的考虑,科学课老师未能顾及文化的层面,且迁怒于对方的肤色,给该兴致勃

勃(因为奥巴马当选总统而受鼓舞)的学生浇了大大的一瓢冷水。换言之,当直接语境需要这位老师激活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从文化的高度去赞赏和鼓励学生的时候,他的“文化自我”缺位严重挫伤了幼小心灵的文化理想和追求,授人以“嫌弃对方的肤色”的把柄,并惹上了“种族歧视”的麻烦。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互动中言语者的自我是一个语境化的多种自我,而文化自我是深层的自我范畴。话语者在语境中的表现可以是文化自我的呈现,也可以是自我文化主体意识缺位的表现。本文从语用失误中探寻文化主体意识缺位,目的就是要生动地揭示导致这种缺位的缘由。

2. 文化主体自我意识缺位在语境中的主要表现

言语交际中语用者的文化主体意识缺位是通过话语和言语行为推导出来的文化语用信息特征。在直接语境中,文化主体意识缺位会导致语用失误和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其表现形式可以从语境化视角概括出:①对直接语境中文化敏感的物理特征、话语特征的视而不见;②对话题的文化敏感性反应迟钝;③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文化敏感成分的意识迟钝;④对语境相关文化设定的意识迟钝。从这四点出发,可以进一步追溯文化语用失误的原因。

2.1 对物理语境中文化敏感特征的无视/不闻

言语交际中听说双方所处的直接语境的物理特征,如外貌、肤色、个头、胖瘦、走路姿势、面部缺血、身体缺陷,以及与对方相关的其他关联物理特征(如房屋、家具、车辆、门面、话语特征)等在看重差异的多元文化、等级显著的文化中都是高度敏感的。一般而言,自我归属与社会认定的多数群体认为己方是正常的,对方是不正常的,而被认为是不太正常的一方往往会受到歧视、嫌弃或嘲弄,因此,充满了委屈、哀怨和自卑,对平等的渴求异常强烈。而自认为是正常的一方,往往会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方的存在,对他们的利益或诉求视而不见,甚至拿对方的特征开涮。比如:

(7) Teachers are often expected to encourage their young charges, offering help to both those who soar at the top or linger at the bottom of the class, guiding them through their formative years. However, one educator in Florida has been left decidedly unimpressed with a student's assignment—and was not afraid to say so.

The unnamed teacher at Rutherford High School in Springfield gave short shrift to one science assignment and wrote across the top “WTF is this?” (Alsup, 2019)

例(7)显示,教师对学生的作业很不满意,有权提出批评,但是她用社会流行的恶语(骂人话:“他妈的这是什么?”)来评论之,背离了教师的文化使命(鼓励和引导学生度过他们的成长期),是完全不合适的言行,引起家长的愤怒(要求学校给这位不具名老师以处分——档案里记一笔)。这说明该教师对直接语境相关特征的文化敏感度不足(美国的学校文化是一个娇惯学生的文化,教师对学生只能捧着,不能打骂)。

2.2 对话题的文化敏感性反应迟钝

在言语交际中,有些话题对语境的合适性要求非常高。比如,某些物体特征或形状具有高度的性别特征相似性,因此,在跨性别交谈,尤其是工作场合的会话中是非常不合适的。这些话题往往出现在私密的、同性别闲聊中,但绝对不适合跨性别交谈。然而,在人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些避讳。比如:

(8) (Principal John Chase Jr. of Bronxdale High School made a series of outrageous comments to female staffers last July when his school received a new photocopier and a new computer, according to a November report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s Office of Equal Opportunity.)

"Have you seen the *new copy machine*? It does everything. It even has a *hole* in it where you can *stick your d—in it and get a b—job*," Chase told two female staffer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ors.

Officials punished Chase—who earns a yearly salary of \$ 132,633 and has worked for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since 2006—by placing a disciplinary letter in his personnel file and requiring him to undergo sensitivity training. (Chapman, 2012)

按理说,约翰·切斯校长(Principal John Chase)到下属办公室去视察,学校得到了新办公设备,是件高兴的事,但高兴也要有度,不能得意忘形,更不能在女下属面前谈论复印机那个洞,而且还把它发挥到男女交欢的联想中去。也就是说,工作场景下谈论跨性别的私密话题,而且没有其他男性在场,很容易引起误会。果不其然,两位女下属把他告到了区教育局,说他性骚扰。性骚扰在美国文化中是一种涉及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宽容的行为。所以,最后他只好接受纪律处分,还得去接受“文化敏感性”培训。

2.3 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文化敏感成分的意识迟钝

言语交际中,说话者与听话者的互动关系,有时也会携带文化敏感的成分。在主张平等和多元的美国社会里,彼此身份和角色关系的复杂性常常可能给自由言论带来限制和风险。因此,说话者需要时刻保持文化的警觉,否则就会出问题,例(7)和例(8)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又比如:

(9) "*Now it's all about taking selfies together. Social norms have begun to change,*" he said. "*The boundaries of protecting personal space have been reset, and I get it, I get it. I hear what they are saying. I understand it, and I'll be much more mindful. That's my responsibility.*"

At least four women have accused Biden of inappropriately touching them.

Among the accusers is Caitlyn Caruso, a 22-year-old sexual assault survivor who alleges Biden rested his hand on her thigh during an event about sexual misconduct at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even though she says she twisted in her seat out of

discomfort.

(Sommerfeldt, 2019)

言语交际中把握好听—说双方的体位间距非常重要。爱德华·T.霍尔把北美的典型人际距离进行了总结(四大类)。在社交场合,人际物理间距意味着彼此的个人空间、行为边界、侵犯性和个人领地(personal territory)的文化权重。美国前副总统是否享有比他人更大更多的支配他人空间的权利呢?显然不是。他也必须管住自己的手脚,不能对听话者动手动脚(侵犯他人)。现在,他要竞选美国总统,就必须指出,因为总统需要成为践行文化意识形态(信念、价值、规范、原则)的表率,成为文化的守护者。

2.4 对语境相关文化设定的意识短路

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中可能对与自己直接相关的那些职责、义务、规则、原则、制度的意识比较强烈,而对那些可能的、和听说双方有关的文化设定(cultural assumptions)的核心理念、信念、价值系统、文化态度的意识比较淡漠、模糊不清。因此,他们在语境中往往过度较真与直接相关的那些社会心理信息,而对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主张和设定意识滞后,反应迟钝,一直被视为“文化失敏”(cultural insensitivity)。比如:

(10) Carle Wheeler was doing what one does on a vacation in the sun, hanging with her 5-year-old daughter in the pool of the hotel in Pasadena, Calif., where they were staying, when a man approached them.

The man, who is white, asked Wheeler and her daughter, who are black, if they had showered before getting into the pool, Wheeler wrote on her Facebook page, “because people carry diseases into the pools and *he doesn't want the health department to shut the pool down.*”

The two moved to the other end of the pool, but he *approached again* and she confronted him on what appeared to be “blatant racism”, she said. He claimed he worked for the Health Department when she asked, Wheeler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Post.

“I let him know that *being black is not a disease and showering would not wash the BLACK off our skin,*” Wheeler, 33 a software engineer and single mother from Dallas wrote on her Facebook page. “*I think it's awful that ANY man would think it's okay to essentially ask a woman and a little girl if we took off our clothes and scrubbed our naked bodies before getting into a hotel swimming pool.*” (Rosenberg, 2018)

显然,例(10)中的宾馆游泳池管理员反复要求黑人顾客母女先去淋浴,是怀疑她们不干净,会把病菌带入泳池。从职业角度讲,他坚持要求所有游泳者“先淋浴、再下水游泳”符合规定,但却并未顾及对方的肤色,而肤色在美国社会是文化高敏特征,和种族平等、歧视等文化理想和价值取向紧密相连。因此,该管理员对此

视而不见,表现出文化主体意识的短路(如果他不是文化无知的话)。

3. 语用失误中主体文化失常原因的语境化分析

语用失误中的说话者文化失常,是文化对言语交际者语境监控失当的表现,作为一种心理信息系统,文化虽说无时不在试图介入人们的交往和言语活动,可是它的力量在直接语境中并不总是强大的。当直接语境或社会语境需要被凸显的时候,文化的训示也就被遗忘或忽略。究其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可以导致语用者遗忘文化的存在:①直接语境中某个显著特征吸引了语用者的全部注意;②被表面现象或特征迷惑产生的文化误判;③自我优越感;④文化傲慢(cultural arrogance)。

3.1 被误导的注意(misguided attention)

被误导的注意指直接语境中某个或某些特征吸引并占有了语用者的全部注意,导致主体文化意识的淡化或隐形。例(8)中,复印机那个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一时占据了切斯校长的全部注意,令他得意忘形,忘掉了男女性别对话题的文化敏感性差异,也忘掉了美国人普遍高敏和神经质,以致铸成大错。同样,几年前,洛杉矶快船队时任老板斯特灵(Sterling)因为其情人把她与黑人及少数族裔的人的合照晒到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而感到有伤自己的文化自尊,强烈的不满误导了他,使他质问合照一事的正当性时只看到合照者的少数族裔身份特征,完全忽略了听话者的少数族裔(墨西哥裔、黑人)身份,因此,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并将此对话曝光,引起全社会哗然。这件事导致全美篮联(NBA)将斯特灵逐出(判令其卖掉俱乐部),令其损失巨大。按理说,该老板是社会名流,未必不了解美国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可是他在情绪驱动下,就盯住合照这件事,忘掉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他的球队里一定也有各种肤色的球员,忘掉自己应该是深谙美国宪法和平等主义理想等核心意识形态的文化主体和代言人。因此,语用失误显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缺位可能是由某些临时性因素造成的。

3.2 被表面现象或特征迷惑而产生的文化误判(cultural misperception)

在有些语境中,某个或某些表面现象也可能迷惑语用者,使其产生某些文化错觉或误判。例(10)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看到两位黑人女性在游泳池游泳时,管理员仅凭对方的肤色,就判断她们身上不干净,直接上前问人家进入泳池前有没有先冲洗一下,甚至问了一次还不放心,又去问第二次。隐含的意思就是:肤色等同于不洁。这是一种可能引发强烈歧视联想的文化误判,尤其是在肤色敏感的多族裔美国社会里。因此,引起对方的愤怒是必然的,种族主义指责也是逃不掉的。很显然,文化层面上的误判是由该管理员被肤色特征迷惑而引起的。在咱们的社会里,人们也时常根据对方的穿着打扮、行为方式来判断他人的身份和来源,说别人是“乡下人”“农豁皮”“你买得起吗?”,寒碜对方,令对方大受侮辱,甚至导致肢体冲突,绝大部分都起因于这种误判。

3.3 族群优越感(ethnic/group-superiority)

族群优越感(William, 1960)在美国主流价值体系中就有提及,是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相关联的,对自我、自己所属族群、族裔、团体、阶层、学历、地位密切联系的一种“高看自己、低看他人”的社会心理状态。族群优越感可以通过看人的眼色、体位选择、话语单位及言语行为来体现和观察。它可导致与对方的疏离,以及双方的对抗心理、抵触、敌意等反文化的交际关系、语用失误和交际失败。在多族裔、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先到者、多数族裔和男性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优于别人,因此,话语里流露出高人一等、不屑一顾、鹤立鸡群等信息。受这种感觉支配,有意无意地伤害他人,结果孤立了自己,令自己四面楚歌,在社交中举步维艰。上面举的那个洛杉矶快船队前老板斯特灵当面质问其情人斯蒂维亚诺(Stiviano)“为什么要和少数族裔拍照?”(Why are you taking pictures with minorities)就是受这种自我优越感驱使,以为自己是多数族裔的人(白人),高人一等,自己的情人被接纳后理当发生文化归属感转型,再也不能和(低人一等的)少数族裔瞎混。质问就意味着责怪,意味着对方做了错事,这显然与追求平等的美国文化理想背道而驰。

3.4 文化自傲(cultural arrogance)

佩西科(Persico)(2013)指出:“文化自傲意味着一个人相信或采取的行为就好像他们的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好。例如:美国人比欧洲人好,或者日本人比中国人好。”文化自傲是指对于和自己不一样的文化事项、人、族群、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现出的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和前述的族群优越感相一致,是一种基于极端偏见和误解的、对具体语境信息漠不关心的前语用状态。由于语用者对实际的情形和对方的文化毫无兴趣、全然不顾,只管自己的文化心理状态,因此,其言语行为自然无视他人的文化情感与情结,不管他人的面子、利益、诉求、情感等,横冲直撞、四面树敌,使自己的信用荡然无存,成为笑话。美国议员斯蒂芬·金就是这样一个文化自傲之徒。作为国会议员,他应该是美国主流信念和价值观的代表,说话做事都须留意自己的文化形象。然而,由于此人以白人身份为傲,目空一切,说起话来毫无顾忌。在这种场合,他竟然认为不能指望奥巴马、斯蒂夫·乔布斯、小马丁·路德·金等人来传承西方文明,因为他们是“别人家的小孩”。这种典型的隐性排他指示语,在文化语境中具有强烈的离间性和歧视性,是文化自傲的表现,所以立即引起全美社会的声讨。

4. 结语

语用失误是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中对话语的误操作,使话语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事与愿违。从建构者的角度看,话语所表征的言语行为不仅背离了说话者的初衷,而且产生了与说话者期待相左的语境效果;从接收者角度看,话语的意向与期待没有获得合适的解释,甚至产生误解,以致交际无法正常持续展开。本文例释

的语用失误,无论其形态、缘由,都是同一文化内部发生的,与听说者文化主体意识的语境化缺位有关。这足以说明,研究语用失误不可仅关注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文化内部社会交际语境中产生的语用失误大量存在,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我们必须弥补这一点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语用失误与听说者,尤其是说写者的文化意识缺位关系明显。它使我们认识到:语境中的语言使用者不仅仅是直接语境的主体(只会感受到直接的生理或心理需要、交往需要、物质的需要和满足),更是文化语境的主体,必须对话语语境进行文化扫描,对话语的文化高敏成分、言语行为的文化高敏成分进行文化扫描。强化自我的文化自觉和自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库,梳理和言语行为相关的文化要津(核心文化意识、人际文化意识、流行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以利于强化语境中的文化主体地位,采取合适的文化站位、文化视角、文化姿态,使言语交际既有利于自我意向的呈现和传递,又有利于话语信息的合适理解、言语互动中的合适、有效回应,还有利于社会交往沿着文化指引的方向行进,促进社会文明和人类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 [1] Aimoldina, A., Zharkynbekova, S. & D. Akynova. Investigating Pragmatic Failures in Business Letters of Kazakhstani Professionals [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6(39):65-70.
- [2] Alsup, B. Florida Teacher Writes “WTF is This?” on Student’s Homework [EB/OL]. [2019-05-30].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ny-florida-teacher-writes-wtf-is-this-on-students-homework-20190530-6ustytbgjffhdict4uanys4-story.html>.
- [3] Balk, T. Moby, Humiliated over Natalie Portman Dating Claims, Cancels Book Tour [EB/OL]. [2019-05-29].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ny-moby-cancels-book-tour-20190529-op7ciwv7yre6rlbbyvdkvvlmwe-story.html>.
- [4] Blum-Kulka, S. & E. Olshtain. Too Many Words: Length of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Failur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6(8):165-179.
- [5] Chapman, B. Bronx Principal under Fire for Outrageous “Sex Machine” Comments about Photocopier [EB/OL]. (2012-01-08) [2019-05-29].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york/bronx-principal-fire-outrageous-sex-machine-comments-photocopier-article-1.1002357>.
- [6] Clark, M. D. Alleged Racist Comment by Teacher Draws Newcriticism [EB/OL]. (2013-12-30) [2019-05-29]. <https://www.cincinnati.com/story/news/2013/12/30/board-member-naacp-blast-fairfield-teachers-alleged-racist-comment/4252871/>.
- [7] Cruz, P. M. Pragmatic Failure,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14(39): 34-50.
- [8] Goodkind, N. Joe Biden Accused of Unwanted Kiss From Behind During Campaign Event While Vice President [EB/OL]. [2019-03-29]. <https://www.newsweek.com/joe-biden-kisses-women->

- lucy-flores-1380784. html.
- [9] Guo, Zirui. A Study on Pragmatic Failures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ntext [J]. *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17(14): 55-59.
- [10] Harder, P. & C. Kock. *The Theory of Presupposition Failure*[M].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76.
- [11] Ishihara, N. *Inter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G]// J. I. Lontos (ed.). *The TESOL Encyclopedia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8.
- [12] Levinson, S. C. *Deixis and Pragmatics*[G] // L. Horn & G. Ward.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4.
- [13] Pelzer, D. *A Man Named Dave: A Story of Triumph and Forgiveness* [M]. New York: Plume, 2000.
- [14] Persico, J. *Cultural Arrogance and How it Destroys our Goals: Part 1*[EB/OL]. (2013-12-01)[2019-03-21]. <https://agingcapriciously.com/2013/12/01/cultural-arrogance-and-how-it-destroys-our-goals-part-1>.
- [15] Rosenberg, E. *A Black Woman was at the Pool on Vacation; A White Man Asked whether she Showered before Swimming*[EB/OL]. (2018-06-15)[2019-05-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nation/wp/2018/06/15/a-black-woman-was-at-the-pool-on-vacation-then-a-man-insisted-she-shower-before-swimming/>.
- [16] Sheng, Dongmei. *Analysis of Pragmatic Failur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G] //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MEICI 2016). Paris: Atlantis Press, 2016.
- [17] Sommerfeldt, C. *Joe Biden says “I get it,” Promises to be Less Handsy amid Misconduct Accusations*[EB/OL]. [2019-04-03].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politics/ny-biden-promises-mindful-personal-space-misconduct-20190403-4wepd32j3jehve27y52q2fzkem-story.html>.
- [18] Sommerfeldt, C. *Rep. Steve King Removed from all House Committees over “Abhorrent” Racist Comments, may be Formally Censured as well* [EB/OL]. [2019-01-14].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politics/ny-pol-ohio-censure-king-racist-20190114-story.html>.
- [19]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4):91-112.
- [20] Williams R. M. *Dominant American Values Adapted from American Society: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M]. New York: Knopf, 1960.
- [21] Xu, Yangye. *Research on Pragmatic Failure in Business English Based on Cultural Awareness*[G]//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areer Education (ICITCE 2015). Seoul: SHS Web of Conferences, 2015.

责任编辑:蒋勇军

基于英汉对比的汉语使成式作格性分析

——作格分析理论视角

刘辰诞 郭 米

(河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英语作格动词常常是单语素词,而汉语的作格动词则是一个动结结构,因此关于汉语动词的作格性存在争论。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作格分析理论框架内,通过英汉对比,探讨各类使成式作格性特征的强弱和语义、句法约束,发现:①(复合)动词必须兼有及物和不及物两种用法,且其间语义关系不是及物性关系而是作格关系。使成式中“及+不及(形容词)”符合这一特征,因此具有很强的作格性;②动词须具有使役性特征。使成式中“及+不及(形容词)”类具有典型使役性特征,作格性强。“不及+不及(形容词)”类使成式缺乏使役性特征,作格性很弱;③介质受事可以自由出现在句法主语位或宾语位而保持动词形式和事件逻辑意义不变。“及+不及(形容词)”类使成式多数符合这个标准,因此作格性强。“不及+不及(形容词)”不符合这个标准,因此此类使成式作格性很弱;④使成式要能够视为(复合)词,不能作为(复合)词使用的使成式不能进入作格结构。这四条标准可以用来判定其他结构是否具有作格性。

关键词:英语作格结构;汉语作格结构;作格分析法;使成式;作格性

Ergativity Analysis of Chinese Causatives Based on Chinese-English Contr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gative Analysis Theory

LIU Chendan GUO Mi

Abstract: While English ergative verbs are often mono-morphemic, those of Chinese are resultative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认知语法视角下汉英倚变句的共时和历时研究”(19YJA740033)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河南省教育厅认知语言学创新团队资助(2016-CXTD-05)。

作者简介:刘辰诞,男,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研究。

郭 米,女,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

structures. Therefore, the ergativity of Chinese verbs is always controvers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gative analysis theory proposed in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nd based on the contrast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ergative struc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gree of ergativeness in Chinese causatives and finds: ①the (compound) verb has to acquire both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feature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itive and the intransitive uses has to be that of ergativeness rather than that of transitivity. The “trans. + intrans. (adj.)” type of Chinese causatives meets this criterion and therefore has strong ergative force. ②The verb has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causation. The “trans. + intrans. (adj.)” type has strong causative tendency and gains strong ergativeness while the “intrans. + intrans. (adj.)” type which lacks this feature has very weak ergativeness. ③The patient medium has to be able to occupy the positions of syntactic subject or object without changing the verb form and the logical meaning of the clause. Most cases of the “trans. + intrans. (adj.)” type meet this criterion and gain strong ergativeness while the “intrans. + intrans. (adj.)” type lacks this feature and therefore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enter 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 ④The causative verb has to be recognized as a (compound) verb or else it can not be allowed in 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 These four criteria can also be applied in identifying the ergativeness of other constructions in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English ergative structure; Chinese ergative structure; ergative analysis theory; Chinese causatives; ergativity

0. 引言

英语作格动词常常是自足的,而汉语的作格动词则是一个动结词,因此汉语动词的作格性存在争论(王文斌等,2009)。从定义上讲,同时可作及物和不及物使用的动词,其语义上的受事“O”在句法上处于主语的“S”位置时,若动词形式和句法意义不变(如在 He broke the glass → The glass broke 这一对句式,“破”的都是“杯子”),那么这两个句式在语义和句法上表现出的关系就称之为“作格关系”,其结构为作格结构,其中的动词是作格动词(王文斌等,2009:193)。英、汉语作格动词有着明显的共性:其及物句式都是“NP1+V+NP2”,为二价配置,而在不及物句式中表现为“NP2+V”,为一价配置。近些年,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双动词形式才是典型的汉语作格动词形式,谓语动词+补语小句结构即动结式类的结构才是汉语中典型的作格结构(沈阳等,2012:306)。王文斌(2009:194)发现,英语的作格动词也不乏双语素词,如 enlarge 等,只是它们的配置表现为“A+V”,而汉语谓语动词+补语小句结构往往是“V+A”配置。

汉语“使成式”由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1944,2014)中提出,包括补语结果结构如“擦干”和“施事—施事”结果结构如“叫他走开”等(Shou-hsinTeng,1991:28),后来他和其他学者又多次论及。按祝敏彻(1963:57)的说法,以往的研究将一些连动结构、并列结构也都当作了使成式。祝敏彻(1963:68-70)还认为,现代汉语的使成式是

复合词而不是词组。既然汉语使成式的动词常常是“复合词”,又呈现结果构型,那么在对汉语作格结构进行研究时就不能绕过使成式,但迄今未见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基于英汉对比,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作格分析理论为框架,对使成式中蕴含的作格性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各类使成式作格性的强弱和语义、句法结构约束。

1. 作格分析理论

在有格标记的语言中,有一些是不及物动词句和及物动词句中的主语标记为同样的格,宾语标记为不同的格,这类语言称为“主格/宾格语言”。在另一些语言中,不及物句的主语和及物句的宾语标记为相同的格,即通格(absolute),及物句的主语则被特殊标记为作格(ergative)(Langacker, 2008:376)。这类语言称为“作格/通格语言”。因此“作格”指小句中表示施事(agent)或动作的外在原因成分所具有的形式(胡壮麟等, 2005:92),也常被用来指非作格语言中类似作格语言句法结构的句法形式(刘辰诞, 2007:10)。

系统功能语法的及物性分析对及物/不及物进行区分,行动者参与的过程如果延伸到该行动者之外,就是及物的,反之是不及物的,其中的变量是延伸(Halliday, 2000:162)。韩礼德(Halliday)(2004:281)认为,还可从过程是内部引起还是由外部引起入手分析小句结构,其中的变量不再是延伸,而是因果,即过程的起源或致使者(initiator)。这样的分析方法称为作格分析,例如 The tourist woke the lion/The lion woke 这对句子,在及物性分析中,前句“woke”分析为“the tourist”发出的动作,“延伸”到“the lion”,后句分析为“the lion”发出的动作,没有延伸到其他实体。但实际上,动作“woke”无论在哪个句子里,都是“the lion”发出的,前句主语“the tourist”只是“woke”行为的起因。参与者的语法行为变了,而句子的逻辑真值并没有改变。词典中不少动词同时标注为 V_t(及物)和 V_i(不及物),如动词 play、break 等。对于 play,根据及物性进行分析,无论在及物还是不及物小句中,行动者总是过程的施事。但对于 break 之类的动词就不同,用作及物动词时“行动者”是施事,而用作不及物动词时,“行动者”并非施事而是受事,如果沿用传统的及物分析方法就不合适,因为两小句的关系不是及物/不及物关系,而是作格/非作格关系(Halliday, 2000:163-165)。根据作格分析法,每个过程都有一个关键参与者,与过程紧密相关,没有它过程就不可能实现,这个参与者称为介质(medium)。核心(nucleus)可以独立实现(如 Mary woke),也可以根据语境需要变为更复杂的小句(如 I woke Mary)。如果某一动词的及物式和不及物式呈现作格性关系而不是及物性关系,“实效过程”(既有施事又有受事的及物式过程)可以只以“核心”形式(只有受事没有施事的形式)实现,那么要求在要求小句必须有主语的语言(如英语)中,逻辑受事(介质)就必须出现在主语位上,并且不发生句法形态变化,即不借助被动态形式。例如:

(1)a. The tourist **hunted the lion.**

b. The tourist hunted.

两个句子的语义中都包含“游客狩猎”这一意义。a 句中的“hunt”这一动作延伸到了另外一个实体“the lion”上,是及物动词,而 b 句中的“hunt”在句中表示的动作就停留在这个状态,没有延伸到其他实体上,是不及物动词。处于两句主语位上的“the tourist”都是施事,这时两小句的关系是及物性关系。但(2)中的动词则不合作及物性分析:

(2) a. Tom **broke the vase.**

b. **The vase broke.**

“the vase”在这两个小句中都是“broke”的受事,区别在于:a 句中存在显性的施事者或致使者“Tom”;在 b 句中,则只表征花瓶碎了,并没有交代施事者。但是,这两个小句在语义上表示的都是“the vase”碎了,“the vase”始终是受事,在句法上却是一个做宾语,一个做主语。“the vase”无论是做主语还是做宾语,都是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必不可少的受事参与者——介质。缺少这一参与者,这个过程将不会发生。这样的语对中,两动词之间的关系是作格关系。作格分析法考察的是过程的致因性在句子中的表征方式(Thompson, 2000: 114),这与现代汉语作格研究中公认的作格结构具有[CAUSE]系统或者说具有使役性特征(王文斌等, 2009: 195; 沈阳等, 2012: 320)的分析不谋而合。基本的介质-过程小句可以开放到致使者(Nordquist, 2019),是作格性分析的主要对象。

在通格语言中,不及物动词主语和及物动词宾语标注为通格,而及物动词主语标注为作格,所以没有显性施事存在的句子称为非作格小句(李宗阳, 2016: 57)。这种称谓与我们通常将其称为作格结构虽有所违拗,但实质是相同的,前者根据小句参与者成分的赋格情况命名,后者根据动词及物和不及物形式间所呈现的关系命名,为把呈现作格关系的动词称为作格动词提供便利。

2. 使成式

王力(1944)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提出“使成式”这一概念,定义为:凡叙述词和它的末品补语成为因果关系者,叫作使成式。后来王力(1980: 403)又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再次对使成式做出定义: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伪语中表示出来。上古汉语就有致动用法,但致动动词是一个词,使成式共用两个词(王力, 1980: 405),如“乃激怒張儀(《蘇秦列傳》)”“擾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左傳》成功十三年)”中的“激怒”“扰乱”“倾覆”并非使成式,而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单音节动词。南北朝以后,使成式普遍起来(王力, 1980: 405)。到了近代,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意义出现了新的发展,即施事者的行为结果不是使别的事物有某种情况,而是使自己有某种情况,如“把这样的事看惯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直到近代使用仍不太多,五四以后汉语受到西语的影响,这种结构才多了起来(王力,1980:408)。

使成式的重点在于表示:在叙述某一行为的时候,将结果同时说了出来(王力,2014:80),这个“结果”的因就是“叙述词”。叙述词为主要动词;“结果”词为末品补语。“饿死”一词中,“饿”和“死”合为一体才有完整的意义(王力,2015:85)。

在使成式结构中,主要动词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末品补语的形式以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为主:

1) 形容词做末品补语:表示某一行为所使成的状况,相当于英语中由形容词派生的及物动词,如 ripen、enlist、intensify 等。

(3) 他**打碎**了花瓶。

(4) 你们把极小的事情倒**做大**了。

其中“打碎”“做大”中,“打”和“做”为动作行为,同时也是“碎”和“大”等结果的“因”,表示的是使受事“花瓶”成为“碎”的状态,以及使事情变“大”。

2) 动词做末品补语:表示某一行为所使成的情形,相当于英语中一个普通的及物动词。若主要动词是及物动词,则“及+不及=及”,如:

(5) 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 (《红楼梦》第三十回)

若主要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则“不及+不及=不及”,表示主事所遭受的,如:

(6) 你们也别**闷死**在这屋里。

(7) 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

3) 末品补语是“进、出、上、下、来、去、起、过”等表趋向的字词,如:

(8) 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

4) 三合使成式,如:

(9) 叫我**带进**芸二爷来。

(10) 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

(11) **挂起**帘子来。

在后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使成式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和定义,例如 Shou-hsinTeng(廖秋忠译,1991:29-30)对使成动词做了定义:使成动词指能套入“主语+使成动词+状态动词”这个格式里的那些动词。这样就把使成动词与结果补语做了区分,例如:

(12) 他把衣服**洗干净**了。

(13) 他把地址**写错**了。

其中的“洗干净”和“写错”只是补语结构而不是使成式,因为我们不能说成:

(12') * 他**洗衣服**干净了。

(13') * 他**写地址**错了。

另外,“叫他走开”“让他满意”之类的兼语结构不是使成结构。认为兼语结构不

是使成式虽有道理,但“洗干净”“写错”是不是使成结构似乎有待商榷,这两个词所在句式能够进入“把”字句转换,足可证明其使役义,具有使成特征。

祝敏彻(1963:57)也认为被王力定义为使成结构的一些句式并非使成结构,例如:

(14) 我推倒了油瓶 = 我使(推)油瓶倒了

(15) 黛玉赶到门前 ≠ 使(赶)黛玉到门前

祝敏彻(1963:58)认为:“凡把行为及其施及于对象而使对象所产生的结果在一个动补式的复合动词(古汉语是词组)中表示出来者,叫作使成式。”“推”是外动词,所以“推倒”是使成式,“爬”是内动词,所以“爬上去”不是使成式。“使成”正是“推倒”“弄坏”这一类语言形式的抽象语法意义。“爬上去”不是使成式我们赞成,这可以从这一结构不能进入“把”字句等标准验证,但王力所说的“内动词”似乎不光是语义定义,而且有形式内涵,即补语动词处于结果位,不然王先生不会把“爬上去”归为使成式。

使成式和动结式既有类似之处,也有区别:

使成式[+致使,+达成]

动结式[±致使,+达成]

“红旗升得很高”是使成式不是动结式,因为动结式主动词与结果动词之间不能插入“得”之类的补语标记词。而“花落完了”“叶子掉光了”是动结式但不是使成式,因为它们不能表达“落致使完”“掉致使光”这样的致使义,或者说“落”和“掉”不具有使役义。我们给使成式的约束条件之一是:使成式中的“使+成”应该是一个复合词,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我们不视为使成式。祝敏彻(1963:69)也曾探讨“现代汉语使成式是复合词还是词组”这个问题,详细论证了使成式是复合词而不是词组。我们给使成式的第二个约束条件是,外动词必须具有使役义,不然不能进入使成式,也谈不上作格性,因为作格关系是围绕因果(cause-effect)变量展开分析的,不具有使役义的句式或者小句动词不能当及物动词使用的,无法进入作格性分析。王力先生认为是使成式的“睡迷了”,就不符合这一约束条件。

3. 使成式与英语作格动词的形式对比及其作格性

韩礼德(2000:163)只提到在词典中同时标有“及物/不及物”标签的部分英语词汇不适合做及物性分析而适合做作格性分析,并未给出更具体的动词形式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格动词必须是“词”,具备兼类特征,即同时可以做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丁苑(2013:14)提出两条检验作格动词的标准之一就是要具备兼类动词特征。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下称《辞典》)英语中的“chase”一词只有在表示“跟随”和“试图得到某物”意义时才同时有及物/不及物标注。

(16) The dogs saw him running and **chased him**.

(17) **A gang of boys chased after her**, calling her names.

在(16)中,“chase”后接宾语“him”,是做“追”这一动作的承受者,即“chase”是及物动词。在(17)中“chase”在意义上虽然表示“一帮男孩追她”,但在句法上有介词“after”引导,并非直接延伸到“her”这一实体,是不及物动词。“Chase”虽然兼类但并不是作格动词,因为在作格动词中,不及物式主语在语义上仍是动词的逻辑宾语,而(17)的不及物用法中,“her”是不能做主语的,两小句不呈现作格关系,而是及物性关系。因此,“chase”一类的兼类动词不是作格动词。

再看“open”一词,《辞典》中列出来的标有及物/不及物的词项较多,我们选择两个常用义项,即表示“开,打开(主要指门、窗等)”和“睁开(眼睛)”两个义项进行分析。

(18) Jack **opened the window**.

(19) She heard **a door open** and then close.

(20) Barry was awake long before he **opened his eyes**.

(21) Carrie smelled coffee and **her eyes opened** reluctantly.

在例(18)和(19)中,不论是“open the window”还是“a door open”,都表示“门或窗打开了”。名词词组“the window”和“a door”在语义上都是“open”的受事,但是句法位置不同,区别是(18)中有施事 Jack,而(19)没有交代是什么致使门打开,(18)和(19)是作格关系,其中的“open”是作格动词。根据同样的分析,(20)和(21)两句也呈现作格关系,“open”同样是作格动词。作格动词具有兼类这一特征,但兼类动词并非都是作格动词,这是作格分析法的核心。

使成式补语形式有多种类型,主要动词可以是及物动词,其中一些兼有不及物特征,使成式是否具有作格性,首先需要判断其是否具有兼类特征。例如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下称《词典》),“说”字义项中包括不及物用法,表示“解释”义,如“一说就明白”;也有及物用法,如“说了个笑话”,表示“用话来表达义”。“说”进入使成式“说服”后,就具有作格性潜势。如:

(22) 这几句话**说服**不了人。

(23) 一个人也**说服**不了。

名词“人”在两句中句法位置不同,但是逻辑意义却是相同的,都是“说服”的受事,两个句子结构呈作格关系。“说服”又呈现复合词特征,因此“说服”为合格的作格动词。

《词典》中对于动词“吹”的释义包括:合拢嘴唇用力出气(吹一口气);(风、气流等)流动、冲击(风吹雨打)。其中有及物用法,也有不及物动词用法。“吹”进入使成式“吹倒”后,也具有作格性。比如:

(24) 风吹倒了**大树**。

(25) **大树**吹倒了。

“大树”在两句中的语法位置不同,但都是动作的逻辑受事,“吹倒”具有复合动词的特征,(24)和(25)是作格关系。

无论是在英语还是汉语中,作格动词都必须具有兼类特征。当使成式中动词为“及+及”“及+不及”“及+形容词”,而“外动词”又能够兼做及物和不及物动词使用时,使成式是较为典型的作格结构,作格性最强。但有时候使成式动词的外动词虽然可以兼用作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却没有相应的作格句式,例如“(风)吹倒了林姑娘”似乎没有相应的“??林姑娘吹倒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时“吹倒”就不能够视为作格动词。原因是,作格分析法要求小句核心(clausal nucleus)中的受事介质可以不求助被动式直接出现在主语位上,而“(风)吹倒了林姑娘”似乎不能说成“??林姑娘吹倒了”。但在有些环境下,“吹倒”可以形成作格关系,如例(24)和(25)。“吹倒”这一类使成式的作格性对环境有一定的选择,作格性就弱一些。有些“不及+不及(形容词)”类结构也被王力先生视为使成式,像“睡迷了”“跑累了”等。因为此类主要动词不兼类,不含[CAUSE]力,所以不具有作格性,不是作格结构。另外,韩礼德(2000; 2004)没有把动词词组和短语动词归入到作格结构中,据此,使成式中难以判定为“词”的,不具备作格性,如三合使成式。

4. 使成式与英语作格动词的使役语义对比及其作格性

长期以来作格性研究认为作格句式涉及主、宾语系统性倒置问题(Deal, 2016: 169)。作格关系被界定为一种“引起或被引起”的特殊语义关系(Halliday, 2000; Thompson & Ramos, 1994; 刘明, 2016: 67),因此英汉作格动词都可以进行使役转换(周利萍, 2017: 133)。所以,检验作格动词不仅要看兼类动词特征(丁苑, 2013: 14),还要看句式是否能进行使役转换(王文斌等, 2009: 194)。在作格分析法中,作格语对中的语义关系可以用“*x* is involved in something, brought about by *a*”来解释,包括“*a* makes *x* do something”和“*a* does something to *x*”两种形式(Halliday, 2000: 171),其中“*a*”是过程的源头(刘辰诞, 2018: 10),称为致使者。例如“The policeman exploded the bomb”,是“the policeman”致使“the bomb”“exploded”。因此,是否具有使役义是验证是否具有作格性的关键因素。我们首先来分析作格语对中所包含的使役性意义。

(26)a. The handful of people **enlarged the company.**

b. **The company enlarged.**

(27)a. John **killed Mary.**

b. Mary **died.**

(28)a. Pat **cooked the rice.**

b. **The rice cooked.**

这三组语对中包含了三种类型的动词,(26)中的动词是由形容词加词缀转化而来的作格动词,所表达的意义相当于使成式结构中形容词做末品补语的情况,也从一

个角度说明英语也存在类似于使成式的双(多)语素作格动词。(27)是Thompson & Ramos (1994)对作格动词分类中的匹配作格语对(matched ergative pairs)中的一个例子。英语的作格动词分为匹配和非匹配两类(Dong & Yang, 2018: 20),作格语对是指用于作格/非作格小句的动词不是同一个动词,二者可以通过“致使”概念联系起来,如“kill/die”“keep/stay”“make/become”等。(28)则是Thompson & Ramos (1994)对作格动词分类中的同源作格语对中的一个语对。同源作格语对是指同一个动词的及物形式和不及物形式的主语是同一个参与者,动词形式不变,逻辑语义也不变,如“cook、break、sail”等,这类动词是典型的作格动词。

首先来看(26)中的作格语对,a句的意思可以表示为“*a* (the handful of people) makes *x* (the company) become larger”或者“*a* (the handful of people) has done something to *x* (the company), and *x* becomes larger”。在这两种解释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使役关系,是“那些人”使“公司”变大的。但是在b句中,只能看到“the company is involved in becoming larger”,隐去了具体使役因素,从而强调结果状态义。在(27)的作格语对中,a句可以解释为“*a* (John) makes *x* (Mary) die”或者“*a* (John) does the action ‘kill’ to *x* (Mary), and *x* died”,我们可以看到结果状态“Mary 死去”,是施事者“John”所导致,其使役关系清晰明了。在b句中,用“die”来表示“kill”的结果,同样在强调介质“Mary”受到“John”动作影响所处的状态,隐含了使役义。(28)a句同样是“*x* (the rice) is involved in cooking, brought about by *a* (Pat)”,表示的是“Pat”使“the rice”变熟了。b句只包含介质“the rice”在经受过程“cook”之后的状态。在这三组语对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作格结构中的使役关系。

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杨国文,2014:412),一个句子能否转换为“把”字句(NP1+把+NP2+V),是判断使役义的方法之一(丁苑,2013:19)。

(29)花瓶打破了→他把花瓶打破了

(30)老虎打死了→武松把老虎打死了

没有使役义就不能形成作格关系,因为作格分析法是一种涉及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像“花落完了”“叶子掉光了”不能转换成“把”字句,没有使役义,因而不是作格结构。

但有了使役义也不一定就是作格结构,因为除了使役义外,韩礼德(2000)的作格分析理论要求,进入作格关系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可以自由占据及物宾语和不及物主语的句法位置,动词形式不发生变化。“不及+不及(形容词)”类使成式,比如“睡迷”等,虽然能够进入“把”字句转换(“一觉把他睡迷了”),但是由于“他”并不是“睡”的受事,不能进入句法宾语位置,不能满足倒置条件,因此并非作格动词,它所出现的小句也不是作格结构。这跟上节分析的不可兼类的动词不能进入作格关系是一致的。但同类的“闷死”既能够进入“把”字句转换,又可以进行语法主、宾语位转换,如“他闷不死”→“闷不死他”,是作格动词。这也对王先生“不及+不及=不及”的看

法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是可以从句法环境获得及物动词属性从而可以兼类的。但正如王力先生所说,“不及+不及”一般是不及物动词,所以难以获得使役义,因此作格性比较弱。另外,像一些三合动词“买进来”“推出去”等也很难具有作格性。一是因为我们虽能说“把它们买进来”“把他们推出去”,也能说“买它们进来”“推他们出去”,但不能说“它们买进来”“他们推出去”,甚至也不能说“买进来它们”“推出去他们”;二是因为它们的复合词身份存疑。

5. 结语

根据我们的分析,使成式是否可进入作格结构有四个判断标准:第一是其中动词必须可以兼类。“及+不及”类使成式如“打破”“洗净”等,符合这个要求,因此具有很强的作格性。而“不及+不及”类的外动词是不及物的,一般不具备兼类特征,因此作格性弱。第二个标准是使役性。在作格分析法中,变量是 causation,因此使役性标准至关重要。“及+不及”类使成式具有典型使役性特征,作格性强。而“不及+不及”类使成式缺乏使役性特征,作格性很弱。第三个标准涉及句法:作格结构中的“介质”必须是受事,根据语篇要求可以自由出现在句法主语位或宾语位,而动词形式和事件意义保持不变。“及+不及”类使成式多数符合这一标准,因此作格性强。“不及+不及”使成式一般是不及物的,参与者不是受事,句法上无法进行主、宾语转换,因此作格性很弱。第四个标准是使成式得能够看作(复合)词,基于与英语的比较,作格分析法涉及的英语作格动词都是词而不是词组或短语,能作为(复合)词使用的使成式才能进入作格结构。

参考文献

- [1] Burzio, L. Italian Syntax: A Government-Binding Approach [M]. Dordrecht: Reidel, 1986.
- [2] Deal, A. Syntactic Ergativity: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J]. 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2016(2):165-185.
- [3] Dong, D. & M-L Yang. The Application of Ergative Verbs to Avoid Accus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Editorials into English [J]. Lingua Posnaniensis, 2018(1):17-32.
- [4] Halliday M. A. K. Revised by C. Matthiessen.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London: Arnold, 2004.
- [5]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6] Langacker, R. Cognitive Grammar——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 Nordquist, R. Ergative Verbs and Processes [EB/OL]. [2019-02-19]. <https://www.thoughtco.com/ergative-grammar-term-1690608>.
- [8] Thompson, G. & R. G. Ramos. Ergativity in the Analysis of Business Texts [G] // DIRECT Working Papers. Sao Paulo: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1994.

- [9]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0] 邓守信. 汉语使成式的语义[J]. 廖秋忠, 译. 国外语言学, 1991(3):29-35.
- [11] 丁苑. 现代汉语作格动词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3.
- [12]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李宗阳. 作格交替语言类型使役性溯源[J]. 外语学刊, 2016(2):56-59.
- [14] 刘辰诞. 汉语可逆句的作格分析视角[J]. 外语教学, 2018(1):8-13.
- [15] 刘辰诞. 心理模型与语言表达式的生成——兼论作格结构和中动结构的形成动因[J]. 外语研究, 2007(3):7-12.
- [16] 刘明. 及物分析、作格分析及其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J]. 外国语, 2016(5):66-74.
- [17] 沈阳, R. 西贝斯马. 作格动词的性质和作格结构的构造[J]. 世界汉语教学, 2012(3):306-321.
- [18]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9]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20] 王力. 汉语史稿(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1]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4.
- [22] 王文斌, 罗思明, 刘晓林, 等. 英汉作格动词语义、句法及其界面比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3):193-201.
- [23] 杨国文. “把”字式和“被”字式成分语义角色的系统功能语法作格解释[J]. 当代语言学, 2014(4):410-421.
- [24] 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5版)[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2018.
- [25] 曾立英. 作格研究述评[J]. 现代外语, 2007(4):424-437.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7] 周利萍. 英汉作格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J]. 湖北大学学报, 2017(3):129-135.
- [28] 祝敏彻.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J]. 兰州大学学报, 1963(2):57-70.

责任编辑: 冯 革

概念隐喻理论能解释所有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吗？ ——论隐喻类型甄别的维度

孙 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当前隐喻理论依据某种类型的隐喻得出泛化结论的不足,本文析出了隐喻类别的八个维度:集体/个体性、映射方向性、系统性、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命题性/意象性意义、蓄意性、感受性以及语境依赖性。研究发现,以上述维度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作为衡量标准,概念隐喻理论只能解释一部分类型的隐喻,但在解释隐喻类型的全貌方面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研究指明这些维度,期望能够帮助隐喻研究者更好、更全面地区分隐喻语料,进而有针对性地框定隐喻理论的解释范围。

关键词:概念隐喻;语言隐喻;隐喻类型甄别;区分维度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apable of Explaining All “Metaphors We Live by”?: On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etaphor Types

SUN Yi

Abstract: One possible weakness of most existing metaphor theories is that they are imprecise about the properties of metaphoric utterances and, as a result, overgeneralize from evidence of subsets of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18ZDA290)和广东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汉语隐喻的形式表征与认知计算研究”(2019WZDXM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毅,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主要从事当代隐喻学与翻译学研究。

metaphoric utterances to theories about metaphor as a whole. The present paper aims at proposing eight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kinds of metaphorically used utterances, i. e. collective/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 the direction of metaphorical mapping, systematicity,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opic and the vehicle, propositional/image meaning, deliberateness, qualia as well as context-dependency. It finds that, only measured by one or some of these distinctive feature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can only explain a subset of metaphors and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line need to incorporate more typ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oposed distinctive featur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se features will help metaphor researcher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metaphors and thus avoid the “overgeneralization” problem.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metaphorical utterance; metaphor type identification; distinction dimension

0. 问题的缘由

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引发了隐喻研究的一场认知革命。CMT认为隐喻的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一类事物(Lakoff & Johnson,1980:5),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思考和行动所依靠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1980:4)。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曾肯定日常会话中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有关科学统计数字也显示,人们每分钟使用5.16个隐喻,其中1.8个具有创造性,4.08个属于定型化;普通语言有70%来自隐喻或隐喻概念。英国科学哲学家玛丽·海西(Mary Hesse)甚至提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的论断。最新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话语分析学家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对语篇中出现的隐喻词做系统统计后发现,只有14%的词在具体的语境中表达隐喻义(Steen et al.,2010:43-63)。这对CMT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人们使用的话语只有14%是隐喻,那么隐喻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吗?

同样,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出现了分歧。CMT指出,我们在理解语言隐喻或者其他多模态隐喻时,依靠的是激活头脑中存储的以隐喻方式表征的概念系统。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也有一些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CMT的观点相左。例如,麦格龙(McGlone)(1996)通过一系列心理语言学离线实验对概念隐喻的假设进行了研究检验,实验证明母语使用者在加工语言时并没有启用概念隐喻所提出的概念知识映射。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很多隐喻表达式并不是基于具身概念隐喻,因此需要诉诸CMT以外的理论。”(Gibbs,2009:22)我们不禁要问,CMT能实现其解释无处不在的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宏伟目标吗?

实际上,最新研究表明,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的根源在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类别的语言隐喻作为语料(Dunn,2015)。坦达尔(Tendahl)(2009:139)指出:“不同的理论视角在框定某种类型隐喻的同时也忽略其他类型,即他们只探讨某种特殊类型的隐喻,然后认为自己的理论能解释所有隐喻。”“持不同理论框架的隐喻学者各自划定不同的隐喻语言作为分析对象,这或许是隐喻跨学科研究的最大弊端。”(Gibbs,2009:18)

“现有的大多数隐喻理论对隐喻话语的特征语焉不详,因此才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Dunn,2015:18)缺乏明确的标准是CMT成为综合的隐喻理论之前面临的最大的绊脚石(Gibbs,2009:19-20)。本文基于前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尝试探讨隐喻语料甄别的八个关键维度,以期将来CMT在框定自己的解释对象时有一定的依据和标准。同时也期望能给CMT以外的隐喻理论提供参考,以便清晰认识到所提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避免用在有限的语料下得出的结论来“以偏概全”地解释所有的隐喻。

1. 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

从CMT对隐喻的界定可以看出,隐喻具有双重指称,即隐喻₁代表的是一种概念表征方式,它存在于某一语言文化社团成员集体的头脑中,是该语言文化集体认知的沉淀和表征;隐喻₂指的是语言层面的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口头或书面语中的各种隐喻,包括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换言之,隐喻₁是概念隐喻,隐喻₂是语言隐喻(或称隐喻表达)。隐喻₁和隐喻₂的区分对隐喻研究至关重要,两种隐喻之间的关系见下例:

(1) Look how far we've come. It's been a long bumpy road. We can't turn back now. We're at a crossroads. 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

(Lakoff,1993:206)

例(1)中的表达呈现系统性,人们用这些描述旅行的词汇谈论爱情问题,言为心声,这些语言表达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人们是用旅行来理解和认知爱情的。他们用“LOVE IS A JOURNEY”来表示人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莱考夫等人运用归纳的方法,通过对人类自然语言中大量的呈系统性的表达进行概括,得出了几百个类似的概念隐喻。值得注意的是,“LOVE IS A JOURNEY”仅仅是一个公式,它并不对应自然语言的表达式^①。在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的关系上,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人们在理解语言隐喻时依靠激活头脑中存储的概念隐喻。也就是说概念隐喻是理解语言隐喻的基础。

2. 隐喻类别的区分维度

为了让将来的隐喻理论研究更有针对性,下面分八个维度专门探讨隐喻类型的区分标准。

2.1 集体性与个体性

类似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概念隐喻属于集体的抽象概念表征,而隐喻表达则属于概念的具体运用,即“概念隐喻存在于超个体层面”(Köveses, 2015:10),它以一种脱离语境的方式存在于语言社区集体所有成员的概念系统(长时记忆)中,而具体的隐喻表达则位于“个体层面”,是个体在具体语境下将概念隐喻实现的过程。

由于莱考夫选用概念隐喻公式(“LOVE IS A JOURNEY”)与自然语言的“A is B”这种经典隐喻例子语形上相似,为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的混淆埋下了伏笔。

大多数的 CMT 聚焦于规约化的隐喻表达(如“He attacked my argument.”“Their relationship got off to a rough start.”),认为这些规约隐喻的理解需要启用概念隐喻(即 ARGUMENT IS WAR, LOVE RELATIONSHIP IS A JOURNEY)。尽管莱考夫和特纳承认某些一次性隐喻表达式的存在,但“CMT 并没有充分的重视经典的‘A is B’表达式(‘man is wolf’‘surgeons are butchers’)”(Gibbs, 2009:18)。大多数证明 CMT 的心理语言学研究都没有涵盖“A is B”型隐喻^②。邓恩(Dunn)(2015)通过对关联理论、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文献做元分析(meta-analysis)后发现,三个理论所分析的隐喻例子并不交叉,例如:

- (2)a. Robert is a computer.
- b. Susan is a wild rose.
- (3)a. Juliet is the sun.
- b. Sally is a block of ice. (Searle, 2010)
- (4)a. Bill’s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 (LOVE IS A JOURNEY)
- b. He destroyed my defenses. (ARGUMENTS ARE FIGHTS)

上面的(2)~(4)分别对应的是从关联理论、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文献中析取的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如何对“A is B”形式的隐喻进行充分解释构成了 CMT 的短板,因为这部分隐喻涉及涌现特征(emergent property),是检验一种理论解释力的最佳试金石。

2.2 隐喻映射的方向性

隐喻理论的发轫者莱考夫(Lakoff, 1993)指出:“隐喻是我们用来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隐喻让我们用更具体的、有高度组织结构的事物来理解

相对抽象的或相对无内部结构的事物”。“抽象概念总是需要借助更为具体且具有更为清晰的概念来进行隐喻性的界定。”(Searle, 2010:5)总之, CMT 认为隐喻映射的方向是由具体到抽象, 即隐喻的源域更贴近人们的生活, 为人们所熟悉。但在 LIGHT IS LINE 这个概念隐喻中, 线条(line)并不比太阳光(light)更具体。

莱考夫(1993)概括出的概念隐喻是“PEOPLE ARE PLANTS”, 而非“PLANTS ARE PEOPLE”, 但植物并不一定比人更具体。再如,

(5) His face was a fist of fury and pain.

(6) A man's heart was a deep pocket he might turn out and be amazed at what he found there.

例(5)中的隐喻用身体的一个部分来描述另一部分, 例(6)用衣服的口袋描述心脏。这些隐喻是人类的类推能力和想象力的产物, 而并非取决于预先存在的概念隐喻。

有些隐喻的方向更是跟 CMT 的定义相反。以“ARGUMENT IS WAR”, 在文明社会成长起来的儿童对战争并不熟悉, 倒是经常会听到别人争吵, 儿童在习得了“defend”“attack”等词的规约义以后, 他们在理解“defend/attack/win/lose an argument”的时候可能会直接激活存储在百科知识中的心理词汇, 而无需借助概念隐喻。因此, 即便是 CMT 最经典的例子, 其解释力也受到质疑。

2.3 隐喻的系统性

概念隐喻在语言上表现为呈系统性的隐喻表达, 如例(1)。除了系统性的隐喻外, 莱考夫和约翰逊也认识到了非系统性隐喻的存在。

除了这些系统隐喻以外, 也有个别的隐喻表达单个出现, 在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中没有和其他隐喻联合成为系统。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表达式如“山脚”“白菜头”和“桌子腿”等。这些表达式是落单的隐喻概念, 他们只有一个(或两三个)部分被作为源域投射到靶域, 例如“山脚”是“A MOUNTAIN IS A PERSON”在语言上的唯一表现, 我们通常不说“the head, shoulders, or trunk of a mountain”, 尽管有时候可以根据未投射的部分创造此类的新奇隐喻。例如登山队员可以说“the shoulder of the mountain”……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只有一个常规语言表达式作为例证的概念隐喻在我们的文化和语言中处于边缘位置, 它们不能和其他隐喻概念呈系统关联, 这使得该类隐喻不符合我们的研究旨趣……像“山脚”这类隐喻是个别的、非系统的和孤立的。它们与其他隐喻无系统关联, 在我们的概念系统里作用不大, 因此不属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因此一定要区分孤立的非系统隐喻和呈系统性的隐喻表达。

(Lakoff & Johnson, 1980:18)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多少个隐喻表达互联才算是构成系统性,才是概念隐喻的涵盖范围?莱考夫和约翰逊似乎没有明确的解答。汉语中有“山头”“山脚”“山腰”“山脊”“山口”“山腹”,这能否够构成“A MOUNTAIN IS A PERSON”呢?可见,单个的不呈系统性的隐喻从最初就被驱逐出了CMT的研究领地。

2.4 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

对于隐喻是否基于相似性,学界一直存在争鸣。陈望道(2005:72)指出相似性是比喻的三要素之一。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也指出“恰似点”是比喻内容核心。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为代表的西方修辞学家也认为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亚里士多德(2002:81)指出:“善于使用隐喻表示有天才,因为要想出一个好的隐喻字,须能看出事物的相似之点。”

以理查兹(Richards)(1965)为代表的学者把相似性的作用排斥在隐喻工作机制的解释之外,他们认为隐喻的效果主要不是在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它们之间各种特征的相互作用。莱考夫和约翰逊与该派研究者站到了一起,他们(1999:126-127)列举了四条理由来反对“相似性是隐喻的机理”:①时间先后问题:相似性不是预先存在的;②非充分必要条件:即便源域和靶域有共同之处,但是也不能保证隐喻一定会表达这些共同点;③相似性是一个不对称性的概念;④同一个靶域的各个源域可以是不对称的。基于以上四条理由,他们认为:“相似性假说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CMT自从创立之初,其宗旨就是打造体验哲学的大厦,因此他们关注的是在人类经验中共现的隐喻(correlation-based metaphors)或曰初始隐喻(primary metaphors)。如果说像MORE IS UP这样的初始隐喻是基于经验共现的话,那么语言隐喻表现得则更为复杂。

首先,共现隐喻也会创造相似性。伊纳卡(Inurkha)(1992:40)说,客观而言,任何两个物体都有某种相似性;因此,创造相似性指的是认知主体在自己的意识思维中创造相似性。其次,在人们经验中没有共现过的相似语言隐喻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下面取自《围城》的例子:

(7)她(唐小姐)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温柔灵活,反衬得许多女人的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

(8)张先生早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杂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文中难达的心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作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正是因为“政治家的大话”和“女人的眼睛”“英文”与“肉屑”在一般人的经验中很少共现,所以作者钱锺书先生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创新出来的相似性使得读者对认

知对象有了生动形象的认识。在例(8)中,“英文”和“肉屑”的隐喻是在“英文”和“金牙”隐喻之后生成的,第一次隐喻创造之后,其喻体概念的相关概念同时投射到对象的认知上面,形成二次创造,认识也随之加深,由“装饰尚有用”进而创造出“装饰且无用”。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不依靠经验共现而具备相似性的语言隐喻也对 CMT 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

2.5 命题隐喻与意象隐喻

隐喻概念能超越思维和语言的普通字面方式的范围,延伸到被称为比喻性的、诗意的、多彩的、新奇思想和语言的范畴(薛梅,2019:25)。文学作品或诗歌中的新奇隐喻只不过是规约的概念隐喻的延伸、细化或重新组合。但是有一种新奇隐喻对 CMT 构成了挑战,即意象隐喻(image metaphor)。莱考夫(1987:291-221)列举了意象隐喻不同于概念隐喻的六个特征:①一次性隐喻,不会被重复使用,也不会被规约化;②不用于日常推理;③不与语言中的词语或习语呈系统性关联;④它们映射的是意象结构而不是命题结构;⑤不作为源域被用来理解抽象靶域;⑥不是人类经验的基础或常识,也不能决定隐喻映射。例如:

(9) My wife whose hair is a brush fire
 Whose thoughts are summer lightning
 Whose waist is an hourglass
 Whose waist is the waist of an otter caught in the teeth of a tiger
 (Free Union, Andre Breton)

这首诗充满了意象隐喻,例如在诗的第三行,妻子的腰身因形状与沙漏相似,于是诗人将二者做了类比。同样,最后一行又把妻子的腰身比作被老虎牙齿咬住的水獭。到底多少意象细节可以映射到靶域,取决于读者的想象力:如被虎牙咬住的身体形状和妻子的身形之间的类似;水獭在虎牙中身躯的扭动映射到妻子的身体活动;水獭皮毛的光泽可以映射妻子汗珠的光泽,等等。正是意象的新奇性和形象性才使得诗歌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意象隐喻具有转瞬即逝性和一次性,因此对我们认知自身和外部世界并不重要(Lakoff,1987:219-221)。意象隐喻成为 CMT 的短板(Gleason,2009:438)，“意象隐喻的存在对 CMT 构成了严重的挑战”(Crisp,1996:79)。

2.6 隐喻的蓄意性

莱考夫和约翰逊(1999)把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看作是认知科学的三大定律。CMT 关注的是常规化的无意识参与的隐喻自动加工,从而忽略了需要意识加工的蓄意性隐喻(deliberate metaphors)。蓄意性隐喻指的是言者

使用隐喻“指导听者对目标对象采取‘另类’视角,旨在从新的视角下获得对目标的深刻认识”(Steen,2011:180)。蓄意性隐喻“使听者毫无选择,只能有意识地构建跨域映射”(Steen,2010:56)。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第18首为例: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ed;/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st in his shade,/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这首诗是一个扩展隐喻,包含蓄意性隐喻和非蓄意性隐喻。蓄意性隐喻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受众构建跨域映射,其蓄意性体现在使用目的就是为了隐喻而隐喻。在莎翁的这首诗中,“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隐喻意向(intentionality)。蓄意性隐喻的生成和理解要求在线加工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关注源域,进而实现跨域映射。

这种为了隐喻而隐喻的蓄意性隐喻和CMT关注的很多无意识隐喻形成鲜明对照,例如“in 2015”和“in love”这两个表达,发话者用这两个隐喻表达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受众激活空间意象图式来理解“TIME”和“EMOTION”,大量实验也证明人们无需启动空间域就可以理解上面两个表达,因为它们的隐喻义已经变成了心理词库的一部分了,可以直接激活。

隐喻的蓄意性和常规性没有必然联系,常规性的隐喻也可以有蓄意用法。如“请你不要火上浇油,要火上浇水”。发话者使用该话语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突显死隐喻内部张力的方法让其复活。

总之,涉及意识性和蓄意性的隐喻,既包括新奇隐喻也包括常规隐喻,超出了CMT的解释范围。蓄意隐喻理论为主流的概念隐喻理论开创了崭新视角,为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融合掀开了新篇章(孙毅、陈朗,2017:715)。

2.7 隐喻的感受性

在CMT对隐喻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前,隐喻多被视为一种修辞格。但“修辞性阐释过于简单化、单一化、说服力不够”(陈新仁,2008:84)。CMT在深入揭示隐喻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一味强调隐喻认知功能的同时,也忽略了隐喻的包括修辞功能在内的其他功能。CMT只关注执行认知功能的隐喻,受到了信息加工范式(information-processing paradigm)的影响。我们应该摆脱信息加工范式,在具体的语境中分析有目的性的日常交际中使用的隐喻(Cameron,1999:10-11)。比如,很多蓄意性隐喻都有明确的使用动因,以死隐喻复活为例:

(10)A: 每次聚会都让您破费,真不好意思。

B: 哈,破费? 咱的费可不破,钞票是崭新的。您客气了,友情常聚常新嘛。

(莫嘉琳、刘润清,2014:77)

说话人 B 所添加的“费不破、崭新”等反义信息激活了“破费”的本源义破败、损坏,使得死隐喻“破费”得以复活,同时传递了一种幽默诙谐、增进人际关系的功能。

此外,隐喻还能传递感受质或感受意。感受质是主体直接感受事物时的心理感受或体验(如看到老虎感到害怕和恐惧),感受意则是语言所表征的事物给主体带来的心理感受或体验(如“谈虎色变”“画梅止渴”等)。“语句中会有一些不同于句义和含意的但又可辨识的,而且可以在不同语言经验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复感受的特质,即‘感受意’”(徐盛桓、陈香兰,2010:334)。

李白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的“桃花潭水”不一定真的达到“深千尺”,这里用的是隐喻兼夸张的用法,作者故意夸大自己的感觉,从而传递一种感受意,让读者亲身感受到汪伦送我情之强烈的程度。

随附着丰富感受意的新命题比脑中没有感受质支持的旧命题更加可信,因此可以取消并替代原有的命题,这就是为什么隐喻具有较强的劝谏功能。例如,有这样一则香烟的电视广告,电视画面呈现的是碧海蓝天、青山绿水的美景,语音内容是:

(11)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让心灵去旅行……

从表面上看,该广告画面播出的美景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感受,似乎是提醒人们要享受美好感觉的过程,而忽略其结果,实际上影射的是吸香烟的感受,这可以从画面结束时某香烟的品牌名称的出现看出来。广告商试图用附载着丰富感受意的新信息[“吸烟带来美好享受过程(沿途风景)”]来淡化、抵消甚至取代人们心目中的旧信息[“吸烟有害健康(目的地)”]。

我国学者区分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陈望道,2005)。如果说 CMT 研究的隐喻类似于研究以信息传递为主要目的的消极修辞的话,那么它忽略了语言中作为积极修辞的隐喻。“要使人感受”,就“必须使读听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种种的感触”,所以“必须利用中间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陈望道,2005:70)。这就是说积极修辞要利用语言文字中一切可能的手段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表达个人的真情实感;二是激活受话人相似的经验而使受话人获得相近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吴思聪,2009:47)。

可以得出结论:CMT 对于作为积极修辞用法的隐喻关注不足。

2.8 语境依赖性

认知语言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语境问题,因此也无法解释概念系统的变化和灵活性(Kövecses,2015:49)。例如:

(12) My younger brother is a prince.

(13) Elizabeth is the sun.

(14) His feet were stones at the end of his legs.

在不同的语境下,(12)可以指“My younger brother has noble character”,也可以指“He is spoiled and demanding”;(13)可以理解为“Elizabeth is resplendent and regal”,也可指“She is full of warmth and radiantly beautiful”;(14)可以指他的脚如同“heavy weights”或“cold lifeless things”。在具体的语境下,这些隐喻可以表达比单纯的概念隐喻更加深刻和细腻的含义。

即便我们有大量现成的概念隐喻可以启用,我们也需要根据语境选择言者意欲传递的概念隐喻。因为一个源域可以投射到多个靶域上,反之亦然。这种“语境引发的隐喻”(context-induced metaphors)并非源自CMT所认为的经验共现(correlation in experience),而是依赖隐喻发生的语境,包括现场物理语境、认知主体和话题、文化语境、社会语境和语言语境(Kövecses,2015:116)。以物理语境的影响为例,一位美国记者到新奥尔良采访一名音乐家Domino,该市刚刚遭受飓风卡特里娜的袭击,正在努力灾后重建,记者写道:

(15)The 2005 hurricane capsized Domino's life, though he's loath to confess any inconvenience or misery outside of missing his social life...

(USA TODAY, 2007, September 21, Section 6B)

隐喻“The 2005 hurricane capsized Domino's life”是基于概念隐喻LIFE IS A JOURNEY,或更具体地说是LIFE IS A SEA JOURNEY。记者选择海路旅程显然是受到了海区飓风灾害的影响。“capsized”无论在源域JOURNEY还是在SEA JOURNEY中都是一种新奇的隐喻表达,可见物理语境对常规隐喻的创新拓展起到了限定和诱发的作用。

可见,语境是隐喻理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动态的隐喻也是仅凭借静态的概念隐喻表征所不能解释的。

3. 结语和展望

吉布斯(Gibbs)(1999:36)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隐喻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类

型的隐喻,将来或许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理论。语言中的隐喻是如此复杂,要真正全面揭示隐喻的理解过程需要多种理论有所专攻和通力合作。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研究者们经常提出一种理论并且试图用一条理论解释所有语言中的隐喻和隐喻在语境中的使用。吉布斯劝诫研究者们要及时承认各自理论的局限性,并且意识到他们只能解释某一特定类型的隐喻。

隐喻研究越来越呈现多学科跨领域研究的趋势,不同学科领域只有在对同类型的隐喻语言进行分析才能互相对话,检验优劣,取长补短。本文基于前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析出了隐喻语料甄别的八个纬度,不同的理论在评价自己的框架时应明确指出其所依靠的维度或标准,及时认识到自家理论解释力的局限,以避免过分扩大(overgeneralize)理论的解释范围。

CMT 将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开诚布公地承认它只能解释一部分隐喻,并按照某个维度限定好自己的研究领地。按此方向发展,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包打天下,复杂隐喻谜底的揭开需要各个理论发挥自己的专长,通力合作;第二种就是 CMT 真正成为了一种能够解释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综合理论,此时更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隐喻和各种维度。我们相信,随着认知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各种先进实验手段的更新,CMT 无论沿着哪个方向前进,都需要把握好上述各维度,从而在揭开人类语言和认知之谜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注释

- ①Lakoff 等人是用小型大写字母正是为了避免该公式与自然语言中的“A is B”格式的隐喻相混淆。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很多都确实是未能做到有效区分。当概念隐喻翻译成汉语之后,这种大写的失去更加导致了人们对概念隐喻指称的误解。
- ②例如,汉语中我们也有“爱情是旅程”这样一个概念隐喻,因为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常规表达式证明了这一认识方式的存在,比如:“坠入爱河”“分道扬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情路艰辛”“情长路更长”等。当然,我们在言谈中也会说出“爱情是旅程”这样的话语,但是这恰巧与概念隐喻表达语形上相似,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 [1]Cameron, L. Operationalising “Metaphor” for Applied Linguistic Research[G]// L. Cameron & G. Low (eds.).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Crisp, P. Imagism’s Metaphors: A Test Case[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6(2):79-92.
- [3]Dunn, J. Three Types of Metaphoric Utterances That can Synthesize Theories of Metaphor[J]. Metaphor and Symbol, 2015(1):1-23.
- [4]Gibbs, R. Why do Some People Dislik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J]. Journal of Cognitive Semiotics, 2009(1/2):14-36.
- [5]Gleason, D. The Visual Experience of Image Metaphor: Cognitive Insights into Imagist Figures[J].

- Poetics Today, 2009(3):423-470.
- [6] Indurkha, B. *Metaphor and 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 [7] Köveses, Z. *Where Metaphors Come from? Reconsidering Context in Metaph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8] Lakoff, G. *Image Metaphors*[J].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87(3):219-222.
- [9]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G]//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0]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1]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12] McGlone, M.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Food for Thought?*[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6(4):544-565.
- [13]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14] Searle, J. *On Metaphor*[G]// Y. Sun (ed.). *Selected Classic Readings for Cognitive Metapho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 [15] Steen, G. *When is Metaphor Deliberate?*[G]// N. Johannesson, C. Alm-Arvius & D. Minugh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tockholm 2008 Metaphor Festival*. Stockholm: Acta Universitatis Stockholmiensis, 2010.
- [16] Steen, G. *Deliberate Metaphor Affords Conscious Metaphorical Cognition*[J]. *Journal of Cognitive Semiotics*, 2011(1/2):179-197.
- [17] Steen, G., Dorst, A., Herrmann, B., Kaal, A., Krennmayr, T. & T. Pasma. *A Method for Linguistic Metaphor Identific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 [18] Tendahl, M. *A Hybrid Theory of Metaphor: Relevance Theor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19]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20] 陈新仁. “转喻”指称的认知语用阐释[J]. *外语学刊*, 2008(2):84-89.
- [21] 莫嘉琳, 刘润清. 死隐喻复活的语义及语用阐释[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3):75-83.
- [22] 孙毅, 陈朗. 蓄意隐喻理论的学术进路[J]. *现代外语*, 2017(5):715-724.
- [23] 吴思聪. 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小议[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9(4):46-49.
- [24] 徐盛桓, 陈香兰. 感受质与感受意[J]. *现代外语*, 2010(4):331-338.
- [25] 薛梅. 新奇隐喻的汉译英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1):25-30.
- [26]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责任编辑: 蒋勇军

语言认知的具身性与 语言文化身份的民族性

肖 燕¹ 文 旭²

(1.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331; 2.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认知理论视角讨论语言文化的具身性和语言文化身份的民族性。首先, 身体与心智的具身性决定了人类语言文化的具身性, 语言认知和语言习得都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基于使用而实现的, 某种语言的表征和认知方式也有其具体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特征, 体现了其语言文化身份。其次, 语言承载了人类的经验历史, 一门具体的语言也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经验, 表征了其民族特征。因此, 一定行为方式、处事原则、文化价值等与特定语言一起塑造了语言使用者的个性品质, 从而形成与这门语言相关的特有身份特征。

关键词: 具身认知; 文化身份; 民族性

Embodiment of Language Cogni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dentity

XIAO Yan WEN Xu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mbodiment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identi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embodiment of body and mind determines the embodiment of hu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age-based model, language cognition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ake place in certain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iven language are unique in its ways of representation is cognition, which in turn reflects the psychology of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语言具身认知中的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与认同研究”(19XY004)和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西语言战略比较与国家认同研究”(YB125-1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 燕, 女,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硕导,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研究。

文 旭, 男,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外语教育研究。

its speakers and thei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Furthermore, since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s of a nation is loaded in language, which represents the nation's character, therefore, the character of people are also shaped by the ways of social behaviors, norms and cultural values, all of which foster identities of the language speakers.

Key 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culture identity; national character

0. 引言

具身认知研究始于心理学和哲学,语言的具身认知是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一个语言学命题。在认知语言学对语义的研究中,具身认知是一个中心议题(Sinha & Jensen de López, 2000),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语言、身体、认知与社会实践经历是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整体,在人的身体感觉运动过程中,心智和认知过程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互动中得以塑造。跨学科研究达成的共识是“具身性”,涉及心智与身体,心智来自身体、由身体塑造并与环境互动,没有身体就没有心智(No body, never mind)。人类所具有的具身性塑造其自身认识、理解、思维和推理的方式,它们都源自身体经验并限定在身体经验范围内(Johnson, 1987: xv; Yu, 2015: 228)。在语言的具身认知中,语言不再是刻板的树形架构和无意义的符号,而是理解与感知合一,充满无限想象,它根植于身体,由于交际需要又促使其实现社会互动功能(Zlatev, 2016)。语言记录和表征了所有的身体经验,“语言也携带了共同的经验,这些共同经验在特定语言里处理信息时会自动激活”(Robinson & Altarriba, 2015: 246),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也记录在了其语言里。由此可见,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是一种“从真实或感知到的共同联系中得到的集体身份感,例如从语言、种族和宗教里获得”(Edwards, 1994: 125),儿童的社会化就是在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完成的(Schechter, 2015: 199)。语言认知的具身性特征帮助族群成员在语言认知过程中塑造和建构他们的个体和群体文化身份。

1. 语言的具身性与其文化语境的特殊性

具身认知具有社会文化维度的特征。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认知观,人首先是其身体存在于世界,世界的经验又通过身体被接受,这也意味着人的认知是从身体经验中获得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性实体,还是一个有着社会和文化维度的实体。它受社会和文化力量影响,极力塑造成自己需要的形象(Yu, 2015: 229-232),并在无数身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积累起无数经验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的方方面面又通过语言表征出来并传承下去。比如,在中国的风水文化中,修房造屋时都要看朝向,居所往往选择坐北朝南,这并非古人迷信,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的发现。这个朝向的房屋既能最大限度地冬天接受太阳的温暖,也能在夏

天回避太阳的直接炙烤,这是长期具身经验的凝聚,是对现实世界充分认知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智慧,这种智慧经过语言的代代相传成为一种文化。本族语者往往把语言描述的文化内容视为一种祖先的精神遗产,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传承者的角色,认同和代表了族群的身份。

具身认知具有普遍性特征,身体经验丰富了语言并使得人们在语言认知和语言习得的同时习得了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身份。在身体和心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人类获得经验知识并认识世界,又借助语言表征现实。同时,通过身体经验,现实也塑造了心智,使个体认知得到发展。对于个体来说,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习得与概念习得同步发展,在习得一门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这门语言所描述、记录和表达的概念知识及社会历史知识。同时,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处事原则、文化价值等也塑造了语言学习者的个性品质,形成与这门语言相关的特有的身份特征,个体和群体的身份特征在很多方面的一致性也随着他们的语言体系成熟而显现出来。因此,在社会文化实践中永久化的身体、认知和语言都是具身认知的内容(Rohrer, 2007: 350)。语言的具身性有着很多共同特征,例如,对身体部位的隐喻理解,中英文都有相同的用法:

(1)a. From 2012 to 2015 she was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COCA)

b. But in his role ahead of the public defenders, he simply did“ not have the manpower to do it.”(COCA)

c. But my head and my party, wanted a different discourse, an approach that will bring Arabs and Jews closer. . . (COCA)

(2)a. 我们的头儿很有魄力。

b. 他是儿童中的头儿,而为了执行头儿的任务,偶尔也有些霸道。

c. 他们的要求是很公道的,头儿点点头表示允许。

“头”/head 的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具身隐喻,作为身体部位,头部在人体的最上面,现代神经科学也认为位于头部的大脑主管思维,支配人的活动,因此中英文的“头”/head 都用来指一个群体的领导者或负责人。

人类的具身认知也有文化差异性。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身体及身体经验对认知起着基础与建构作用。例如,对“鸟”的原型理解,中国人的理想认知模型是“麻雀”,英国人的理想认知模型则是“知更鸟”。在英国,知更鸟常常飞入寻常百姓家觅食,英国人对知更鸟的具身认知也因此不时地反映在了英语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它有国鸟般的待遇;在中国,麻雀虽然没有浪漫的气质,它们成群觅食甚至困扰庄稼种植人,但在中国人的具身经验中,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麻雀”是最为常见的鸟。由于身体是理解事物所需要的想象结构的源泉,身体塑造了心智,身体的运动和互动在各种物理范畴形成结构并通过隐喻投射到抽象范畴(Johnson, 1987: xv),因此,心智也是具

身的,由身体的特定属性所塑造,人的感觉与运动系统的形成以及如何与物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互动都与具身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虽然心智存在于身体中,但心智的塑造并非普遍性一致,在不同的文化模型中,身体的“形”并不一致,文化对身体和身体经验的识解有差异,也给予身体各部位和器官及其功能不同的价值和意义(Yu, 2015: 227)。对身体和身体经验的不同识解激发不同的图式化和概念化,也造就了理解世界的不同视角。

语言的使用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于是语言中有了较多基于身体的隐喻,不同语言中的身体隐喻又与各自的文化息息相关。汉语里描述“思考”行为时多与“心”(心脏)相关,而英语描述这种行为多与头(脑)相关。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心是思维的器官,在西方传统中,思维的中心在头部,“心智”在两种语言中由不同的身体部位“brain”/head 和“心”/心脏表达,这是语言和文化具身认知差异性所致。例如,汉语的“心机”“心计”“心想事成”“用心做事”,英语的“rack one's brain”“use your brain”等。但在表达情感时,中英文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好心”“用心良苦”“kind-hearted”“heart-break”等。虽然神经科学一度完全否定了思维与心脏相关这种说法,但现代认知科学在反思中发现,人的思维活跃程度和情绪的变动确实在心脏的跳动和血液输送的速度上有明显的反应。

语言和文化的具身性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的社会形态影响并引导语言的发展变化。有机体与环境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身体经验的基本流程的各个方面相互依赖。根据语言相对论假设,语言的方方面面都与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有密切联系,语言的结构影响说话人感知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Robinson & Altarriba, 2015: 241)。比如,在表达自己与他人共同做事时,汉语习惯用“我和X”,英语用“X and me”,虽然只是词序差别,但在概念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也反映了说话人对角色的社会位置认同差异性。具身性永远置于社会文化环境里,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通过各种现实语境在语言使用者身上彰显,个体或群体的语言身份也因此与族群身份吻合起来。语言中新词的出现,原有词汇的消退、某些习俗的远去和新的习俗产生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比如现代科技发展、数字网络的普及出现的“网恋”“网红”等新词汇为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使用,他们也能理解其概念意义。余(Yu)(2015: 233-237)认为,文化不仅揭示具身经验,而且是具身经验的一部分。但身体并不终止于皮肤划定的肉体边界,它常常延伸至外部环境并且在参与各种身体和社会文化互动中变得实际,更具有社会性和文化特质。因此,许多具身经验都根植于社会文化语境,人们思维和说话的方式跳不出周围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冲击,它们是组成人类经验最基本的方式。个体和群体在习得语言与文化的过程中,形成母语使用习惯与相应的文化认同感,并建构起具有特定语言文化特征的族群思想意识。

2. 词语构式承载的文化符号及其民族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用其独特的形式表达意义,通过形式与意义的结合实现语言的功能,词语构式作为语言系统的核心要素,既表达了概念也帮助理解概念。概念因此经由词语成为思想领域中的个体,词把自身的重要特征赋予了概念,思想通过词语获得确定性(洪堡特,2011:29)。在语言的功能方面,语言的编码和解码借助具体的词汇语法构式实现话语交流。由于语言的使用都在特定的语境中,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多数词语都有特定的文化意义,包含文化信息。戈达德和叶(Goddard & Ye)(2015:71)认为,这些词语成为文化关键词,是外化的思维、行为、说话的文化方式,其中包含价值、理想、社会范畴、情感、社会功能,这些词汇相互关联,文化信息也储存在了这些关联的固定和常用词语搭配里。当我们说出“中医”“甲骨文”“武术”“三国”时,这些词语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当我们提及“克隆”“转基因”“智能手机”“春晚”“网购”时,这些词语则诉说着现代文化和科技文明。

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也是语言与文化的融合。萨丕尔(Sapir)(1963:14-15)认为,语言的外在形式是恒定的,而语言的内在意义、物理价值及密度取决于注意及大脑的选择兴趣,是大脑的自然发展属性。从语言的这一特点看,思维作为话语的最高潜在内容,可以通过理解语言中的每一个成分获得,语言中也拥有其完整的概念价值。因此,阿姆斯壮(Armstrong)(2015:181)和利桑佳(Risager)(2015:87)指出,文化根植于语言,文化融于语言,文化也是典型的语言延伸。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文化也随之变得更加生动有活力,在一个族群中被更为广泛地接受和固化,成为群体和个体身份的象征。有时这种语言和文化甚至延伸至族群之外,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软实力,英语和英美文化全球化就是其语言和文化伴随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与此相关的词语甚至英文字母都可能成为英美文化身份象征,像美国快餐“麦当劳”标记M、美国地域标记词“Hollywood”就常常与美国文化直接联系起来,而“太极”“长城”同样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瑜伽”则与印度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它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Brown,2007:189)。

由于“文化是我们的集体身份”(Brown,2007:188),语言习得也是文化及民族身份习得,二者相互促进。斯特尔蓬尼和赖(Sterponi & Lai)(2015:327)认为,文化学习使儿童具备了语言习得能力,文化不仅是语言发展的基础,语言也在历史延续和社会大语境中安身。由于语言中的词语构式也是文化符号,承载了特定族群的文化内容和民族历史,因此,语言是文化价值和行为的反映。一个简单的日常行为描述方式就可以反映特定文化中自我和群体价值观,也可以反映社会的结构(Robinson & Altarriba)(2015:245)。例如,描述自己的工作,英语必须加上人称代词,如“I am working”或“I'll work tomorrow”。中文不使用“我”也能达成了相同的功能:“昨天在

加班”“春节假期结束了,明天要上班”,只有在强调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上班时才会加上“我”。使用或不使用人称代词不仅仅是语言的差异性问题,还凸显了不同的焦点并隐含了一定的价值观,“语言形式预先决定了我们需采用某种观察和解释模式”(萨丕尔,2011:5)。鲁滨逊和阿塔利巴(Robinson & Altarriba)(2015:245)认为,语法差异其实与个体突出的程度有关,如果一种文化中强调个性,会更关注个体的成功、目标、需求和愿望,而强调集体的文化关注的是群体的成功、目标、需求和愿望,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语法现象展露了出来。语言是文化的标记,语言中蕴含了部分文化。语言承载的文化是不同语境中的过去经验,而当前情景性语境表征了实际的现实经验(Kecskes,2015:114)。正如洪堡特(2011:30)所说,语言绝不是个别人随心所欲的造物,而是始终属于整个民族,后来一代又一代人是从本民族的先祖那里承继了语言,语言便成为从主观走向客观,从处处受限制的个性迈向无所不包的实存的巨大桥梁,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由语言表达出来的(黎明、刘利民,2019)。

3. 语言文化的民族性

一门语言之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是因为它记录了这个民族的历史,表征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现实,“每一种具体语言都带有某种印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点”(洪堡特,2011:4)。因此,语言反映了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3.1 语言文化的民族身份属性

不同文化的具身经验赋予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其背景知识的能力。维特根斯坦(2016:156)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或至少是一种以习惯为前提的行为模式。语言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即使中性的表述也存在理解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受制于特定文化认知模型,语言认知可以是中性的,但语言并非语义上的中性(Kecskes,2015:115)。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把语言习得也看成是因习惯而形成,这就意味着语言和文化都是社会生活实践中慢慢习得的,是具身的。萨丕尔(Sapir)(1963:4)也认为,话语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活动,没有规定的限制,是社会群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持续的社会化使用产生的结果,不像走路那样靠有机体的直觉功能,话语是非直觉的,也是习得的文化功能。建构主义学习观也认为知识的习得不是机械的,而是在学习环境的限制和便利条件中主动获得的(Liu & Matthews,2005)。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一定的认知构式,也使用与经验相关的方式理解相同的语言构式:同样是“早餐”,中式和西式、北方与南方、城市与农村都有较大差别,早餐是什么有多个认知模型,吃什么样的早餐则体现了族群或地域身份。

语言和文化都是社会和人群的黏合剂,语言塑造生活与世界,文化标记集体身份,像蓝图一样引导一个社区人们的行为,帮助成员了解自己作为个人能走多远、对群体有什么责任(Brown,2007:188;Harvey,2003),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文化也显现了民族的身份属性。人类的行为发生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化常常成为一种社会生活

方式,人们同在一个文化语境中存在、思考、感知并与他人产生关系,它帮助建构一种外在群体身份形象和内在身份认同感。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用语言辨识、获取知识,也学会了用语言交流和传递信息,一切都烙上了文化的印记,语言习得也因此成了文化习得,反之亦然。母语习得过程中,文化不可避免成为语言习得的一部分,即使在相同的语言社区内,方言和方音更能代表一群人的身份,因此,习得一种语言和文化也习得了相应的语言文化身份。虽然任何语言的形式结构本身并不附带任何价值判断,但说话人总是赋予特定的词语、语法结构和语音一定的价值取向(Milroy & Milroy, 2002:11),代表了一种民族性特征。因此,语言与文化身份紧密联系,承载了文化的语言才是最完善的,也能最好阐释文化的价值与关切、表达语言的特征与艺术并使之语境化(Schechter, 2015:197)。

3.2 语言传承的民族文化价值

文化积累和历史传承都依赖语言,一种语言往往代表了一个民族,它显露了一个民族的心理与精神,记载传承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是民族身份的象征。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从未断裂的两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从古到今独一无二、一直使用的汉字系统和文化价值体系(凤凰网,2018)。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天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莱维特(Leavitt, 2015:22)认为,一个民族的心理个性与其语言形态紧密交融,语言表现心理,心理来自语言,语言是其精神,其精神即是语言。萨丕尔(2011:10-12)也指出,语言具有强大的社会化力量,共同的语言为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团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象征。语言形式呈现社会的文化积累,成语、医药公式、标准祈祷语、民间故事、家谱等,都是语言作为文化保存工具较明显的形式。

语言与民族或国家联系起来时,其民族或族群身份更具代表性。在这一点上,母语对于身份的确定尤其重要。谢克特(Schechter)(2015:198)、爱德华(Edwards)(1994:129)等认为,界定或决定人的个体身份和文化相关性都取决于一个人的母语,一个人的母语实质上就是其身份,没有什么比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更重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释放,一个没有自己语言的民族只是半个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财富、政府,甚至国土,它仍然可以生存,但是如果失去语言,就连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了。一个没有语言的民族就没有灵魂,没有语言就没有国家。

语言文字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凝结了一个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比如中国的甲骨文,文字形式和内容、记录文字的方法都反映古代的建筑和书法艺术之美,把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其中。同时,作为早期的成熟汉字系统,也让今天的文字有源可寻。罗常培(2015:4)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的固有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母语习得的过程也是本位化过程,学习者习得了本族语,也逐渐习得了这个族群的思维方式、

情感和行为(Brown,2007:194)。当然,这也是一个提升意识、学会理性对待身份的过程,任何麻木或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都不利于建构健康的民族身份,正如洪堡特(2011:9)所说,倘若人们能够更正确地认识到母语的内在关联,那么概念的清晰性、表达的明确性和意识的缜密性便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景象。也就意味着,在对母语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对母语和对祖国的挚爱,伴随而来的每一内心感受都会变得更为强烈。

4. 结语

语言的具身性决定了文化的具身性,语言文化作为集体身份标记,也建构了其民族身份。由于思想不仅依赖于普遍性的人类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一具体的语言所限定(洪堡特,2011:28),每一种语言都以特有的文化认知模型描述世界与事物、表达具身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也表征了民族身份。因此,对语言的具身性和语言文化身份的民族性讨论也给语言教学和语言习得带来以下启示:

一是语言习得必定伴随概念的认知与习得,语言与文化附带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思想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这也是认知语言学与其他学术领域如语言哲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文化学等普遍认同的观点。二是从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视角看,语言认知和语言习得是一种人生经历,个体在语言的具身认知中学会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概念化,对词语构式表达的概念理解也在社会互动中被固化,逐渐形成语言体系和概念化能力。三是二语习得伴随他文化习得,存在一个涵位化问题,学习者的语言自我感发生一定改变,形成更为复杂的语言文化身份,与单语者的语言文化身份有微妙的差别。由于一个民族的语言活动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活动通常交互影响(洪堡特,2011:15),如果积极的顺应、促进语言文化的开放性,增强语言的包容性,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在强化民族身份的同时能够形成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

参考文献

- [1] Armstrong, 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G] //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2]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 [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7.
- [3] Goddard, C & Ye Zhengdao. Ethnopragmatics [G] //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4] Edwards, J. Multilingualism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5] Harvey, 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s)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3(7):246-259.
- [6]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7] Kecskes, I. Language, Culture and Context [G] //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8] Leavitt, J. Linguistic Relativity [G]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9] Liu, C. H. & R. Matthews, Vygotsky's Philosophy: Constructivism and Its Criticisms Examined [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2005(6):386-399.
- [10] Milroy, J. & L. Milroy. Authority in Language: Investigating Standard English (3rd ed.) [M]. London/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2.
- [11] Risager, K. Linguaculture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G]//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2] Robinson, C. J. & J. Altarriba. Culture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G]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3] Rohrer, T. The Body in Space: Dimensions of Embodiment [G]//T. Ziemke, Zlatev, J. & R. M. Frank (eds.). 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ume 1: Embodiment.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7.
- [14]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63.
- [15] Schecter, S. R.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G]//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6] Sinha, C. & K. Jensen De López. 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Embodiment of Spatial Cogni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0(11):17-41.
- [17] Sterponi, L. & P. F. Lai. Cultur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G]//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8] Yu, Ning. Embodiment, Culture, and Language [G]//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9] Zlatev, J. Turning Back to Experienc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via Phenomenolog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6(4):559-572.
- [20] 爱德华·萨丕尔.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M]. 高一虹,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1] 黎明, 刘利民. 从福多思想语假说到概念思维的纯意义——概念及命题假说 [J]. 英语研究, 2019(9):61-69.
- [2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文化与价值 [M]. 许海峰,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 [23] 罗常培. 中国人与中国文: 语言与文化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
- [24] 威廉·冯·洪堡特. 语言哲学文集 [G]. 姚小平,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责任编辑: 蒋勇军

认知翻译学视阈中的隐喻 翻译过程与翻译策略

卢 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翻译学正经历着研究范式的转变, 认知翻译学运用技术手段研究、探索翻译过程的心理表征和认知加工的内部机制, 拓展着翻译研究的疆域和边界。隐喻翻译一直为翻译学界所关注, 是认知翻译学的核心研究主题, 隐喻翻译研究聚焦于考察大脑在隐喻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加工。隐喻翻译过程的研究涉及人对隐喻语义的理解与对普通语言表达即字面义的理解有无差异的问题, 也涉及隐喻翻译模型的结构和阐释, 同时关注隐喻翻译中的策略选择。本文最后指出, 认知翻译学要搞清楚隐喻翻译的认知加工机制和认知神经过程, 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实验研究, 运用先进科技进行多方位的实验实证研究应该成为近期认知隐喻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 认知翻译学; 隐喻翻译; 隐喻翻译模型; 隐喻翻译策略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Strategies of Metaphor in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LU Zhi

Abstract: Translatology is undergoing a turn of research paradigm.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is a discipline which investigates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translation process with technological devices, which expands the domain and bound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phor, as a core topic of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has been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认知翻译学视阈下的翻译过程研究”(19AYY014)及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项目(CSC-NO. 2018084401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卢 植, 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二级教授, 博士, 博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 中国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认知翻译学研究。

concerned all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search on metaphor transl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human brain in metaphor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primary question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is whether ther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comprehension of the metaphorical and the literal meaning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models is also concerned by the researcher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etaphor are the topic of the field as well.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esearchers of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to undertake various experimental studies to figure out the neur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Utilizing the advanced techniques to carry out the multidimensional empirical studies should be the major tendency of cognitive metaphor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metaphor translation; model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metaph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0. 引言

翻译学的研究正经历着研究范式的转变,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日渐成为翻译学科建设的又一推力。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在翻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手段的运用促进着对翻译过程的内部心理—认知机制的探索,拓展着翻译研究的疆域和边界。认知翻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并发展成为翻译学的重要分支,体现出鲜明的技术特色和突出的科学特质。隐喻是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范畴和核心术语,因此,隐喻翻译在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中极为重要。隐喻不同于普通的字面语言表达,它有着复杂的内部机制,因而隐喻翻译也迥异于其他语言现象的翻译。本文从认知翻译学的学理出发,阐述和分析隐喻翻译过程的模型和隐喻翻译策略。

1. 认知翻译学

当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助推着翻译学从翻译描写与翻译解释、翻译赏析与翻译评论转向对动态性翻译过程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简称TPR)运用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简称TAP)、键盘记录法(key-logging)、屏幕录制法(screencast)、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简称ERP,俗称脑电)、眼动跟踪技术(eye-tracking)、功能磁共振影像(functional magnet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简称fNIRS)等技术研究翻译行为的认知心理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学界将这种以认知加工过程为导向的翻译研究称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或“翻译认知研究”(Cognitiv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Ferreira & Schwieter, 2017; Halverson, 2015; Jakobsen, 2014; Martín,

2009,2010)。认知翻译学强调认知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将翻译看作是复杂的信息加工活动,主张运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探究和解释译者的心理加工过程及内部运作机理,其研究议题和对象主要包括翻译过程、翻译能力、文本对比与加工、机器翻译和人机交互、译后编辑、阅读与编译、工作记忆、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等。

认知翻译学认为翻译是双语者通过认知活动和语言转换,用译语(target language, 简称 TL)重组源语(source language, 简称 SL)语言输入的过程,这种语码重组过程涉及复杂的双语认知表征和语言心理加工。认知翻译学试图探究和解释译者对文本进行重组并创造出可被读者/听者接受的意义的过程,分析译者选择和运用翻译策略的心理过程,探讨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知识影响其思维的过程、语言理解及译品产出的认知机制,发展和评估译者翻译能力的途径和方法等,这些都可以从诸多不同的角度给予阐释和回答。认知翻译研究就是要解释上述问题中复杂的认知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工作机理及时程问题,参考和扩展现有的认知科学模型来描写和解释译者的行为与选择。李嘉图·穆诺兹·马丁(Ricardo Muñoz Martín)(2009,2010)首创“认知翻译学”术语并论述了认知翻译学的研究范式,阐述了认知翻译学的相关学科问题,标志着该术语在翻译学领域中地位的确立。认知翻译学把译者及其翻译过程确定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研究译者的认知风格、智力水平、翻译能力、思维特点、语言认知机制等。“译者研究的广义原则大纲将涵盖社会学、文化和认知,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看待译者的能动作用或使然过程。”(Chesterman,2009:13)认知翻译学家认为可以用科学方法和先进仪器探索译者心理活动的“黑箱子”(black box),比如,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检索翻译文本的语料库从而系统地描述译作质量和特点;运用心理语言学方法考察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过程中语境对词义、句子和文本的影响,比较译者和双语者的翻译行为表现,探查翻译的编码过程;借用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方法来分析和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过程、策略选择和行为表现;借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译者的大脑内部加工(卢植,2015;卢植、孙娟,2018b)。认知翻译学深度关注翻译过程的技术化,自动翻译或机器翻译的日益普及使得翻译研究者必须注意该专业化领域的动态和进展。认知翻译学学者密切关注和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管理和控制译出语言的过程及方式,观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路不确定性及解决翻译中所遇到问题的办法,探讨和论证译者能力对译作质量的影响(Martín,2016)。认知翻译学借用心理学和语言测试学的手段来分析和评估译者的能力,把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简称 WAIS)用于评估和评价译者的智力结构和智力特点,用 TOEFL 的分测验来评价译者的语言认知特点或语言背景知识(Martín,2010:169-187)。穆诺兹(2009:87-108)还提出翻译技能(translation expertise)的概念及其普遍特性或共性参数,突出阐释和强调了“翻译技能”的概念在认知翻译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认知翻译学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卢卫中等(2013)综述了作为翻译研究

新范式的认知翻译学的概况,谭业升(2012)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索了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应用问题,分析和阐述了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王寅(2012)分析了认知翻译研究的相关问题并阐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认知理据。在注重理论阐述的同时,新技术的运用也在逐渐普及,如不同翻译方向对学生译者认知负荷影响的实验研究(冯佳,2017)、人工翻译和机器译后编辑中认知负荷的眼动实验研究(卢植、孙娟,2018a)、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总理记者招待会原文隐喻口译策略的实证研究(杨璘璘,2018)等。文旭(2018)确立了认知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新范式的地位。

2. 隐喻翻译的认知研究

人类的概念系统大多具有隐喻性,隐喻构建着人的认知、思考和行为,时刻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之中,是思维与语言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胡壮麟,1998),成为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束定芳,2000:20)。“隐喻的精髓在于用一事物的词汇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 5),概念隐喻更多地关注隐喻的心理与概念方面,而不仅仅限于其文本方面,因此成为研究和探析大脑认知过程的重要手段(Schäffner & Shuttleworth, 2013)。

隐喻翻译一直为翻译学界所关注。隐喻翻译的首要问题是隐喻是否可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Nida, 1964: 219; Dagut, 1976, 1987; Dobrzyńska, 1995; Mason, 1982; Snell-Hornby, 2001; Schäffner & Shuttleworth, 2013; Zheng & Xiang, 2013; 项霞、郑冰寒, 2011)。关于隐喻能否翻译的问题,译学界见仁见智,共有三种观点:隐喻完全不可译(Nida, 1964: 220)、隐喻完全可译(Mason, 1982)和隐喻可译性中立观(隐喻部分可译部分不可译)(van den Broeck, 1981)。隐喻的可译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哲学式的思辨问题,在翻译实践中,隐喻翻译就像隐喻本身一样普遍存在。作为常见语言现象的隐喻,其翻译问题之所以得出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与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隐喻语料有关,大多数研究者只是笼统地将隐喻语言和字面语言相比较,而未讨论隐喻的不同类型。隐喻本身不是一个仅仅对立常规性字面语言表达的笼统现象和概念,而是一个可从不同维度细分为不同类型的语言表达(苏远连, 2012)。

翻译学界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翻译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方法(Toury, 2012: 82),可作为各种翻译方法的载体。研究隐喻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表征和认知加工机制应考虑隐喻的分类(Snell-Hornby, 2001)。关于隐喻理解的不同心理机制问题,赖宁和腊查德(Rydning & Lachaud) (2010: 85-108)发现译者对不同类型的隐喻的理解有所不同,对普通隐喻的把握比对复杂隐喻的把握更好。殷荷夫等(Inhoff et al.) (1984)所做的首例隐喻义与字面义理解机制的眼动实验发现,语言隐喻义和字面义的阅读理解并无差异,格鲁兹堡(Glucksberg) (2001: 42)发现理解隐喻表达和字面表达时的反应时无差异,威尔逊和斯波伯(Wilson & Sperber) (2004)认为隐喻的理

解并不需要特殊的认知加工,阿伦斯等(Ahrens et al.)(2007)通过fMRI研究了普通话的常规隐喻和异常隐喻,发现在阅读常规隐喻和字面义表达方面没有显著的时间差异。而有的研究却发现隐喻的理解需要较多的认知努力,诺维克等(Noveck et al.)(2001)发现隐喻表达比字面表达需要更长的阅读时间,赖姿吟等(Lai et al.)(2009)发现隐喻(包括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比字面表达需要更多的认知加工。关于隐喻理解和字面义理解,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隐喻作为不同于字面义语言表达的一种语言现象,其理解有着自己的特点,即隐喻的理解不同于字面表达的理解。本研究把隐喻分成词汇层隐喻和句子层隐喻、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

语法隐喻是在形式上有标志的常规性概念隐喻,它和词汇隐喻实质上都与替代或替换有关,它关注的是词汇等信息的句法特征。语法隐喻可被解释为一种和词汇隐喻并列的现象,它和词汇隐喻有相同的认知机制,它通过级转移和词类转换实现。阿尔维斯等(Alves et al.)(2014)研究翻译任务期间与认知处理相关的翻译单位时,发现语法隐喻可以解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译者并不是完全将语法隐喻从原文转换成译文,语法隐喻的翻译有其本身的特点。赖宁和腊查德(2010)探索了识别、加工和理解词汇隐喻与语法隐喻的速度、准确性及清晰度,发现词汇隐喻比语法隐喻信息加工更简单。但上述两项研究对参与研究的受试均未进行分组。就隐喻的常规性对隐喻理解而言,一般在研究中把隐喻区分为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如金特纳和鲍德尔(Gentner & Bowdle)(2001)认为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是以不同方式得到加工的,金特纳等(2001: 216)发现映射的一致性会影响对新奇隐喻的加工,但不影响对常规隐喻的加工。阿伦斯等(2007: 168)运用功能磁共振影像(fMRI)研究发现,受试在理解汉语普通话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时的脑区激活模式有所不同,赖姿吟等(2009)用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的理解时,发现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都比字面表达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而新奇隐喻更是需要持续的认知努力。

3. 隐喻翻译过程模型

翻译过程分为原文理解和译文产出两部分,那么,这两个过程是接连发生,还是可重叠进行?对一般语言现象翻译过程的阐释和理论分析,主要有顺序翻译模型和平行翻译模型。

顺序翻译模型。吉尔(Gile)(1995: 101)的经典顺序翻译模型(如图1所示)认为翻译过程是线性的和分单元进行的,一个单元先被理解,再被转化。该模型将翻译过程划分为两个依次发生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源语文本的语义理解阶段,译者构建对源语文本里的翻译单位(即正在处理的单位)的意义假设并对该假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检验,若假设未通过检验,则重新构建意义假设。此环节可循环往复,直到假设被验证通过,译者才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译语文本的信息重组阶段,译者要在译语文本中重新创建一个和源语文本信息对等的翻译单位并检验该翻译单位

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直到得出满意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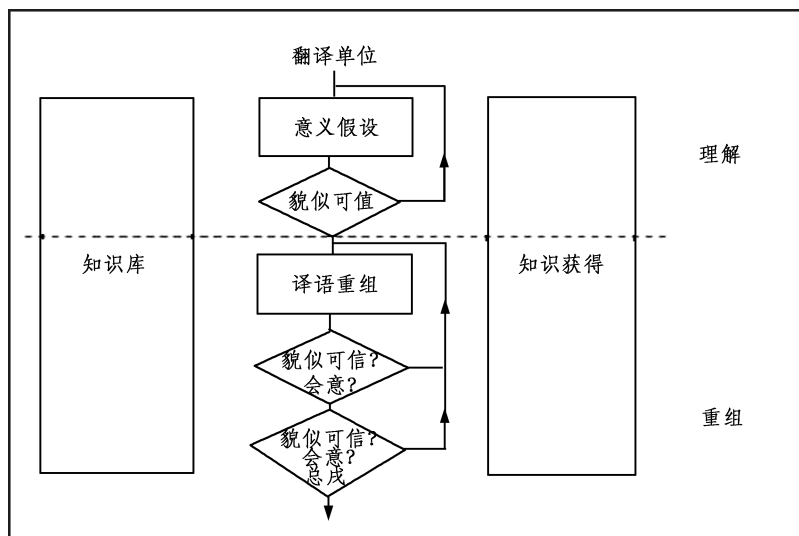


图1 Gile 的顺序翻译模型(1995:102)

顺序翻译模型间接而含蓄地假设,在翻译过程中,认知资源的分配是在源语文本理解和译语文本重组之间交替进行的。顺序翻译模型为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提供了相关参考框架,推动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但也有学者质疑顺序翻译模型的观点,认为源语文本理解和译语文本重组实质上是同时发生的,因而产生了平行翻译模型。

平行翻译模型。丹克斯和格里芬(Danks & Griffin)(1997:161-175)构建出一种更为细致地描述翻译认知过程的模型,即平行翻译模型(如图2所示)。与顺序翻译模型的观点不同的是,丹克斯和格里芬认为,源语文本的理解和译语文本的重组在发生时间上是平行的,译者在进行翻译处理之前并未完全理解源语文本,而是在尝试理解源语文本的同时,也思考着译语文本的重组。有研究证实,与普通的阅读理解相比,译者在以翻译为目标的阅读时,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译者在理解源语文本的过程中,可能已参与了译语文本重组的相关活动(Jakobsen et al., 2007:217-249)。丹克斯和格里芬(1997)强调,翻译过程不同于普通的阅读理解过程,它是一种目标导向过程,受原作者、译者及读者的意图等诸多因素的控制和影响。

丹克斯和格里芬的模型显示,原文的理解与译文的产出受作者的意思、目的以及译者的意图、读者的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丹克斯和格里芬(1997:174)认为译者在译文产出过程中再度理解原文。沃尔普朗德(Hvelplund)(2014:129)用实证的方法证

明了对原文的理解的确可能发生在译文产出阶段,译者敲击键盘输出译文时眼睛可能会同步看原文,专业译者和学生译者分配给这一活动的注意力占总注意力的百分比分别为 12.1%和 7.3%,也就是说理解与产出平行的时间只占总时长的很少部分,学生译者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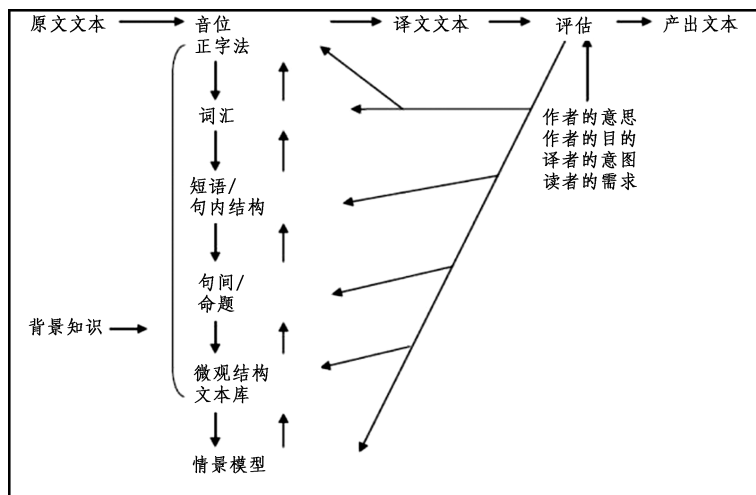


图2 Danks 与 Griffin 的平行翻译模型(1997:174)

隐喻翻译过程不同于常见语言现象的翻译过程,因而是译学界极为关注和重点探索的问题之一,“尽管翻译的核心问题是文本翻译方法的整体选择,但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隐喻的翻译”(Newmark, 1988: 104)。目前,关于隐喻翻译过程,尚未有普遍接受和适用的模型构建,笔者认为,该模型的建构应具备以下特征:①关于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隐喻最有可能转移到译文中的试探性预测;②从“规范”理论的角度说明如何翻译隐喻,以便在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建立“最佳对应”(根据文本类型、隐喻功能等)。隐喻翻译过程的模型把隐喻翻译的过程阐释为:

(1) 等译。原文中的隐喻“本体”和“喻体”都被严格转移到译文中时,这就是隐喻翻译过程中的“等译”。词汇隐喻的翻译过程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取决于原文和译文是否使用一致的或对应的“喻体”:①如果原文和译文中的“喻体”是一致的或对应的,则生成的译文隐喻将是惯用的;②如果原文和译文中的“喻体”不同,则最终的译文隐喻可能是语义异常或大胆创新。

(2) 换译。这种模式适用于原文中的“喻体”被某种程度相同的“喻体”替换为不同的译文“本体”,然后原文和译文“喻体”可以被视为翻译对等,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本体”。

(3) 创译。当一个原文隐喻被译文中的一个非隐喻性表达所阐释时,就是创译。

事实上,这种隐喻翻译模式是把隐喻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由此产生的译文表达达到了一个评论的水平,而不是实际上的翻译。

这种可能的隐喻翻译模型既概略又简洁,对复杂且多样的隐喻翻译过程做了简约的概括和概览,虽简短但完整,至少在具体的案例中,具有通用性和解释力。此种模型对翻译过程的例示见表1。

表1 隐喻翻译过程中的三种策略例示

序号	原文隐喻	译文表达	匹配模式	翻译方式	
(1)	a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石二鸟	一致的本体 一致的喻体	等译
	b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箭双雕	一致的本体 一致的喻体	
(2)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举两得	一致的本体 不同的喻体	换译	
(3)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事半功倍	一致的意思	创译	

上述模型也可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说,把三种模式理解为四种隐喻翻译模式:(1)a可称之为直译即直接的字面翻译;(1)b为拟译即根据专名进行翻译;(2)为意译,即基于语义的认知意义做出翻译;(3)是推译,即依据原文的话题和话语特征做出理性的推理和演绎后做出翻译。隐喻翻译的难度极大,对隐喻翻译过程模型的实际适用性,即这些翻译过程的预测适用于特定情况的可行性或对特定情况下译文阐释力的讨论等尚待深入和细化,因此,上述模型仅是理论上的假设。隐喻类别相对繁杂,隐喻翻译模型的推动和发展可能不仅与隐喻的类型有关,而且还取决于隐喻出现的文本环境。

总之,隐喻翻译过程模型,是顺序的还是平行的,或者是顺序模型和平行模型融合互补的混合模型,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4. 隐喻翻译策略

在隐喻翻译中可能很难在译文中找到一个对应于原文隐喻的对等隐喻,但仍有多种方法来翻译某个隐喻表达,这涉及隐喻的翻译策略问题。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隐喻翻译策略。

纽马克(Newmark)(1985:295-326)提出了六种类别的常规隐喻:死隐喻、俗语(cliche)、标准隐喻、原创隐喻、转喻、削弱和冗余隐喻。为了翻译各种隐喻,纽马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程序,共有七个方面,分别是:①保持相同的形象;②采用新形;③释义;④调整原来形象;⑤形象加意思;⑥改隐喻为明喻;⑦删除冗余的隐喻。塔赫里·阿达莉等(Taheri-Ardali et al.)(2013b)提出了五种隐喻翻译方案:①保持映射和措辞;②保持相似映射但有不同的措辞;③改变映射和措辞;④直译;⑤变非隐喻为

隐喻。

曼德尔布利特(Mandelblit)(1995)的“认知翻译假说”设想了隐喻翻译的两种方案:类似映射条件(两种语言的隐喻之间具有概念上的转移)和不同映射条件(两种语言的隐喻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转移)。蒂尔科宁·康迪特(Tirkkonen-Condit)(2002)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和验证“认知翻译假说”关于“翻译主要通过词汇关联”的假设,他建议研究者设置严格控制的变量进行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来回答如下问题: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词汇层面进行的?触发在概念层面翻译的动因和需要是什么?职业译者是否比非职业译者更多地从概念层面进行翻译?纽马克(2001)提出了隐喻翻译的八个原则。谢芙娜(Schäffner)(2004)提出了五种备选的隐喻翻译策略:①宏观层面的概念隐喻在原文和译文中相同,并非每个个体的表现都在微观层面被考虑;②原文中的基本概念模式的结构组件在译文中被替换为明确的表达式;③隐喻在译文中更加精细;④原文和译文采用不同的隐喻表达式,可以在更抽象的概念隐喻下组合;⑤译文中的表达反映了概念隐喻的不同方面。这表明尽管概念隐喻不能在微观层面加以转化,却可以在宏观层面得以保留。塔赫里-阿达莉等(2013b)讨论了五种隐喻翻译方案:①相似映射条件、相似措辞;②相似映射条件、不同措辞;③不同映射条件、不同措辞;④原文中的隐喻义译为译文中的字面义;⑤源语文字语言变成译语中的隐喻义表达。德拉斯蒂德和卡尔(Dragsted & Carl)(2013)将翻译风格分为局部型和整体型,类似于局部翻译策略和整体翻译策略。司耶鲁普(Sjørup)(2013:33)讨论了隐喻翻译策略与认知努力之间的关系,认为译者倾向于选择直接的翻译策略,而不是在翻译策略上花费不必要的认知努力,因此所有翻译任务其实很容易找到常规的译文语言等价物,只有那些思考足够深入的人才能成功地解决翻译中的隐喻困难。

德布辛司卡(Dobrzyńska)(1995:595)认为,译者在处理隐喻时有三种选择:①使用原有的隐喻价(M-M);②选择具有相同意义的另一种比喻性词组(M1-M2);③释义(M-P)。范登布鲁克(van den Broeck)(1981:77)也提出过这种分类,只是用了不同的措辞,本文不再赘述。维克博格(Wikberg)(2004:245-265)发现,M-M策略在英语到芬兰语、挪威语和瑞典语的翻译语料库中的使用最多。司耶鲁普(2013)的实验也发现,M-M策略最受青睐。可以假定,当对应可即刻被发现时,M-M策略就会被使用,所以该策略比较节省认知努力。当不能马上发现对应时,译者会采用间接翻译策略。换言之,间接翻译策略是直接翻译策略的一个“备胎”,所以间接翻译策略应比直接策略需要额外的努力。司耶鲁普(2013)的隐喻分析眼动追踪和键盘记录实验表明,间接翻译策略(M1-M2和M-P)的产出时间比直接翻译策略(M-M)更长,但在理解阶段无显著性差异。

5. 结语

隐喻是观察语言的重要窗口,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普遍现象,是当代认知科学研

究的重要议题,自然成为认知翻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

我国翻译认知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为内省思辨,实证研究仅占5%(金胜昔、林正军,2016)。认知翻译学尚属我国翻译研究中新的学科突破点和增长点,当前,相关研究数量少,研究规模小,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科学严谨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由于其复杂的语言内部运作机理,认知翻译学要搞清楚隐喻翻译的认知加工机制和认知神经过程,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实验研究。借用眼动技术、近红外线影像技术和功能磁共振影像技术等先进科技应该成为近期隐喻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Alves, F., Gonçalves, J. L. & K. S. Szapak.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Conceptual/Procedural Distinction in Translation: A Key-Logging and Eye-Tracking Study of Processing Effort [J]. *MonTI Special Issue 05-Minding Translation*, 2014(1):151-175.
- [2] Ahrens, K., Liu, H., Lee, C. S., Gong, F. S. & Y. Hsu. Functional MRI of Conventional and Anomalous Metaphors in Mandarin Chinese [J]. *Brain and Language*, 2007, 100:163-171.
- [3] Chesterman, A.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9, 42:13-22.
- [4] Dagut, M. B. Can “Metaphor” Be Translated? [J]. *Babel*, 1976, 22(1):21-33.
- [5] Dagut, M. B. More about the Translatability of Metaphor [J]. *Babel*, 1987, 33(2):77-83.
- [6] Danks, J. & J. Griffi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G] // J. Danks, G. Shreve, S. Fountain & M. McBeath (ed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ousand Oak: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 [7] Deignan, A. *Metaphor and Corpus Linguis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8] Dickins, J. Two Models for Metaphor Translation [J]. *Target*, 2005, 17(2):227-273.
- [9] Dobrzyńska, T. Translating Metaphor: Problems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5, 24(6):595-603.
- [10] Dragsted, B. & M. Carl. Towards a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yles Based o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J].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2013, 5(1):133-158.
- [11] Fauconnier, G. & M. Turner. Rethinking Metaphor [G] // W. Raymond & Jr. Gibbs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2] Ferreira, A. & J. W. Schwieter.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n Overview [G] // J. W. Schwieter & Aline Ferreira (eds.).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 [13]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14] Glucksberg, S. L. *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Language: From Metaphors to Idiom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5] Halverson, S.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merging of Empirical Paradigms: The Case of “Literal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Spaces*, 2015, 4(2):310-340.
- [16] Hvelplund, K. Eye Tracking an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 of Eye-Tracking Data [J]. *MonTI Special Issue-Minding Translation*, 2014(1):201-223.
- [17] Inhoff, A. W., Lima, S. D. & P. J. Carroll. Contextual Effects on Metaphor Comprehension in Reading[J]. *Memory and Cognition*, 1984,12(6):558-567.
- [18] Jakobsen, A. L.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of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G]// Elke Brems, Reine Meylaerts & Luc van Doorslaer (eds.). *The Known Unknow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19] Jakobsen, A. L., Jensen, K. T. H. & I. M. Mees. Comparing Modalities: Idioms as a Case in Point [G]//F. Pöchhacker, A. L. Jakobsen & I. M. Mees (eds.).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Beyond: A Tribute to Miriam Shlesinger*.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Press, 2007.
- [20] Lai, V. T., Curran, T. & L. Menn. Comprehending Conventional and Novel Metaphors: An ERP Study[J]. *Brain Research*, 2009,1284:145-155.
- [21]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2] Mandelblit, N. The Cognitive View of Metapho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J].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Part 3, 1995:483-495.
- [23] Martín, R. M. The Way They Were: Subject Profiling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G]// Mees, I. M., Alves, F. & Göpferich S. (eds.) *Methodolog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Copenhagen: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009.
- [24] Martín R. M.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G]// G. Shreve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25] Martín, R. M. Of Minds and Men-Computers and Translators[J]. *Poznań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16,52(2):351-381.
- [26] Mason, K.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J]. *Babel*, 1982,28(3):140-149.
- [27] Newmark, P.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G]//W. Paprotté & R. Dirven (eds.). *The Ubiquity of Metaphor: Metaphor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28]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 [29] Nida, E.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 E. J. Brill, 1964.
- [30] Noveck, I. A., Bianco, M. & A. Castry.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etaphor[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1,16(1):109-121.
- [31] Rydning, A. F. & C. Lachaud, The Reformulation Challenge in Translation: Context Reduces Polysemy During Comprehension, but Multiplies Creativity During Production[G]//G. M. Shreve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32] Schäffner C.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a Cognitive Approac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4(36):1253-1269.
- [33] Schäffner, C. & M. Shuttleworth. Metaphor in Translation: Possibilities for Process Research [J]. *Target*, 2013,25(1):93-106.
- [34] Sjørup, A. *Cognitive Effort in Metaphor Translation: A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Study*[D].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2013.
- [35] Snell-Hornby, M. The Space “inbetween”: What is a Hybrid Text?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1,2(2):207-216.

- [36] Taheri-Ardali, M., Bagheri, M. & R. Eidy, Special Them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in Translation [G]. International NLPSC Workshop. Frederiksberg: Samfundslitteratur Press, 2013a.
- [37] Taheri-Ardali, M., Bagheri, M. & R. Eidy. Towards a New Model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A Cognitive Approach[J]. Translation Studies, 2013b, 11(41): 35-52.
- [38] Tirkkonen-Condit, S. Metaphoric Expressions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2, 3(1): 101-116.
- [39]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40] van den Broeck, R. The Limits of Translatability Exemplified by Metaphor Translation[J]. Poetics Today, 1981, 2(4): 73-87.
- [41] Wikberg, K. & Anna-Brita Stenström. English Metaphors and Their Translation[G]//K. Aijmer et al. (eds.) Discourse Patterns in Spoken and Written Corpor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42] Wilson, D. & Sperber, D. Relevance Theory[G]// L. R. Horn. & G. Ward (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4.
- [43] Zheng, B. H. & X. Xiang. Processing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Sight Translation[J]. Babel, 2013, 59(2): 160-183.
- [44] 冯佳. 译入/译出认知负荷比较研究——来自眼动追踪的证据[J]. 中国外语, 2017(4): 79-91.
- [45] 胡壮麟. 有关语用学隐喻观的若干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1): 1-4.
- [46] 金胜昔, 林正军. 国内翻译认知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外语教学, 2016(5): 96-101.
- [47] 卢卫中, 王福祥.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4): 606-616.
- [48] 卢植. 认知科学视野中的翻译过程研究[J]. 东方翻译, 2015(3): 20-26.
- [49] 卢植, 孙娟. 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中认知加工的眼动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a(5): 760-769, 801.
- [50] 卢植, 孙娟. 翻译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其研究[G]//李清华. 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b.
- [51] 束定芳. 论隐喻的基本类型及句法和语义特征[J]. 外国语, 2000(1): 20-28.
- [52] 苏远连. 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在教学条件下隐喻能力的发展——隐喻生涯假说阐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2): 207-219, 319-320.
- [53] 谭业升. 认知翻译学探索: 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 [54] 王寅. 认知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2(4): 17-23, 127.
- [55] 文旭. 认知翻译学: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J]. 英语研究, 2018(2): 103-113.
- [56] 项霞, 郑冰寒. 隐喻的理解与表达: 基于英译汉视译过程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3(3): 422-436, 481.
- [57] 杨璘璘. 认知视域下记者招待会中隐喻口译策略的实证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8, 31(2): 88-94.

责任编辑: 郭建辉

何为翻译思想与翻译思想研究何为

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翻译思想是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我国译学界对翻译思想的研究为时并不长,存在着诸多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等同起来的现象。翻译思想是人们对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表达个人或群体如何通过翻译看社会和如何通过社会看翻译。翻译思想蕴于社会历史,寄于翻译实践,也现于理论论述,开展翻译思想研究应遵循语境化、动态观和整体性原则,研究者应掌握文本分析、概念分析、心理分析、比较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翻译思想;翻译思想研究;界定;研究方法

What I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How to Do Translation Thought Studies

LAN Hongjun

Abstract: Translation though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oes not enjoy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nfluenced by a definition that regards translation thought as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e highest level, translation thought studies has been, to a great extent, confined to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paper gives a new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discusses its research methodology accordingl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ranslation thought is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translation as a social practice, expressing people's view on the societ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or their view on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society. The translation thought, which is always set in certain social contexts, embodies itself in people's theoretical writings and their translation behaviors as well. The methods that can be applied in doing translation thought studies include textual analysis, conceptual analysi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other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ought; translation thought studies; defini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作者简介:蓝红军,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博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主要从事翻译学理论批评和翻译史研究。

0. 引言

作为人类思想成果的一部分,翻译思想是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翻译思想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思想或特定时期的社会翻译思潮,因而翻译思想研究属于翻译史研究的范畴,也称为翻译思想史研究。翻译思想研究围绕着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进行,其原因在于“历史的中心是人,翻译思想史的中心也是人”(王秉钦,2009:1),以思想为对象的研究必然落实到对人的研究之上。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和翻译研究历史,然而我们对翻译思想的研究却为时不长。虽然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对佛经翻译家生平和译经作品的史料辑录,不过并非对翻译思想的研究。五四时期我国学者开创了对翻译家的专门研究,展现出进行翻译思想研究的初步意识,但既没有对翻译思想的界定,也没有明确将之视为研究对象。

我国对翻译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最早以“翻译思想”为题名的论文是周之璆(1983)的《列宁翻译思想浅析》。此后,“翻译思想”正式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之后,增长尤为显著。截至2019年6月,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翻译思想”为题名的期刊论文达到了73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200篇,另外还有硕博士论文136篇。学者们已基本完成了对重要翻译人物的史料整理和对他们翻译论述的解读和阐释。那么,翻译思想研究还可以有何作为?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取得对翻译思想研究的创新?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探讨。

1. 我国翻译思想研究的现状

我国翻译思想研究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呈现。考察以“翻译思想”为题名的期刊论文的主题,可以看到,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过程”“翻译批评”等展开,最受关注的翻译思想家是“林语堂”“鲁迅”“韦努蒂”“许渊冲”,涉及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文学翻译”“佛经翻译”“诗歌翻译”等。

我国从21世纪开始有了翻译思想研究专著,对国内翻译思想的研究著作有王秉钦(2004,2009,2018)、刘宓庆(2005)、高金岭(2008)、郑意长(2010)、廖七一(2010)、袁斌业(2011)、冯玉文(2015)、邵有学(2018)等。对国外翻译思想的研究著作有蔡新乐(2007,2010)、张景华(2009)、周晔(2011)、乔莹洁、韩慧(2013)、杨司桂(2016)等。这些著作情况显示,目前译学界对国内的翻译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家,而对国外的翻译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理论家。专题研究正逐渐增多,研究视角慢慢变得丰富,有对个体的翻译思想的专门研究,也有对翻译思想的演进历程的研究,还有对中西翻译思想的对比研究,有史料整理和评述性的研究,还有史论探索性的研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国外的翻译思想研究,学者们很少对“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三者做明确的区分(王向远,2015:151)。《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王秉钦,2004)可谓是最早的以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著作以中国译论史上“十大学说”为中心命题,关注的是代表性的人物和理论学说,“分析了几十个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王秉钦,2004:2)。作者对他以翻译理论为线索“梳理译论长轴”做了一点说明,“我发现中国翻译大家钱锺书、朱光潜、王佐良、季羨林、许渊冲等人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现代翻译概念,可以说,它们是现代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颇值得深入研究”(王秉钦,2009:5)。当然,这只说明了这些概念重要,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研究翻译思想的任务就是梳理译论。

在研究中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等同起来对待,这并非个例。刘宓庆(2005)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该著作14个章节的标题中只有第八章的标题“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和流派述略”中含有“翻译思想”这四个字,而该章实际内容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释义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后现代主义与翻译理论、心理—认知心理学派、新直译论等。很明显,刘宓庆在论述中西翻译思想时,是以“翻译理论”“翻译学”“译论”“流派”“翻译研究”等为线索,他未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翻译研究区别开来对待。

译学界在研究翻译思想时聚焦译论,或者以翻译理论替代翻译思想,这种做法有其学理上的基础,即学界对翻译思想的界定。以当前我国最有权威的译学词典《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2011)为例,该辞典对翻译思想的释义如下:

翻译思想(thoughts of translation)指翻译家对翻译之“道”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这种认知又反过来指导它在更高层级上的实践,由此获得新的经验,如此周而复始,翻译思想表现为对译事的某种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通常经历三个深化(或提升)阶段:体验(experiencing,集中于对丰富的实施 What)、体认(knowing,集中于对规律的把握 How)、体悟(apprehending,集中于对理念的领悟 Why) (方梦之,2011:16)

该词条明确标注了其内容引述自刘宓庆的著述。由此可见,学界最普遍接受的是刘宓庆对翻译思想的界定。刘宓庆(2005:xxiii)清晰地图示出他对翻译思想与不同层次翻译理论之关系的认识,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论断:“翻译思想是翻译理论的最高层级。”(刘宓庆,2005:3)此外,他还有如下表述:

翻译思想来自翻译家和理论家高度富集的对翻译行为的经验观察,这种观察可以是自身的,也可以是他人的,可以是当代的,也可以是过往的。(刘宓庆,2005:3)

翻译思想是高屋建瓴的语际转换规律揭示,这种揭示不是对个别局部的解释,而是对无数局部的共时的剖析和汇集以及历时的观览提升,因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审视,

具有很强的概括力。

(刘宓庆,2005:5)

这些文字展现出刘宓庆对翻译思想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其核心观点可概括如下:

- (1) 翻译思想是最高层级的翻译理论;
- (2) 翻译思想是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高度提升;
- (3) 翻译思想来自翻译家和理论家对翻译行为的经验观察;
- (4) 翻译思想是对语际转换规律的揭示。

刘宓庆的论述意味着这样的认识:翻译思想是翻译理论的一种,但仅限于最高层级的翻译理论,低层级的翻译理论不能称为翻译思想;而这最高层级的翻译理论就是对翻译之“道”的提升,即对“语际转换的规律”的揭示;此“道”来自对翻译行为的“经验观察”。这就不难解释,他在讨论翻译思想时围绕着翻译理论进行。刘宓庆的翻译思想观对我国翻译思想研究有重要的影响,研究成果显示,对个体翻译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翻译理论为中心,聚焦于对翻译实践、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等的讨论,即使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并不明确自己的定义,却也基本围绕翻译之“道”在讨论。

2. 翻译思想研究的对象

笼统地说,翻译思想就是翻译思想研究的对象。而如何界定翻译思想就成了判断翻译思想研究对象域的标准。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译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将翻译思想等同于翻译理论,甚至将之限定在翻译理论中的某一个层次。这种界定直接影响了翻译思想研究对自身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例如,傅雷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学翻译家,是公认为有着广博精深的翻译思想的,但如果以“最高层级的翻译理论”来作为判断标准的话,恐怕我们无法承认傅雷的文学翻译背后有“翻译思想”,因为“傅雷的翻译思想,实际上可以被称为一种朴素的翻译观”,他“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创立一种独特的翻译理论体系”(许钧、宋学智、胡安江,2016:178)。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显然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悖。

翻译思想是否等于翻译理论?译界学者对此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穆雷、蓝红军(2009:178)指出传统译论并不等同于传统翻译思想,因为思想可以寓于理论、非理论化的言论与翻译实践。黄忠廉(2010:77)也明确提出思想不等于理论的观点,他认为“思想是理论的原料”,“从思想到理论必须历经一系列过程:产生感性认识、确立翻译思想,验证翻译假说和形成翻译理论”。夏登山、邵有学(2011:74)对现有研究没有区分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的情况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翻译思想史“不是个人学说和理论的集合”。

学者们也开始提出对翻译思想的新界定。夏登山、邵有学(2011:76)认为翻译思想是上升为时代和社

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思考与表达。邵有学(2018:102)认为翻译思想是翻译理论和翻译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概言之,学界逐渐认同:翻译思想不等于翻译理论,而是翻译理论和翻译行为之后社会价值观的反映,翻译思想史不等于翻译理论史,翻译思想研究不应限于探讨翻译家对翻译中“语言转换的规律”的认识,而需拓展自身的研究对象,探索新的方式与途径。

基于对翻译思想的新认识,夏登山、邵有学(2011:76)建议以“事件为脉络”撰写翻译思想史,从社会和文化的高度考察翻译思想的历程,《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邵有学,2018)即是按照这一方针书写翻译思想史的。不过,该著作是对翻译思想史整体研究的一种探索,并不是对个体翻译思想研究的创新。我们依然需要回答,对个体翻译思想的研究是否限于翻译之“道”?是否限于对其有关翻译实践的原则的探讨?翻译思想研究固然需要解读翻译家的译作,了解其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研究其翻译技巧、策略背后的“某种原则”,但是否可以(应该)超出翻译之“语际转换规律”来看个体的翻译思想?或者更进一步地说,翻译思想研究是否可以跳出“翻译”圈子,使之成为文学、文化、哲学、文艺理论、社会学、史学、美学等领域的共同话题?是否应将翻译思想与之存在的依据联系起来,以揭示翻译思想观念的来源、意蕴以及对人的历史活动的影响?

思想作为思维活动的结果或形成的观念,并不必然以理论或理论体系的形态呈现。人们获得的对翻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认识,即翻译思想。能提出翻译思想的并不只有翻译理论家,有翻译思想者也并不一定是翻译思想家。无论是普通的译者,还是伟大的翻译家,都一定有其翻译思想,但即使是伟大的翻译家,如果他没有提出独到的见解,并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的话,也难以被称为翻译思想家。有翻译思想者更不一定是翻译理论家,因为理论家是指“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理论水平,能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专家”(李行健,2004:804)。

鉴此,本研究提出对何为翻译思想的一种界定:

- (1) 翻译思想是人们对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
- (2) 翻译思想蕴于社会历史,寄于翻译实践,也现于理论论述;
- (3) 翻译思想表达个人或群体如何通过翻译看社会和如何通过社会看翻译。

第一点是关于翻译思想的对象,第二点是关于翻译思想的存在方式,第三点是关于翻译思想的内容。翻译思想并不限于对“如何译”的认识,就本质上而言,翻译思想是对翻译何以存在的认识。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思想由其社会存在决定,这意味着,人们的翻译思想由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翻译思想是翻译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因而翻译思想是从翻译主体(不限于译者)角度,考量社会对翻译所建构的关系的认识,包括翻译与人的关系、翻译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即翻译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的关系等。翻译思想展现人们对“如何译”“译何为”“何为译”“翻译是如何说明人的本质的”“翻译是如何建构人类

文明的”“翻译如何影响其他社会因素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翻译的”等的观点。

3. 翻译思想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我国对翻译思想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正式兴起的。目前,我们还缺乏相应的方法论,基本概念尚未厘清,对翻译思想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翻译思想史与翻译史、翻译文化史、翻译理论史等领域以及与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翻译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足够的讨论。本节拟就中国翻译思想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

3.1 翻译思想研究的基本原则

研究翻译思想史,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史观,确立方法论原则,搞清楚翻译思想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翻译思想家与其所处时代的相互关系。开展翻译思想研究,我们应遵循语境化、动态观和整体性三原则。

3.1.1 语境化

思想作为思维活动的结果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30)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参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翻译思想(家)的产生及其活动,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个体的翻译思想或社会的翻译思潮为何会出现,为何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其原因可能很多,但究其根本,是个体或群体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思想史研究需要“把一个时代的思想归还给那一个时代”,“剥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胡适,1991:1084),对翻译思想的研究既包含了对翻译主体之思想内容的探索,同时也需要阐释具体翻译思想的产生与主体所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生存方式等的关系,需要将翻译思想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考量。

3.1.2 动态观

进行翻译思想研究,要把研究对象——个体(译者或其他翻译主体、翻译家、翻译思想家、翻译理论家)的翻译思想或社会的翻译思潮作为动态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首先,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无论是个体的观念,还是社会的思潮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其次,一种思想或思潮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群体或社会的翻译思想,也不能用刻舟求剑的方式来评价翻译思想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奈达(E. Nida),还是豪斯(J. House),他们的翻译观点前后都有过调整 and 变化。而玄奘的翻译思想在当前的实用翻译中并不能发挥其在佛经翻译时期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重翻译思想发生、发展的特征和逻辑必然性,即其存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

度,其反映时代精神内涵的情况,以动态的视角来展现思想主体思考翻译的深度变化和内在逻辑关联,以之揭示社会思想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边界。

3.1.3 整体性

首先,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之一,作为翻译思想主体的人,其翻译观念或对翻译的认识并不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发生的,个体的翻译思想也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它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群体、一个共同体、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反映。个体翻译思想有可能是超前的、超现实的,但任何具有超越性思想的发生都有着某种现实的依托和关联。其次,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与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密切相关。人的翻译思想与其文学观、审美观、伦理观、哲学观、文化观等是复杂联动的,人的各种思想是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我们在研究翻译思想时,必须将之与社会思潮联系起来,将之与该主体的其他思想联系起来,既考察翻译思想的内容,也考察其思想和理论的来源,以及其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主体的思想和思潮的相互关系。例如考察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就不能脱离其文学思想,而考察佛经翻译家的思想不能脱离其佛学思想。

3.2 翻译思想研究的基本方法

翻译思想研究作为翻译研究和思想研究的交叉领域,其基本研究方法也是翻译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融合。无论是思想史研究方法还是翻译研究方法,两者都十分庞杂,而作为两者的交叉地带,翻译思想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如下各种:

3.2.1 文本分析法

思想史学者张荣明(2007)在梳理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时,曾按照主流方法论将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了分期,述及思想史研究的哲学方法、史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文献法等。然而,哲学方法、历史理论方法实际上和历史文献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三者不是更替的关系,前两种分别采用哲学和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历史资料,最终要落实到文献上来。通常而言的文献是指图书、期刊、典章等记录知识的文字资料,即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本,因而文献研究是基于文本的研究。文本所记录的知识,需要分析和解读才能获取,即需要采用文本分析和解读的方法。文本分析法是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当前翻译思想史用得最多的方法。

文本通常指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话语,广义上的文本包括一切记录下来的资料——把人类的知识用文字、图形、符号、音像等手段记录下来的资料,包括书籍、手稿、报刊、文物、影片、录音录像、幻灯片及胶片等。文本分析指从文本的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深入到文本的深层含意,从而去发现和揭示由普通阅读所不能把握的思想和意义。在翻译研究中,文本通常指所有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抽象物(余小梅、耿强,2018:77)。文本之外,还有副文本。副文本指“围绕在作品周围,强化作品,并确保它

以某种形式得以呈现、被接受和消费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伴随形式”(耿强,2016:105)。

文本和副文本都是思想和意义的载体,是翻译思想的重要依托。翻译思想研究离不开对有关翻译思想主体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对翻译家的思想研究需要考察其翻译作品,从对翻译文本的分析中去了解翻译家的思想倾向,对翻译理论者的思想研究则主要考察其所发表的关于翻译的论述。除此之外,该研究还必须结合对副文本的分析,如相关论文、著作、随笔、个人日记、亲友书信、档案等多种形式的文本,甚至是器物、图像资料、方志、族谱和其他文献资料,来了解翻译思想主体的观念、知识和思想。

文本分析和解读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翻译思想主体的基本翻译观念。文本分析不能就文本论文本,将文本与其他要素割裂开来,而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思想来源,探究其翻译思想产生的缘由、提出的翻译观点及其发生的影响等。文本分析必须落实到文本之上,不能过度阐释,随意发挥,否则文本就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将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细致地梳理个体思想和社会思潮产生的渊源和背景,考察思想主体与时代发展趋势、与社会思潮演进之间的关系。

3.2.2 概念分析法

概念在思想史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对象,概念“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位’”(李里峰,2012:94)。概念分析也称术语分析,指分析和确定术语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方法。在逻辑学中,概念分析指运用逻辑方法澄清概念或观念的意义,它力图发现组成一个概念的要素和这些要素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也陈述某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给定概念之运用的充分必要的条件(彭漪涟、马钦荣,2010:479)。就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先哲的思想,是由他所使用的重要抽象名词表征出来的。因此,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徐复观,2001:1)。翻译思想史研究自然也脱离不了对概念的分析,对中国译学史上的重要概念、基本概念乃至一般概念本身的个案和系统清理,这对认知中国翻译思想的演变,透视不同时代翻译思想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意义重大。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大多以经文序跋形式书就,属于中国古代经史论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翻译领域的具体体现,因而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重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契合中国诗歌的性灵、妙悟,蕴意丰富。记载古代佛经译者翻译思想的资料杂糅、分散,话语表达灵活,范畴、概念的内涵模糊多义,如“五失本”之“本”,“本”在佛经翻译话语中不同的语境下,与不同的字、词搭配,形成了丰富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本”是“‘经’的物态化、具体化、书本化”(王向远,2016:68),即多数情况下被认为的“原本”或“原文”。也有学者认为,

“本”远非单指“原文”那么简单,还有至少源文本、原文文本、译文文本、主旨大趣、以及翻译过程等意思(刘朋朋、蓝红军,2019:134)。对概念不同的解读,也就产生对翻译思想的不同认识。

在古代概念、术语的分析辨识方面,中国传统训诂学可谓遗产丰厚,形训、声训、义训是训诂学中最基本的训释词义方法。从训释的手段来看,形训指以说形来训义,声训指沿声音线索寻找同源词来训义,义训指直接用意义之对当来训义(王宁,1996:109),三者皆十分常见。钱锺书在《译音字望文穿凿》一文中例举了很多有趣的形训,如“‘曾人’为僧,‘弗人’为佛,‘需人’为儒;此就‘佛’字之形以攻异端也”,“‘僧’系‘曾人’;曾不為人者,为僧可乎”等(罗新璋、陈应年,2009:142)。声训的训释词显示词源意义,是用音同、音近、音转的字来解释词义,例如,赞宁在《义净传系辞》中说,“系曰: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译所无也”(罗新璋、陈应年,2009:92)。义训的训释词显示实用意义,如唐代贾公彦对翻译的疏解,“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1999:901)。

在对传统译论的研究中,训诂释义的方法是常见而必需的,如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中就以对汉代文字学学者许慎关于翻译的训诂开始(钱锺书,2002:77),他关于“化”与“讹”的辨析也是一段精彩的训诂。甚至可以说,没有传统训诂学的训练,就无法把握中国古代翻译家和翻译论者的思想精华。现代社会语言学也十分重视对词语、概念、术语的分析,即对某一特定概念、术语的构成、含义、使用,以及词语的产生过程、文化意义、社会因素、使用环境、认知解读等进行分析。和传统训诂学相比,现代社会语言学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更加注重其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即其观念意义。

3.2.3 心理分析法

郑大华(2013)在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时,对心理分析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心理分析作为研究方法,来自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在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中心理现象和心理变化的方法的统称。它通常包括三个层次:社会分析、个体分析和人际分析,其具体方法包括因素分析、心理实验、类型分析、观察法等(秦勒等,2004:1-2)。心理分析是基于社会行为主体心理与外在诸因素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假设,通过对主体行为和主体心理形成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分析主体心理形成的原因与发展变化的规律。目前,心理分析并非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而是广泛地被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采用。思想史研究者也将之用于分析思想家的思想形成过程。

翻译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其产生除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状况(包括生产力发展状况、生产关系和社会存在)之外,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个人的心理、性格、气质、情感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而,研究翻译思想,必须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心理认同、精神状态等对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因翻译思想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分为对译者/翻译理论家个体的心理分析、对译者/翻译理论家群体或社会的心理分析和对译者/翻译理论家之间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心理关系的分析。心理是比行为更为深层的东西,却通常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翻译思想研究的对象是“人”,社会心理分析中的精神分析法和需求动机理论等都值得借鉴。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译者群体,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方面的共性,群体心理分析因而能有效地解释译者群体和社会的翻译思潮的发生和变化,例如,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译者群体的翻译动机的分析,可以很好地揭示那一时期翻译思想的动态。

3.2.4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基于比较研究也形成了相应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如比较文学、对比语言学、比较教育学、比较社会学、对比法学等。比较思维是翻译的基本思维,翻译研究中也经常采用对比研究,基于文字(不同语言的文字)、文本(原文和译文、不同的译文)和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对比是翻译研究赖以存在的基本方法。

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比较无处不在,谭载喜(1998:11)呼吁“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还在其《翻译学》著作中明确地提出“比较译学”作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指出比较译学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①对不同翻译传统、不同译论体系中出现翻译思想、理论以及翻译方法、技巧等进行比较研究;②对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比较(谭载喜,2000:171-182)。这不仅意味着比较研究是翻译学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意味着进行中西翻译思想的对比研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已有的翻译思想研究中不乏采用比较研究法的成果。如吴义诚(1998)对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比较,指出了中西译论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刘宓庆(2005)更是全面系统地对中西翻译理论在发展沿革及模式方面进行了对比。张梦井(2007)则从东方人和西方人翻译思维模式差异的角度讨论了比较翻译的五个层次:思维共核、人类不同思维方式、文化差异、语言习俗、心理特征。另外,曾文雄(2013)针对中西译学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中西译论接受、融合与创新的途径,力图揭示中西译论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动因。

就翻译思想的研究而言,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种: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所谓纵向比较,即历时比较,是对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主体进行比较与评述,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照,以揭示他们思想的传承性和原创性,例如,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佛经翻译思想的流变和发展。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时,不能先入为主地批评和断言,用现在的认识去规定或苛责前人,而应充分描写出一定的翻译思想出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思潮,应着重揭示翻译思想历时变化的规律性特征,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横向比较即共时比较,是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对同一时代不同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比较,以考察谁的思想更符合时代主题,更贴近社会的

需要,更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从而对他们的翻译思想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横向比较也可以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域(国家)翻译思想主体之间进行。

在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比较的对象是一般现象还是特例现象,是整体还是部分,要特别注意被比较的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比较的对象没有可比性,进行比较就得出有意义的发现或结论。

3.2.5 其他方法

翻译思想研究除了文本分析、概念分析、心理分析、对比研究之外,还因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不同采取其他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翻译思想研究与其他学科常出现研究对象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因而也常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翻译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有着研究视域的共同之处(卢茜、何克勇,20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群体、民族、人类的语言与文化中包括了其翻译思想,而翻译思想研究又是翻译研究的当然组成部分,因而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也是翻译思想研究者经常采取的路径。

文化人类学使用考古学、民族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理论、概念、资料,对各民族进行描述和分析,具体而言,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民族叙事、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等是文化人类学常用的具体方法。近年来,翻译思想史研究借鉴和采用上述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马晶晶(2019)采用民族志方法,对美国学者本德尔(Mark Bender)进行了深度访谈,回顾其与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合作18年翻译彝族创世史诗及其他诗歌的过程,揭示了他的“万物志”(cosmographic)翻译思想。

田野社会调查方法对翻译思想研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针对具体翻译主体翻译思想的研究中,首先要收集到原始、鲜活的资料,而有一些副文本藏于民间,获取这些资料,可以与图书馆藏的文本史料形成互补互鉴,从而扩展和丰富思想史资料的范围和种类。同时,结合对资料拥有者(通常也是所研究对象的亲友或有交集、交流的相关人员)的访谈,可以还原历史现场,增强研究的现场感,更接近研究对象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和氛围,体会、再现和理解研究对象的所为、所思、所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聚焦于对个体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研究,这是翻译思想研究中常见的,但这并非方法论意义上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已广泛运用于许多学科领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翻译学研究中的“个案”指“现实生活中与笔译或口译相关的且只可在其所处的情境(context)中才能对其加以研究或理解的活动、作品、人物等个体”,而个案研究便是“对一个或多个个案在其所处的情境中进行深入、详细和全面考察”的一种研究方法(Susam-Sarajeva, 2009: 40)。在翻译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具体化、精细化的个案深描方式,在较长时间内对某一特定案例进行调查,广泛系统地收集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解释、推理过程,以揭示其普遍性、代表性的意义。

与其他学科进行研究方法的融合,可以拓展翻译思想研究的视野、史料和论域,使翻译思想研究从偏重于展示翻译思想主体对翻译的语言过程中技巧与规律性特征的认识,逐步转向探究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生活、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以及时代性的哲学思潮,从狭义的译作与原作的文本对比,转向借助文化文本的研究途径,探究翻译思想的内部与外部多元构成。

4. 结语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跨学科交融是翻译思想研究的重要趋势,翻译思想研究不限于翻译之“道”,翻译思想研究固然需要解读翻译家的译作,研究其翻译技巧、策略背后的“某种原则”,但只有当文本解读方法与翻译思想存在的依据联系起来,揭示翻译思想观念的来源、意蕴、对人的历史活动的影响时,才能开拓出翻译思想研究更新更广的局面。翻译思想研究必须关注翻译思想观念对一定时代背景下人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的反映,必须注意考察翻译思想家提出其思想观念的主观心境与深层动机,并对其翻译思想观念的价值层面加以发掘。

参考文献

- [1] Susam-Sarajeva, Sebnem. The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09 (1):37-56.
- [2]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3] 耿强. 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5):104-112.
- [4]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 [5] 黄忠廉. 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77-81.
- [6] 李里峰.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5):92-100.
- [7]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8]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9] 刘朋朋,蓝红军. 佛经翻译方法论[J]. 中国文化研究, 2019(1):133-143.
- [10] 卢茜,何克勇. 翻译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共同视域[J]. 南方文坛, 2017(3):15-18.
- [11] 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 [12] 马晶晶,马克·本德尔. 口头文学翻译中的“万物志”及合作翻译——马克·本德尔教授访谈录[J]. 东方翻译, 2019(1):62-66.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穆雷,蓝红军. 互鉴与阐发——翻译学建设中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G]//任东升. 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构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338-358.
- [15] 彭漪涟,马钦荣. 逻辑学大辞典(修订版)[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16] 钱锺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17] 邵有学. 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考辨[J]. 中国外语, 2018(2):99-105.
- [18]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9] 泰勒,佩普劳,希尔斯. 社会心理学(第十版)[M]. 谢晓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0] 谭载喜. 翻译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1] 谭载喜.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J]. 中国翻译, 1998(2):11-15.
- [22]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第二版)[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 [23]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 [24] 王宁. 训诂学原理[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 [25] 王向远. 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J]. 广东社会科学, 2015(5):151-158.
- [26] 王向远. 中国古代译学五对范畴,四种条式及其系谱构造[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67-80.
- [27] 吴义诚.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3):48-52.
- [28] 夏登山,邵有学. 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2):72-77.
- [29]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30] 许钧,宋学智,胡安江. 傅雷翻译研究[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6.
- [31] 余小梅,耿强. 视觉文本翻译研究:理论,问题域与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3): 77-86.
- [32] 曾文雄. 哲学维度的中西翻译学比较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 [33] 张梦井. 比较翻译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34] 张荣明.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J]. 学术月刊, 2007(4):121-124,133.
- [35] 郑大华.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J]. 河北学刊, 2013(5):1-7.
- [36] 郑意长. 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朱晓云

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百年译介综论

刘锦晖 文 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本文以我国著名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及其词作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时性维度和阶段性译介特点为线索,梳理了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近百年的英译历程,将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零星译介;20世纪下半叶译介全面繁荣;21世纪至今译介依旧活跃,译本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转译、选译、全译、复译之后,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此外,李清照词的百年译介也为未来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李清照词;英语世界;英译

A Review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Qingzhao's *Tz'u* Within One Hundred Years in English Countries

LIU Jinhui WEN Ju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Qingzhao's *tz'u* and other works in English countries. Synchronicall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of Li Qingzhao's *tz'u* goes through three periods, each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Qingzhao's works began in the 192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a few English translations produced. Nevertheles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translation of Li Qingzhao's work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ranslators are as active as before in translating Li Qingzhao's *tz'u* and produce translations with new features. Nowadays Li Qingzhao's *tz'u* has already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古诗英译策略的系统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17AYY001)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数据库的汉语古诗英译史研究”(19YY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锦晖,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 军,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翻译学、英语课程与教学研究。

took a canonic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Furthermore,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Li Qingzhao's *tz'u* brings several valuable research subj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Li Qingzhao's *tz'u*; English countries; English translation

0. 引言

李清照(1084—1155?),自号易安居士,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在词、诗、文等方面成就卓著。她的作品存世量少,徐培均(2002:1)在《李清照集笺注》自序中记载“词不过五十阙左右,诗也仅存十四首,文还不足十篇”。尽管如此,其诗词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古今中外诸多的学者研究。

英语世界对李清照的了解始于翻译。李清照词英译发端于20世纪早期,到目前为止已有近百年的历程。国内有学者对李清照在国外的译介情况进行过梳理,郦青(2009)在其研究中根据掌握的文献将英语世界中李清照词英译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开始翻译,七八十年代进行全面介绍,90年代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地位得到稳固。涂慧(2014)在中国古典词译介研究中梳理了李清照在西方的传播,她将传播过程大致划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的译介,20世纪上半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播及经典化。也有论文介绍李清照诗词在美国英译和研究现状(季淑凤、葛文峰,2013)。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与文献资料。不过由于译本搜集困难等原因,已有研究难免有些遗漏,如郦青(2009)的研究中没有找到王叔升的全译本,也没有提及何赵婉贞(Lucy Chao Ho)的译本。涂慧(2014)的研究中也并未收入冰心和魏骄(Wei Djao)的译本,并且译本信息也有个别不准确之处。

笔者通过多途径检索,如国家图书馆、Amazon 网络电商、Worldcat 联机书目数据库等,对李清照英译本和研究进行了最新搜集和统计。目前笔者掌握到英语世界中李清照诗词英译本60余部,其中专集译本10部,包括5部全译本^①。在掌握一手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对李清照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希望对已有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为未来李清照英译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本文以译本的历时性为纵轴,以阶段性译介特点为横轴,将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的零星译介。此时英语世界对李清照的关注度不高,译本少,诗词译介数量低;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下半叶,李清照译介呈现出繁荣局面,且一跃成为英语世界备受重视的中国词人;第三阶段是21世纪至今,新颖的专集译本、选译不断涌现,同时20世纪的经典译介也在不断发出回响。

1. 20世纪上半叶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英语世界对词的认知比诗要晚,“与最早于1815年公开出版的由英国汉学家马

礼逊翻译的唐诗英译诗篇相比,宋词的英译晚了约一个世纪”(涂慧,2014:17)。在20世纪初,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古诗显示出浓厚兴趣之际,李清照词才随之开启了译介之旅。

1.1 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译介肇始

1918年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all)的汉语古诗英译本*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出版,该译本转译自法国女作家朱蒂斯·戈蒂埃(Judith Gautier)的法译本《玉书》(*Livre de Jade*, 1902)。《玉书》选译李清照词6首,怀特只从中选了1首。

冰心于1926年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完成其硕士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这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李清照英译专集。冰心翻译了25首词和李清照的《词论》。论文中还包括词人小传以及对易安词文体、韵律的总结,可以说冰心的论文也是英语世界中最早对李清照的研究。她的翻译得到其导师劳拉·希伯·露密斯(Laura Hibbard Loomis)教授的首肯。1930年,露密斯在美国诗歌期刊*Poet Lore*第41卷发表文章“A Chinese Sappho”,刊发了冰心所译11首李清照词,大为赞赏她为英语世界读者贡献的首部李清照词译本。

1.2 英语世界最早收录李清照词的早期诗词选译本

1933年英国翻译家克拉拉·坎德琳(Clara M. Candlin)的英译本《风信集:宋代诗词歌赋选译》(*The Herald Wind: Translations of Sung Dynasty Poems, Lyrics and Songs*)出版,胡适为译本撰写前言,对词进行了介绍。本诗集共收录28位诗人共计79首诗词,以词为主,其中李清照词两首。

紧随其后,1937年英国又出版了由中国译者初大告(Ch'u Ta-kao)翻译的《中华隽词》(*Chinese Lyrics*)。译本共选译53首词,主要为宋代词作,其中李煜词10首,柳永词2首,苏轼词8首,辛弃疾词7首,李清照词选译了《武陵春》。译本很受英语读者欢迎,仅在一年内就出版印刷两次。

1949年,美籍英裔作家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选编的《白驹集:从古至今中国诗选》(*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ly Translated*)在伦敦出版,该诗集选译了从《诗经》一直到近代的诗歌,其中收录李清照词3首。白英旅居中国多年,不过他对汉语并不是十分精通,该译本是由他组织中国学者们翻译,如卞之琳、袁家骅等,李清照的词由陈衡哲翻译。

1.3 20世纪上半叶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古典诗歌中的诗、赋、骈文等,并主要是唐代以前的作品。”(Liu, 1975:22)20世纪前半叶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规模小,为零星译入,承担翻译任务的也大多是由当时在英美留学的中国学者完成的,如冰心、初大告等。

早期可供译者参考的李清照相关资料匮乏,这一方面影响了译介的模式,另一方面也使译者无法完整地翻译她的作品。怀特尔的转译本便是如此,他所选的这首词《浪淘沙·帘外五更风》并非李清照最经典的作品。冰心的翻译也可谓从零开始,因缺乏最新的研究材料,她翻译时所参考的文献就较为有限:底本是1881年王鹏运辑刻的《漱玉词》,李清照个人生活相关信息是由12世纪的四份文献中收集来的,且无前译本可资参照。

此外,这些早期译文在有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美国汉学家施瑞奥克(Shryock)曾对坎德琳译本的副标题提出质疑,他认为:“Poems, Lyrics and Songs 三个术语并置在一起会误导读者认为所有的汉语诗歌形式都可以归为词,并可以配上乐曲演唱。”(Shryock, 1934:316)《风信集》和《中华隽词》中的词译文并没有将词牌名译出,而是由译者根据词文主题另拟题目,如《中华隽词》中选的李清照词是《武陵春·春晚》,而译文的题目则是“*Weighed Down*”。瑕不掩瑜,早期译文对李清照词的译介具有首创之功。研究者 W. Y. Yu(1935:367)称赞“《风信集》在众多将中国诗歌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尝试中具有地标作用”。在英国留学的中国诗人蒋彝(Chiang Yee)也给予了《中华隽词》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译本无疑会吸引广大诗歌读者,尤其是对中国古诗感兴趣的人。他还特别强调在这53首词中选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的词”(Chiang, 1939:278)。

2. 20世纪下半叶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研究蓬勃发展,“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中国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从汉学下的一个分支逐渐独立出来”(Liu, 1975:22)。同时多元文化思潮登陆美国,如解构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这些都为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译介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为了清晰地呈现该阶段译本的产生脉络,下面我们将20世纪下半叶分为两个时间段来分而述之。

2.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美国“词”学研究的兴起,李清照词也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译介。60年代美国相继产生了三种李清照词英译专集。

1962年华裔学者许芥昱(Kai-yu Hsu)在西方批评界颇具权威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LMA)第77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李清照词”(The Poems of Li Ch'ing-Chao)一文,文章中选译了李清照20首词。

1966年美国特怀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 Inc.)出版了由台湾学者、诗人胡品清译著的《李清照》(Li Ch'ing-chao),这是一部详细介绍李清照生平及诗词艺术特色的研究专著,同时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李清照词全译本。译著用四个章节分别介绍历史背景、李清照的生活经历、李清照的作品及其词作的特点与价值,共译李清照词54首,诗2首。李清照是特怀恩系列丛书从中国文学家中选出的第一个推介给西

方读者的中国诗人,汉学家毕晓普(John L. Bishop)(1968:166)认为:“研究女词人李清照是很有必要的,将李清照作为研究对象是特怀恩出版社明智的选择。”

1968年华裔学者何赵婉贞的译著《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生平与作品》(*More Gracile Than Yellow Flowers: The Life and Works of Li Ch'ing-chao*)出版,此书是她在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何赵婉贞选了44首李清照词,实际翻译了43首,其中《满庭芳》(芳草池塘)因为底本中内容有残缺,所以没有翻译。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在前言中称赞其翻译忠实于原作。

这些专集译本不仅让英语读者欣赏到了李清照的词作,同时也是较为详尽的李清照相关研究。许芥昱在译文中结合李清照的生活境遇变化分析她不同阶段的词作风格。胡品清在译本中先是介绍了李清照所在的时代背景,将李清照的生活经历与诗歌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李清照生平与历史资料成为每首诗词的“背景知识”(季淑凤、葛文峰,2013:79)。何赵婉贞的译本与冰心的译本在体例上非常相似,对李清照的生平、词学成就和作品的流传做了更为详尽的介绍。这三本专集译作在奠定李清照在国内外汉学研究中的地位、推动英语世界的李清照研究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专集译本,李清照词还进入英语世界众多诗词选集本和一些知名中国文学选集中。1956年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本《中国诗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中第二部分是宋代诗词79首,其中李清照词7首。雷氏作为美国旧金山文艺复兴诗歌运动的旗手,他的这一译本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备受瞩目,至1971年共印刷25次,而这只是雷克思罗斯译介李清照的开端。

美国译者库克(C. H. Kwock)和文森特(Vincent Mchugh)在《何意栖碧山:中国古诗30首》(*Why I Live on the Mountain: 30 Chinese Poems from the Great Dynasties*, 1958)中选译了一首《武陵春》,随后又在《淑女与隐士:30首中国诗》(*The Lady and the Hermit: 30 Chinese Poems*, 1962)中翻译了李清照词20首。1961年林语堂的《古文小品译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在美国纽约出版,其中选译了李清照词《声声慢》以及散文《金石录后序》,这是李清照的散文作品第一次被译成英文。

1965年英国出版了登勤(Duncan Mackintosh)和诗人艾伦·艾林(Alan Ayling)合译的《中国词选》(*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该译本以宋词为主。选李煜词19首、苏轼词6首、辛弃疾词4首、李清照词2首。

1965年在纽约出版了由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编撰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至14世纪》(上卷)(*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选集收录了8首李清照词,包括这一时期库克和文森特翻译的5首,许芥昱翻译的3首。该文学选集中宋代词人只收录了苏轼和李清照的作品。“它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将宋词收入的具有文学史性质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集。”(涂慧, 2014:54)该选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各大学东亚文学课程、中国文学课程

最常用的课本。1966年由著名华裔汉学家柳无忌(Liu Wu-chi)撰写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该著作精选李清照前期和后期代表作两首。毕晓普教授评价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是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最好的一本介绍性研究”(Bishop, 1967:483)。

2.2 20世纪后30年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进入20世纪的后30年,李清照词译介更是风生水起,新的译本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李清照词英译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77年美国诗人丽诺尔·梅休(Lenore Mayhew)和美国汉学家威廉姆·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合作翻译了《如梦:李清照漱玉集》(*As Though Dreaming: The Tz'u of Pure Jade by Li Ch'ing-chao*),译李清照词51首。译者对译文的安排匠心独具,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体验,译者放弃了按照主题或者原作顺序来安排译文顺序,采用“小说传记体”(fictionalized biography)来编排译文,将51首词分为了10个章节,章节名也极富诗意,如“柳絮”“西风”等。

1979年雷克斯罗斯和钟玲合译的《李清照诗词全集》(*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出版。这是英语世界中译介李清照诗词最多的一部译本,全译诗词共计67首,其中词50首,诗17首。之前出现的专集译本多是按照李清照生平对诗歌进行编年排序,雷氏译本采用了不同的安排体例,将李清照作品分为七个主题。这也是对李清照作品的一次全新阐释,众多评论者对雷氏和钟玲的译本赞不绝口。该译本也完成了雷氏翻译李清照的夙愿,他在该全集译本之前还陆续译有《爱与流年:续中国诗百首》(*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Chines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70),其中选译李清照词6首,和《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 1972),其中选译李清照词5首,诗2首。雷氏对李清照的持续译介为李清照诗词在英语世界的成功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McLeod, 1981; Tsai, 2008)。

1980年出现了民间译者凯瑟琳·克里芙斯·戴蒙德(Catherine Cleaves-Diamond)翻译的《李清照词选译》(*Selected Tz'u Poems of Li Ch'ing-chao*)。该译本体例简单,译者采用自由体诗选译了李清照42首词。

1984年美国出版了由当代诗歌翻译家詹姆斯·克莱尔(James Cryer)翻译的《梅花:李清照词选》(*Plum Blossom: Poems of Li Ch'ing-chao*)。译本收录李清照词55首(其中43首是李清照本人词作,12首存疑词)。克莱尔的译文独树一帜,他没有将词译成较为齐整的英语自由体诗歌的形态,译文也没有和原文词句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创造性地仿照汉语诗歌那种语义、意象叠加的铺排方式,并且译文不加标点,在视觉上创造了一种行云流水的观感。

1989年美国汉学研究刊物《中国柏拉图文库》(*Sino-Platonic Papers*)刊出了中国本土译者王椒升翻译的《英译李清照全词》(*The Complete Ci-poems of Li Qingzhao into English*),译李清照词55首。该刊物主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

梅维恒对王椒升的翻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译本前言中称赞王椒升的译本是他读过的最精美、最富有情感的中国古诗译文。王椒升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出于对英语的热爱,他始终未放弃英语学习,并尝试文学创作与翻译,是一位民间的诗词翻译家。

除了以上五种专集译本,选译李清照词的诗词选集数量在这30年间也是达到了一个高潮,诗、词、文学选集有30余部,而且收录李清照作品的数量也很可观。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译本。

雷氏的选集已经在上文介绍过,除此之外,由著名华裔汉学家柳无忌、罗郁正编写的《葵晔集:汉诗三千年》(*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975)中收录了13首李清照词,这些词由美籍华裔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翻译。在1984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古代到13世纪》(*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中,华滋生(Burton Watson)选译了李清照4首词。同年,美国诗人萨姆·哈米尔(Sam Hamill)在诗集译本《爱莲人:子夜与李清照》(*The Lotus Lovers: Tzu Yeh: Li Qingzhao*, 1984)中选译了李清照词10首,又在《夜游:汉诗英译》(*Night Traveling: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85)中选译了2首。

1994年,美国出版了朱莉·兰道(Julie Landau)翻译的《春之外:宋词》(*Beyond Spring: 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其中译李清照词15首,仅次于苏轼和辛弃疾。这也是英语世界宋词英译本中收录李清照词最多的一部。朱莉在诗人简介中评价李清照是和苏轼、辛弃疾齐名的宋代伟大词人。199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了由美国著名学者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和苏源熙(Haun Saussy)编撰的《中国传统女诗人》(*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该译本的目的是让英语读者了解古代中国女诗人的才情与诗词创作的成就,其中李清照词最多,共计24首,由欧阳桢翻译。

在诗词选集之外,李清照的作品在文学选集中的收录数量也是持续走高。美国汉学家威廉·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编著的《中国文选》(*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74)中收录了李清照6首词,分别是丽诺尔·梅休译的4首,库克和文森特译的1首,麦克诺顿自己译的1首。1994年梅维恒编撰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中收录了王椒升翻译的李清照词10首。这是英语世界文学选集中第一次选择中国本土译者的李清照词译文,并且收入量也是文学选集中最大的。1996年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其中选译苏轼和李清照各4首词作,并且将之前所译的《金石录后序》也一并收入^②。

2.3 20世纪下半叶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译介特点

这一阶段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共计产生了8部

李清照专集译著,其中全译本3部,收录李清照的诗词选集译本更是有近40部之多。至此,不仅李清照的词作都有了英译本,其经典词作更是不断被复译。从零星散译至全译再到复译,这是多数经典作品的译介历程,李清照也终于成为绽放在英语世界的一朵异域奇葩。

此阶段参与李清照词译介的译者身份也呈现出多样化,首先华裔及港台学者是译介主力,随后美国译者异军突起,美国诗人、汉学家甚至民间译者都在积极译介李清照的作品,并且中国本土译者的译本也广受好评。同时,译本形式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如胡品清的译本集传记与翻译为一体,胜在对李清照的精细研究。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评价胡品清的译介专著,“直到今天,这本传记还是英语世界中唯一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李清照研究”(Egan, 2013:303)。何赵婉贞的译本不仅中英对照,还为汉语原文加注威氏拼音。雷克斯罗斯和钟玲的译本采用了主题式编排,并突出译文的诗歌气质。克莱尔的译本插入主题画,为译本营造诗画意境。梅休和麦克诺顿的译本则采用“小说传记体”,极具故事性。王椒升的译本中英对照,质朴传神。多样态的译文无疑提高了李清照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让更多读者认识到李清照词的文学价值。

李清照词的译介无疑促进了英语世界对李清照的深入研究。胡品清在评传中将李清照词作风格与美国诗人狄更生(Emily Dickinson)、卡明斯(E. E. Cummings)、庞德(Pound)等进行对照,对比中西诗学的异同,凸显李清照诗词风格的独到之处。著名华裔比较文学学者余宝琳(Pauline Yu)撰写了专题文章“Li Ch'ing-chao and Else Lasker-Schüler: Two Shattered Worlds”(1983),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将李清照与德裔犹太女诗人艾尔瑟·拉斯克-舒勒(1869—1945)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者在作品风格上的相似性。

3.21 世纪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21世纪的近20年,英语世界中李清照作品的翻译活动依旧很活跃,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新的专集译本、选译不断涌现,同时20世纪的经典译介也在不断发出回响。

3.1 新的专集译本

2010年加拿大华裔译者魏骄的专集译著《此花不与群花比:李清照》(*A Blossom like No Other: Li Qingzhao*)出版。译著翻译了李清照27首词、7首诗和部分诗词片段,此外还对李清照重要的其他作品另辟专节予以详细介绍,如《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图经序》等。这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又趣味横生的译著,第一章中对李清照现存的作品及版本进行了梳理,这是之前的专集译本中所少有的内容,在后面译文中对于存疑的词作或有关问题,译者都会引用已有的考证来进行说明,比如译者对历史上李清照的再嫁问题所存的争议也予以详尽说明。除此之外,这本译著还是一本非

常有趣的文化读本,译者在介绍李清照生平的同时增加了大量对中国宋代文化不同层面的详尽说明,如第一章中介绍了宋代人的姓名本例、传统纪年和民族概况;后面章节中介绍了有关秦桧的故事、打马游戏等。这些内容都不曾在前译本中出现过。更新颖的是译著最后一章,译者将李清照穿越到现在,并以第一人称亲述自己的故事。

3.2 诗词选集中的选译

21世纪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已经稳稳占有一席之地,并开始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2002年第二版《诺顿世界文学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该选集宋代部分只收录了由宇文所安翻译的李清照6首词作和《金石录后序》。这也意味着李清照的作品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除此之外,很多新出版的诗集中也纷纷大量收入李清照词作。

2003年《新向中国古诗选集》(*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在美国出版,其中收录了雷克斯罗斯翻译的13首李清照词,李清照再次成为宋代入选作品最多的诗人。2005年美国现代诗人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和华人周平主编的《阿克词典:中国诗》(*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出版,选译李清照词9首,在选译的宋代诗人中数量仅次于苏轼。2006年,美国学者、诗歌翻译家西顿(J. R. Seaton)编译了汉诗译本《仙芭拉中国诗选》(*The Shambhala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诗选收录克莱尔曾经所译8首李清照词。

3.3 21世纪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

“译本是不不断生成的过程,每一次复译都是向新颖性迈进的一步,都是在译语语境中的文化创新。”(谭莲香、辛红娟,2017:137)进入21世纪后李清照词译者的身份较前一阶段有了变化,译者魏骄是生活在北美的第二代华裔,她尽力通过自己的翻译将中国文化带给当下的英语读者,她坦言其翻译目的就是“让英语读者去欣赏李清照以及她优秀的作品,同时消除大众媒体带给英语读者的中国古代及现代女性固有印象(stereotypes)”(Wei, 2010:3)。托尼·巴恩斯通和威利·巴恩斯通(Will Barnstone)则是新时代的美国诗人,他们要通过新的翻译开启中国古诗与现代英语读者的对话。

对话已然开启,李清照诗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为英语诗歌的创作带来了灵感。创作者不断有以李清照为题或受李清照诗词启发而创作的诗歌发表。1986年,米娜·亚历山大(Meena Alexander)在*Journal of South Asian Literature*期刊上刊登了一首诗“Poem to Li Ch'ing-chao”。安妮·科莱(Anne Coray)发表在期刊*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2003年第21卷第一期的一首诗“*Away from the Dayshift's Bullhorn and Dazzle*”中直接引用了李清照的两句诗,译文选自罗伯特·白英汇编的《白驹集》。美国诗人詹尼弗·阿特金森(Jennifer Atkinson)2007年在*The Missouri Review*第30卷第三期发表了诗歌“*Remembering Rexroth's Li Ch'ing Chao in Cordova, Alaska*”。这类诗歌创作是李清

照诗词在英语世界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

4. 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冰心的第一个李清照专集译本到现在,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程,有 60 多位译者翻译过李清照的作品,他们对李清照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众多译本也带来了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4.1 “如何译”的问题

首先词与诗在形式上差异较大,加之李清照词特有的细腻而敏锐的艺术个性,其翻译也就对译者提出了较高要求。如何跨越中西时空与文化障碍,将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质和精神内涵传递给英语读者是诸多译者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

冰心(2012:189-190)认为法译本《玉书》和《宋词选》中的李清照词“未能取得中国人所理解的原著的精确程度”,所以她在翻译李清照词时尽力做到“保持原诗中经常引喻的古代人名和风俗习惯的风韵,尽量保持词的情态”。华裔学者荣之颖(Angela Jung Palandri)在评析雷克斯罗斯和钟玲译本时提出为了移除存在于中国古诗与当代西方读者之间的时空障碍,译者对原文的调整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将一些很具体、细微的表达转换为较为模糊的表达,比如一些异质意象(exotic imagery)等;这样的自由度是可以接受,且是必要的,能够移除横亘在西方读者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理解障碍(Palandri, 1981:270-271)。著名华裔学者罗郁正在为《英译文学作品百科全书》编写的“李清照”词条中对比了李清照部分词句的几种英译文,并指出:“中国古诗的翻译必须避免用呆板的翻译方法,既不能夸大异国情调,也不能一味顺应译入语。”(Lo, 2000:844;译文转引自郦青,2009:38)

除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未来研究也要加强翻译策略的探讨。“翻译策略研究与翻译实践联系非常紧密,除对翻译策略的理论研究外,针对各种文体的研究颇有必要。”(文军、陈梅,2016:97)将来的研究应该对词的翻译策略多做针对性研究,总结已有译文翻译策略的得失和规律,为未来的译者提供借鉴。

4.2 李清照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建构

耶鲁大学学者刘裘蒂(Ch'iu-ti Judy Liu)在谈到李清照词复译本的价值时说道:“每一种译文都赋予原作以生命,同时新译本的内在价值之一就是与原作的不同阐释。”(Liu, 1991:154)到目前,英语世界产生的李清照诗词专集译本已经有 10 部,收录李清照词的诗词选译本也逾 60 部,在不同的译文中,读者读到的李清照以及她的词作也是有差异的,可以说译本发挥着建构李清照形象的重要作用。勒菲弗尔(Lefevere)(1992:ii)曾提出:“翻译即为‘改写’,翻译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学创新的历史,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建构的历史。”而李清照的很多译本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译文,里面还有译序、传记以及注释等大量的副文本信息。未来研究可以系统探

究各译本与李清照在英语世界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等重要因素,将李清照诗词英译放置在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观察。

5. 结语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代表,其译介和研究都有重要价值。本文分析了李清照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从20世纪20年代起,李清照及其作品才开始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转译、选译、全译、复译之后,李清照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地位得以确立。英语世界对李清照及其作品的研究也从无到有,并逐步深入。推动李清照作品成功译介的是英语世界众多不同身份译者的不断翻译尝试,是英语世界汉学、中国学、词学、诗学等发展的推动,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李清照词百年英译历程的梳理,我们也发现了进一步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李清照词英译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一研究课题,为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传播贡献力量。

注释

- ①李清照词的存留数量在学界并没有定论,再加之有存疑词,故笔者将译50首以上的译本视为全译本。
- ②宇文所安译《金石录后序》最早见于1986年出版的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p. 80-98。

参考文献

- [1] Bishop, John L. Review on Li Ch'ing-chao by Hu Pin-ching[J]. *Books Abroad*, 1968(1):166.
- [2] Bishop, John L. Review on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by Liu Wu-chi[J]. *Books Abroad*, 1967,41(4):482-483.
- [3] Chiang, Yee. Review on Chinese Lyrics by Ch'u Ta-kao[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39(2):278-279.
- [4] Egan, Roland.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 [5] Lo, Irving Yucheng. An Introduction to Li Qingzhao[G]// Olive Classe (ed.). *Encyclopedia of Literat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London: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0(1):844-846.
- [6]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Roueledge,1992.
- [7] Liu, James J. Y.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5,35(1):21-30.
- [8] Liu, Ch'iu-ti Judy. Review on The Complete Ci-Poems of Li Qingzhao: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iaosheng Wang and Li Qingzhao[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91(13):151-154.

- [9] Mcleod, Russell. Review on Complete Poems by Li Ch'ing-chao[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1(1):174.
- [10] Palandri, Angela Jung. Review on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mes by Kenneth Rexroth and Ling Chung[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81(2):267-271.
- [11] Shryock. J. K. Review on The Herald Wind[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4(3):316.
- [12] Tsai, S-C Kev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 With a Forked Tongue[G]//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2008:170-180.
- [13] Wei, Djiao. A Blossom like No Other: Li Qingzhao[M]. Toronto:Ginger Post Inc. , 2010.
- [14] Yu, W. Y. Review on The Herald Wind[J]. Pacific Affairs, 1935(3):365-367.
- [15] 冰心. 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G]//卓如,编. 冰心全集(第三版第二册).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189-225.
- [16] 季淑凤, 葛文峰. 彼岸的易安居士踪迹:美国李清照诗词英译与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3(6):78-82.
- [17] 郦青. 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18]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 李清照集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9] 谭莲香,辛红娟. 再论典籍复议的必然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5):132-138.
- [20] 涂慧. 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21] 文军,陈梅. 中国汉语古诗翻译策略体系研究[J]. 中国翻译, 2016(6):92-98.

责任编辑:冯 革

词汇语义的语料库量化研究： 行为特征分析法

吴淑琼¹ 刘迪麟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2. 阿拉巴马大学 英语系, 美国 35487)

摘要: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分析法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量化的手段揭示词汇在形态、句法、语义、功能等各个层面的特征,并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揭示词语的语义结构和用法模式。行为特征分析法在国外已成为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国内对该方法的关注尚显不足。本文对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阐述其产生的背景、理论基础和操作过程,并综述该方法在词汇语义中的相关应用,评析其优势和不足,以期推动该方法在国内语言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行为特征;词汇语义;语料库;量化分析

Quantitative Corpus Methods for Lexical Semantic Studies: Behavioral Profile Analysis

WU Shuqiong LIU Dilin

Abstract: The 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analysis, one type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analyses the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semantic, pragmatic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lexical items by using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evaluates the data using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t aims to display the semantic structures and usage models of lexical items in actual data. The behavioral profile analysis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in the lexical studies abroad, but it is not adequately addressed in China.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is method systematically by reviewing its backgr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ocedure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反义关系认知研究”(18XY003)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同义关系研究”(19JD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淑琼,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词汇语义学研究。

刘迪麟,男,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教学、认知语言学研究。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lexical semantic studi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ddresses i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in future, hoping to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behavioral profiles; lexical semantics; corpus; quantitative analysis

0. 引言

语料库研究法作为语言学的一种重要实证研究范式,被广泛运用到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而词汇语义可能是使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最多的领域(Gries, 2010:323)。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众多,且各有所长。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分析法(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Analysis,以下简称“BP 分析法”)是格瑞斯和迪威亚克(Gries & Divjak)(2009)在汉克斯(Hanks)(1996)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实证研究方法。该方法在国外论著中被广泛使用,已成为词汇语义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国内对此方法的关注尚显不足,目前还没有对该方法的详细介绍,相关的应用研究也非常少见。鉴于此,本文拟对BP分析法进行系统介绍,探讨该方法的相关应用,解析其优势和不足,以期推动该方法在国内词汇语义研究中的应用。

1. 词汇语义的语料库研究

词汇语义的语料库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搭配分析法(collocation analysis)和特征分析法(feature analysis)(Glynn & Robinson, 2014:308)。搭配分析法是基于可观察的语言形式,在一定样本中解析这些语言形式的共现特征,并作为理解其意义结构的索引。基于语料库的搭配分析法是分析语言使用的强大工具。该方法有两大明显的优势:一是可以自动提取形式,操作方便,因此分析的样本量大,结论的可信度高;二是搭配研究主要考察关联强度(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常规的测量词汇共现强度的方法有MI值(互信息值)、Z值、T值或者Log Dice值,这些值在很多语料库应用程序中可以自动生成,分析较之前更加快捷。构式搭配分析法就是此类方法的典型代表,该方法通过量化的手段揭示构式某一个或多个槽位中共现词素与构式的关联强度,由此探寻构式的意义。

特征分析法主要是基于大量的真实语料,通过人工分析词语的使用特征(usage-features),然后借助统计方法对特征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挖掘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这种将用法特征与多元统计方法相结合的研究始于格瑞斯(Gries)(2003),格瑞斯和

迪威亚克将这种方法称作“行为特征分析法”(behavioral profile approach)(Gries & Divjak, 2009; Divjak & Gries, 2009),而格林恩(Glynn)(2009)称之为“多因素使用特征分析法”(multifactorial usage-feature analysis)。二者虽然名称有异,但研究路径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该方法在社会心理学和计算语言学中也得以广泛应用。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作“成分分析法”(the analysis of components)(Fontaine et al, 2013),而在计算语言学中被称作“情感分析法”(sentimental analysis)(Wiebe et al, 2005)。

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千秋,搭配分析法从形式出发,而特征分析法从语义出发,都有较强的主观性。搭配分析法在数据分析阶段比较客观,但在分析讨论部分比较主观;特征分析法则刚好相反,数据的标注基于人工分析,因此相对主观,但在数据的量化分析时采用统计方法,提供了相对客观的研究证据。本文采用格瑞斯和迪威亚克的概念,即“行为特征分析法”,并对其进行深入探索。

2. 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分析法

2.1 理论基础

行为特征(behavioral profile)这个概念最早由汉克斯(Hanks)(1996:79)提出。他在研究动词“urge、incite、bother”和“abandon”时使用“行为特征”来指这些动词的句法和搭配模式(主要是动词的补语结构)以及各种模式的使用频率。

虽然汉克斯最先使用行为特征来描述词汇的使用模式,但溯其渊源,这种提倡研究词汇使用模式的方法源于弗斯(Firth)的理论。他认为,“一个词的完整意义总是依赖语境的”(Firth, 1957:7),“了解一个词要了解它的同伴”(1957:11)。海里斯(Harris)(1970:758)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词素A和B的语义差别比A和C之间的大,那么A和B的分布频率的差别也会比A和C的大一些。换句话说,意义的区别跟分布特征是紧密关联的”。辛克莱(Sinclair)(1966,1987)进一步发展了弗斯的理论。他与他的合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词项倾向于跟某些其他的词、短语或句法结构共现或者搭配,并提出分析词的主要目的是描写词语相互搭配的倾向性。他们区分了词汇使用中的两种趋势:短语趋势(phraseological tendency)和术语趋势(terminological tendency)。辛克莱的研究为当代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续的相关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词汇语义与其分布模式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为基于语料库的BP分析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从汉克斯提出行为特征这一术语后,很多学者对词语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大量研究,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了一种研究方法。行为特征不再局限于汉克斯所说的动词

的补语结构,而是指“口语或者书面语中,一个小句或者句子中与一个词共现的成分的综合清单”(Gries & Divjak, 2009:61)。行为特征研究法是通过真实语料中使用样例的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等各个层面的特征进行标注,然后借助统计方法,通过量化的手段考察词的语义结构和使用模式。

过去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词汇层面的共现信息,即搭配(collocation);二是词汇句法层面的共现信息,即类联接(colligation)。这些基于语料库的词汇语义研究揭示了大量传统语义学无法企及的信息,但也存在以下不足:①研究范围偏窄。以往对词义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同义词和反义词,没有对词簇进行研究,也没有考虑到词的形态变化;②统计方法单一。过去的研究对数据的分析仅限于共现频率的统计,没有对分布数据进行更深入的量化分析;③理论解释不充分。以往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缺乏对统计结果的理论阐释,忽视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价值(Gries, 2010)。

基于语料库的词汇语义研究的主要假设是:一个语言表达的分布特征反映它的语义和功能属性(Gries & Otani, 2010:122)。BP分析法秉持“词汇和语法结构分布的相似性反映或者明示功能的相似性”(Gries & Divjak, 2009:59),即词项是基于跟其他语言成分的共现来界定的。理论上BP分析法遵循基于样例的模式(exemplar-based model)。根据该模式,说话人每加工一个特定的样例时,该样例的某些方面就被置于一个具体的多维网络中,这个网络涵盖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样例的分布特征包含了语音、韵律、音位、形态、句法、语义和语篇语用等各个方面的共现特征,范畴的特征通过与样例之间的比较获得,这构成了BP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另外,BP分析法的理念也与认知语言学“基于用法”的模式(usage-based model)一脉相承。BP分析法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为认知词汇语义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催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

2.2 基本操作

BP分析法通常包含四个步骤。首先,从语料库里检索出一个词条的所有用例。这一步需要使用索引程序(concordance program)、程序语言(如R语言),或者一个用于提取词矢量(the lemmata of a word)的语料库界面。

第二步,人工分析和标注词目索引里的词的每一类特征。词的特征称作标识码(ID tags)(Aktins, 1987),主要包括形态、句法、语义、功能等。标识码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ID tag levels),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几乎都可囊括在内,如表1所示。

对语料进行人工标注后会生成一个共现信息表,每一行包含一个词的例证(citation),每一列包含一个标识码,每一单元格表示这个例证标识码的层级,如表2所示(以多义词“run”为例)。

表 1 标识码及其层级示例(Gries,2010:326-327)

标识码类型	标识码	标识码层级	标识码类型	标识码	标识码层级	
形态	时	现在、过去、将来		依存小句类型或功能	状语、同位语、关系小句、零型关系句	
	式	不定、明示、主观、祈使等		修饰成分	定语、表语	
	体	完成体、非完成体		语义	名词论元类型	有生命/无生命、可数、集合
	态	主动语态、被动语态	动词论元类型		动作、交流、情感、智力活动、感知等	
	数	单数、复数	动作的可控性		高控性、中控性、不可控性	
	人称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状语修饰语		无修饰语、方位、时间等	
	及物性	不及物、单及物、双及物、复杂及物等	其他		可接受度	是、否
	比较	原型、比较级和最高级			搭配	所研究的词或意义的搭配
	否定	肯定、否定		语料	语言 1 和语言 2(比如英语和俄语),或者本族语和学习者英语	
句法	句子类型	陈述、祈使、疑问、感叹				
	小句类型	主句、从句				

表 2 To run 的共现信息表示例(Gries & Divjak,2009:62)

Bert is now the priest who runs it	单及物	现在时	依存句	to manage
I will run out of money	不及物	不定式	主句	to lack
Troopers said the child ran into the path of a passing car	不及物	过去时	依存句	to go very rapidly

第三步,对第二步中的表格进行数据统计。首先将表 2 转换成一个共现频率表(如表 3 所示),每一列含有一个标识码的层级,每一行呈现这个词的一个意义,这样每个表格单元就展现了一个词标识码共现的频率。每一个标识码内各个层级频率的总和应该相同,如在表 3 中,“to go very rapidly”跟及物性相关的标识码总数(191+12)跟形态形式的标识码总数(43+11+54+78+11+6)是等同的,都是 203。

为了对不同频率进行对比分析,绝对频率(absolute frequencies)需要转换为相对频率,表 3 转换后如表 4 所示。

第四步,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以是单因素分析也可以是多因素分析。行为特征研究通常运用多因素分析,即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提取跟行

为特征相关的信息。目前较为常用的统计方法有聚类分析、对应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这些都属于探索性统计方法(exploratory statistics),主要用于探索数据的内在规律,并借助可视化技术将数据结构中的差异直观形象地展现出来。

表3 行为特征矢量的绝对共现频率和词义(Gries & Divjak, 2009:63)

标识码	标识码层级	to manage	to lack	to go very rapidly	
及物性	不及物	0	12	191	} 203
	单及物	101	1	12	
	系动词	0	1	0	
	复杂及物	0	0	0	
形态形式	不定式	25	1	43	} 203
	一般现在时	15	5	11	
	现在完成时	23	4	54	
	过去时	10	2	78	
	过去分词	28	2	11	
	祈使句	0	0	6	

表4 行为特征矢量的相对共现频率和词义(Gries & Divjak, 2009:63)

标识码	标识码层级	to manage	to lack	to go very rapidly
及物性	不及物	0	0.8571	0.9409
	单及物	1	0.0714	0.0591
	系动词	0	0.0714	0
	复杂及物	0	0	0
形态形式	不定式	0.2475	0.0714	0.2118
	一般现在时	0.1485	0.3571	0.0542
	现在完成时	0.2277	0.2857	0.2660
	过去时	0.0990	0.1429	0.3842
	过去分词	0.2772	0.1429	0.0542
	祈使句	0.0000	0	0.02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前三步是对数据的加工,第四步是对数据的评价。这是

BP 分析法的常规步骤,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其操作程序会有所不同。刘迪麟(2010)指出,BP 分析法的微观程序(micro-procedure)是不确定的,研究者需要依据具体研究对象确定分析的具体程序。他在考察“chief、main、major、primary”和“principal”这组同义词时并没有分析它们全部的语言特征,只是考察了它们所修饰的名词的语义类别(抽象还是具体)、单数/复数特征、形名组合前有无冠词以及在 COCA 的五个语域中的分布频率。他最后指出,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语料的可及性程度不一样,BP 分析法需要考察哪些共现特征以及采用什么分析方法是研究者依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定的。也就是说,BP 分析法的具体分析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3. 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研究法的相关应用

BP 分析法能够揭示词语的内部语义结构和使用模式,辨析词语之间的用法差异,该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词义关系的研究中,展现了较强的解释力。

3.1 同义关系的研究

同义关系是 BP 分析法运用最早也是最多的一个领域。如何判断词的意义是相同的、如何测量同义词之间的相似度、同义词如何辨析等问题都是同义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Divjak, 2010: 2)。BP 分析法基于海量的语料库数据,结合多元统计方法考察同义词的语篇共现和语义选择,解释同义词的用法异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迪威亚克和格瑞斯(Divjak & Gries)(2006)考察了俄语中九个“尝试”类近义词。他们选取了 87 个特征变量,包括时、体、式、小句、副词、小品词、连接词和语义属性等,共分析了 1585 条语例,然后运用层次聚类法呈现出它们之间的相似度。之后很多学者运用 BP 分析法对同义动词、同义名词和同义形容词等进行了研究,如迪威亚克等(2006)对意向类动词的分析,迪威亚克和格瑞斯(2009)对 begin 和 start 的研究,穆恩(Moon)(2013)对一组表示“勇敢”的同义形容词的研究,刘迪麟和他的合作者对“主要”类同义形容词、强化类同义副词和两组同义名词的语义和用法差异的研究(Liu, 2010; Liu & Espino, 2012; Liu, 2013)。大量的研究表明,BP 分析法可以对同义词的语义结构和用法模式进行更精细的描写和分析,用定量的方法解决同义词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

3.2 多义关系的研究

多义性研究的难点主要包括多义词的意义原型(prototypicality of senses)、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的区分度(sense-distinctions)、多义词的语义网络表征(net-representation)、词义和词的形态句法结构的界面研究(the semantics-morphosyntax interface)(Gries & Divjak, 2009: 72)。BP 分析法为多义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多义词表达某一个意义的行为特征跟表达另一个意义的行为特征越相似,那么这两个意义就越接近。比如,多义词的两个意义在使用中主语都是有生命的,那

么这两个意义的相似度就比跟主语是无生命的意义的相似度大。用 BP 分析法进行多义性的研究成果较多。譬如,贝蕾兹和格瑞斯(Berez & Gries)(2009)运用 BP 分析法探讨了“get”的 26 个语义,并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展现了其各个语义的相似性或差异性;雅思格斯(Jansegers)(2015)等用 BP 分析法对西班牙语中的感知动词“sentir”进行了分析;格尔西雷(Golshaie)(2016)对波斯语中轻动词“xordan”的多义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证明了 BP 分析法基于语料库样例来发现多义范畴的原型,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从而能更好地展现出多义词的语义网络结构。

3.3 反义关系的研究

就反义关系而言,目前运用 BP 分析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格瑞斯和大谷(Gries & Otani)(2010)运用行为特征研究法分析了同义词“big/great/large”和它们的反义词“little/small/tiny”的用法模式,然后用聚类分析考察了它们的语义差异。另外,帕拉迪斯(Paradis)(2015)等基于 BNC 语料库对 21 对反义形容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考察了反义形容词的可及性、修饰名词的方式(谓语或者定语)、所修饰名词的语义类型和是否是隐喻或转喻用法,并运用对应分析展现了反义词对的用法差别。总体来看,BP 分析法用于反义关系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3.4 其他领域的研究

在众多学者运用 BP 分析法探讨词义关系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 BP 分析法在词汇语义之外的用途。有的学者将这种方法用于研究句法转换(syntactic alternation),但研究步骤略有不同。如上文所述,BP 分析法的操作过程一般涉及四步,但有时会略过第三步,直接进入第四步,如运用回归分析等验证性统计方法对第二步的数据直接进行统计加工。随着统计学的蓬勃发展,一些复杂的推断性统计模型比如逻辑斯蒂回归、线性分类器、决策树等都广泛运用到特征分析中,由此形成了多元统计方法。格瑞斯(2003)最早将行为特征研究和多元统计结合起来研究句法转换。基于 BNC 语料库,他首先对“动词+小品词”构式的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特征进行人工标注,然后运用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和分类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对该构式的两种类型(“动词+宾语+介词”和“动词+介词+宾语”)进行对比,证明二者分属不同的原型。目前,多因素分析法已用于分析各种构式交替现象,如与格交替、致使交替和属格交替等。近年来,伴随着复杂统计模型的不断涌现,BP 分析法已经展示了其在语言学众多领域中的适用性,该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

4. 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分析法的优势和不足

4.1 BP 分析法的优势

BP 分析法基于语料库对语言的各个维度进行精细化标注,并运用统计方法进

行定量分析。与过去基于语料库的词汇语义研究方法相比,BP 分析法具有如下优势:①研究范围更广。词汇语义的 BP 分析不局限于同义词对或反义词对,还研究同义词簇或反义词簇;不仅考察同义词或反义词,也考察这些词相关的屈折变化形式;②研究维度更全面。BP 研究不只是关注一个词的搭配(collocation)或者类联接(colligation),而是囊括了这个词的形态、句法、语义和功能等诸多方面的行为特征;③统计方法多元化,语料处理从简单的频率统计向精密复杂的数据统计分析发展。BP 分析法采用层次聚类分析、对应分析、回归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进行量化研究,并借助可视化技术将结果更形象、直观地展示出来。另外,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可以明晰变量之间的细微差异,发现被其他研究所忽视但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分析结果更为精确;④BP 分析法关注语言分析的不同层面,为认知语言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基于使用的证据(Gries & Divjak,2009:73)。BP 分析法在形式分布和意义之间建立了联系,展现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表明形式的分布不是任意的,而是由意义所驱动的。

4.2 BP 分析法存在的问题

诚然,BP 分析法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BP 分析法需要对各个层面的语言特征进行人工标注,目前还没有机器可以对语料进行自动标注,因此跟传统的语言分析一样,该方法有过于主观的诟病。同时,在 BP 研究中,选取哪些共现特征进行考察,以及考察的具体顺序和方式都是研究者确定的。有些研究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不同层面的语言特征(如 Divjak & Gries,2006;Gries & Otani,2010),而有些只是聚焦于最核心的共现特征(如 Liu,2010)等,因此该方法有较强的主观性。不过,“对语料库数据的分析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Berez & Gries,2009:158)。BP 分析法相比于其他方法更为客观,因为该方法要求所有的分析数据必须明确,对每一个标识码必须进行界定和操作化。尽管数据的标注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后续的分析方法是客观严谨的。

另外,BP 分析法涉及大量的人工分析和标注语料,工作量繁重,由此会限制研究样本量的大小,难以保证语料的代表性和结果的统计学意义。另外,人工进行海量的特征分析必然造成分析过程中的过度简化、部分潜在规律被忽略。

尽管 BP 分析法有以上无法避免的问题,但该方法顺应了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的语言观,目前已经成为了词汇语义量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4.3 BP 分析法的发展走向

在众多学者将 BP 分析法运用到词义关系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尝试对其进行改进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

劳拉·扬达(Laura Janda)和她的合作者认为,在 BP 分析法中,研究者考察的是语言的多层特征(multilevel profiling),具体研究变量由研究者自行选择,由此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发现某一个变量对于统计分析来说根本不重要,而某些重要的变

量又没有包含进去,从而导致分析结果不够全面。由此,他们提出了单层特征(monolevel profiling)分析,认为如果在研究中只分析语言某一个层面的特征,而不是所有特征,就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另外,他们认为多层面特征分析中的语言变量通常不是随意分布的,所有变量都是彼此关联的,如形态和句法,句法和语义,语义和形态等,因此在一个分析模式中考察不同层面的所有变量容易导致多重线性问题(multicollinearity)。比如,在聚类分析中,多重线性就意味着相互关联的因素被赋予了更多的权重,因此带来严重的偏态分布,而单层特征分析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扬达等认为,聚焦于单层面的语言特征可以兼顾该层面的所有变量,研究的精细化程度更高。他们对语言结构进行了大量的单层特征分析,譬如运用语法特征(grammaral profiling)考察词的不同屈折形式的分布模式(Janda & Lyashevskaya, 2011);运用语义特征(semantic profile)考察根据不同的词基选择词缀的方式(Janda & Lyashevskaya, 2013);运用构式特征(constructional profile)考察词素是如何作用于构式的(Janda & Solovyev, 2009);运用搭配构式特征(collostructional profiling)考察构式中空槽填充词的语义特征。这些方法都是运用形式作为工具来考察语言的行为特征。扬达还提出了“语言特征”(linguistic profiles)这个术语,并将其定义为“一组用来研究语言单位量化特征的方法”(Janda, 2013:3),囊括了以上所列举的各种单层特征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扬达带领她的团队所做的系列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其中有些分析方法没有考虑语言的类型差异,因此这种单层分析方法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BP分析法的另外一个发展趋势是与其他研究方法的跨界使用。目前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基于语料库的BP分析法和实验法相结合,从而为词汇语义的研究提供汇流的证据。刘迪麟(2013)运用基于语料库的BP分析法和强迫选择问卷(forced-choice questionnaire)对两组英语同义名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前者可以准确识别和描写同义词的语义结构,后者可以揭示在实际语言运用中说话人选择不同同义词的动因。普洛斯(Proos)(2018)运用BP分析法和分类任务法(sorting task)对爱沙尼亚语中的感知动词“nägema”(看)进行了研究,发现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不一样,二者互为补充。由此可见,“为了寻求对语言的全面了解,我们需要整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语言行为和语言知识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Arppe et al, 2010:3)

5. 结语

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研究法为词汇语义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效途径,它促使了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定量转向。BP分析法的研究基础跟基于样例模式的理论和解释方法一脉相承,因此能够与语料库语义学或者计算语言学中的统计方法形

成互补(Gries,2010:342)。BP分析法已经在国外语言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如何将BP分析法运用到汉语研究中,并跟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联手,对汉语词汇语义乃至句法结构进行更精细的描写和解释,这是研究者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 Behavioral profile 中的 profile 与认知语法中的 profile 不是同一概念,二者没有关联。

参考文献

- [1] Arppe, A., Gilquin, G., Glynn, D., Hilpert M. & A. Zeschel. Cognitive Corpus Linguistics: Five Points of Debate on Current Theory and Methodology [J]. *Corpora*, 2010, 5(1):1-27.
- [2] Atkins, B. T. S. Semantic ID Tags: Corpus Evidence for Dictionary Senses [G] //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UW Centre for the New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aterloo: The UW Centre for the New OED, 1987.
- [3] Berez, A. L. & St. Th. Gries. In Defense of Corpus-Based Methods: A Behavioral Profile Analysis of Polysemous get in English [G] // S. Moran, D. S. Tanner & M. Scanlo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Northwest Linguistic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 27). Seattle, W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2009.
- [4] Divjak, D. Structuring the Lexicon: A Clustered Model for Near-Synonymy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10.
- [5] Divjak, D. & A. Arppe. Extracting Prototypes from Exemplars What Can Corpus Data Tell Us about Concept Representa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3, (2):221-274.
- [6] Divjak, D. & St. Th. Gries. Ways of Trying in Russian: Clustering Behavioral Profiles [J]. *Corpus Linguistics & Linguistic Theory*, 2006, 2(1):23-60.
- [7] Divjak, D. & St. Th. Gries. Corpus-Based Cognitive Semantic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Phrasal Verbs in English and Russian [G] // K. Dziwirek &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eds.). Studies in Cognitive corpus Linguistic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
- [8] Firth, J. R.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 [G] // J. R. Firth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 [9] Fontaine, J., Scherer, K. & C. Soriano. Components of Emotional Meaning: A Source-Book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0] Glynn, D. Polysemy, Syntax, and Variation: A Usage-based Method for Cognitive Semantics [G] // V. Evans & S. Pourc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 [11] Glynn, D. & J. Robinson. Corpus Methods for Semantics: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Polysemy and Synonymy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4.
- [12] Golshaie, R. A Corpus Study on Identification and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of Light Verb Constructions in Persian: The Case of Light Verb Xordan “to Eat/Collide” [J]. *Language Sciences*, 2016, 57:21-33.
- [13] Gries, St. Th.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in Corpus Linguistics: A Study of Particle Placement

- [M]. London: Continuum Press, 2003.
- [14] Gries, St. Th. Behavioral Profiles: A Fine-Grained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in Corpus-Based Lexical Semantics [J]. *The Mental Lexicon*, 2010, 5(3): 323-346.
- [15] Gries, St. Th. & D. Divjak. Behavioral Profile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wards Cognitive Semantic Analysis [G]//E. Vyvyan & S. Pourc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 [16] Gries, St. Th. & N. Otani. Behavioral Profiles: A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on Synonymy and Antonymy [J]. *ICAME Journal*, 2010, 34: 121-150.
- [17] Hanks, P. Contextual Dependency and Lexical Se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996, 1(1): 75-98.
- [18] Harris, Z. S. *Papers on Structural and Transformational Linguistics* [M]. Dordrecht: Reidel, 1970.
- [19] Janda, L. A. The Big Questions Need Multipurpose Portable Solutions [G] //T. Wielfaert, K. Heylen & D. Speelman (eds.). *Proceedings of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s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5*. Leuven: University of Leuven, 2013.
- [20] Levshina, N., D. Geeraerts & D. Speelman. Mapping Constructional Spac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Dutch Analytic Causatives [J]. *Linguistics*, 2013, 51(4): 825-854.
- [21] Liu, D. Is It a Chief, Main, Major, Primary or Principal Concern?: A 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Study of the Near-Synony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0, 15(1): 56-87.
- [22] Liu, D. Salience and Construal in the Use of Synonymy: A Study of Two Sets of Near-Synonymous Nou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3, 24(1): 67-113.
- [23] Liu, D. L. & M. Espino. Actually, Genuinely, Rally, and Truly: A 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Study of the Near-Synonymous Adverb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2, 17(2): 198-228.
- [24] Moon, R. Braving Synonymy: From Data to Dictiona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2013, 26(3): 260-278.
- [25] Paradis, C., Löhdorf, S., van de Weijer, J. & C. Willners. Semantic Profiles of Antonymic Adjectives in Discourse [J]. *Linguistics*, 2015, 53(1): 153-191.
- [26] Proos, M. Polysemy of the Estonian Perception Verb Nägema “to see” [G] //L. J. Speed, C. O’Meara, L. S. Roque & A. Majid (eds.). *Perception Metaphor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9.
- [27] Sinclair, J. *Beginning the Study of Lexis* [G]//C. Bazell, J. Catford, M. Halliday & R. Robins (eds.). *In Memory of J. R. Firth*. Harlow, England: Longman, 1966.
- [28] Sinclair, J. *Collocation: A Progress Report* [G]//R. Steele & T. Thomas (eds.). *Language Topics: Essays in Honor of Michael Halliday, II*.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7.
- [29] Wiebe, J., Wilson T. & C. Cardie. Annotating Expressions of Opinions and Emotions in Language [J].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2005, 39: 165-210.

责任编辑:龙 丹